

風沙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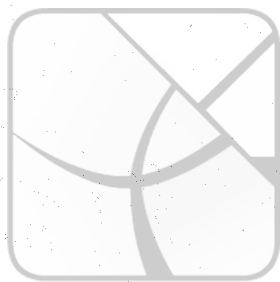
文藝繁瑣集



中外翻譯書業社

文艺絮语集

風沙雁



中外翻譯書業社

目 录

艺术不能脱离大自然	1
华文文艺工作者应该大团结	3
为有源头活水来	5
笛子宜在原野吹	7
文化遗产是一撮泥巴	9
日本文化·中国书画·新华文学	11
新华文学前途何在?	13
太痴则惑 不痴无成	15
“江山也要文人捧”	17
应可从文学作品吸取儒家思想	19
我国华文文艺有前途吗?	21
创作总根于爱	23
打破框框与思路不清	25
不是为了永恒为了记忆	27
专栏作者的苦恼	29
文史学家为何困惑	31
精通外文与体验生活	33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35
文学题材与生活经验	37
我国华文文学的生命源泉	39
华文文艺应该脱离报章吗?	41
华文报章与文艺应相依为命	43
爱美使社会进步	45
为下一代制造不寂寞	47
小国也有人才	48
诗才与商才	50
雅士的可恶	51
品格与作品	52
阅历和人生观	53
打骂自己人	54
唱 高 调	55
文化无国界之分	56
炒粿条和写文章	58
文艺拉车手	59
巧妙的构思	60

高级迷信	62
开拓生活深度	63
发展话剧的障碍	64
死后被捧为天才?	65
序何晓《玲玲的星期天》	66
序(散文一年——散文集)	68
抄捷径	70
闭关的祸害	71
道德观念	72
文化人与商人	73
精神失落的悲哀	74
讽刺博士论文的恶劣态度	75
编辑与文风	76
要保持文体的特色	77
都市生活	78
农村文化与价值观	79
文艺前途不太暗淡	81
庸俗的经验论者	83
文人的良知	84
政客与商人的壮志	85
把艺术普及民间	86
书店	87
读书风气	88
艺术的慰藉作用	89
家法的可怕	90
游记难写	91
在明朗中显露诗意	92
见成君著《河的独白》	
一些澄清——答潘亚暎先生	95
序《尤琴小说散文选》	102
文艺应与国家命运挂钩	104
华文文艺前景光明	106
迎接文艺春天的到来	108
艺术气氛	110
人生任务	111
独具慧眼	113

非 缘 分	114
劝 世 文	115
写作的快乐	116
个 人 化	117
真 诚	118
立 足 点	119
世界华文书展	120
文穷而后王	122
艺术的副作用	123
素 描	124
感情的海洋	125
秦牧的散文	126
阿达的风格	127
文艺团体与宗乡会馆继续合作	128
胸 襟	130
语文与传统文化	131
解 剖 刀	133
平凡年代	134
变 化	135
结 集	136
序《六月》	137
我们需要文体发展史书	139
文 学	142
巴金的唏嘘	143
生活意趣	145
读 书	146
会馆应可出版文学杂志	147
艺术气氛不够普及	149
经济不景气时期不可忽略文化艺术	151
我国艺术工作者缺乏认同感	153
培养欣赏艺术的群众	155
我国华文文坛当前面对的问题	157
探讨华文文学的发展途径	159
执 着	161
文坛并不太沉寂	163
思想的偏差	165

发扬传统文化是会馆新生的要素	166
体会生活	168
贻笑大方	169
有韵味的文章	170
历史自己写	171
情 怯	172
与外国作家比较	173
突破不易为	174
感 悟 力	175
突破苍凉体味生活	176
自 然 美	178
要交流也要认清方向	179
灵魂有污点	181
文坛的不健康现象	183
提高演出水平也重要	185
陶醉在框框中	186
息交绝游	187
把他们动员起来	189
殉 艺	191
多读几年书	192
奇特的鲜花	194
文艺评论	196
征服‘自然’	197
风格比内容重要	198
可开拓的美土	200
自我形象	202
味之素下得太多了	203
创新途径	205
《淡淡的情愫》读后感	207
见成君著《淡淡的情愫》	
序何晓《市廛集》	210
不是怀旧	212
为题材融入感情色彩	214
别太强调散文的实用功能	216
慎防乡愿作风流传开来	218
后 记	220

艺术不能脱离大自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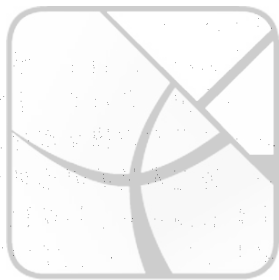
艺术与道德文章最大的不同点是，前者以形象来说明创作者对某一事物的观点，因此有意境，内涵深，感人力量大；后者则是通过文字，旁证博引，来阐述撰文者对某一事物的看法。说艺术是通过形象来阐明道理，并不是否定道德文章的存在价值，而只是藉此说明两种事物的不同点。说艺术是诉诸形象来表达创作者的创作意图，并不是否定艺术家要有高超的思想认识。屈原的楚辞，庄周的《庄子》，韩非的《韩非子》，李白杜甫的诗，关汉卿的杂剧，曹雪芹的《红楼梦》，无一不蕴藏着他们对祖国的爱，对人生的看法，对时代的关怀，对现实的不满，对低层人物的爱，对封建制度的恨。中国古典文学史上的这些大家，都是积极入世的思想家，他们之所以是艺术家范畴内之一的文学家，是因为他们所藉以表现他们思想的是诉诸形象的文学，而不是摆事实讲道理的议论文字。

艺术家一要有高超的思想认识，二要能掌握该门艺术的特殊表现形式。“金陵八家”之二家亚明与宋文治先生，在接受本报杜南发与李福茂访谈时，对此颇有论述。亚明说他作画的师承有三，一是中国绘画的传统，二是大自然，三是人民。他认为艺术的生命和灵魂，是创作者对大自然再创造，而再创造的条件是要切合时代，要把握时代的命脉。宋文治则对艺术风格有所阐述，他认为艺术家要在广泛学习各家优点的同时，要有所选择，要选择那些与自己性

格相近的优点来学习，这样才能建立自己的独特风格。亚宋二先生对绘画的论述，除突出每种艺术要保持其特性外，也强调了艺术家的思想认识的重要，即亚明所说的魂和胆。

目前我国青少年中颇为流行的是一种电子游戏，这正如五十年代的青少年多喜欢捕虎蝇一样，原本没什么可非议的，不过，玩电子游戏有个可能对艺术创造非常不利的后果，那就是现代的青少年会因此而少接触大自然，而大自然却是艺术创造的最大源泉。亚明先生的三个作画师承之一的大自然，倘若不为我们的青少年所喜爱，则他们当中若有人从事艺术创作，就有可能是脱离大自然的梦呓。目前我国华文文坛上所呈现的脱离群众的文风，会不会和我们的青少年少接触大自然与人群有所关连呢？这应该是个值得大家研究的问题。

24-10-1981



华文文艺工作者应该大团结

东方社会的一个特点是，上行下效之风很是流行，在政治上如此，在文化方面也不例外。唐柳宗元参与王叔文的改革，宋王安石的变法，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日本明治维新，就更是天皇亲自发动的社会大改革了。在文化上也如此，日本的短歌，俳句，发轫期的作者多是贵族王卿，《源氏物语》这本世界上最早的长篇小说，其作者紫式部，则更是道道地地的宫廷美丽的才女了。中国的三国时代，曹操父子喜爱文学，因此有建安七子；唐朝皇帝多爱吟诗，是唐诗特别发达，诗人多若天上的星星的原因。

文化部政务部长邝掇治先生，日前出席由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假中华总商会举行的“华文文艺书刊展览会”，在开幕礼上他透露文化部将在一、二个月内，召集文艺界代表会谈，研究发展华文文艺问题。华文既肩负保存东方道德，价值观念与文化传统的任务，华文文艺与华文存亡的关系，就有“春江水暖鸭先知”的指示作用，华文文艺的滞销，是说明华文将会逐渐消失。邝部长在这时候站出来说话，并关心华文文艺的发展前途，这对已消沉了十多年的华文文艺，无异是注入一针新生剂，华文文艺今后的兴衰，在很大的程度上，须视文艺工作者本身的努力与奋斗而定。

目前摆在华文文艺工作者面前最大的问题是，如何反映八十年代新加坡的社会风貌，人民的精神状态。由于这十多年来的经济成

长，把五、六十年代新加坡的贫困面貌，几乎彻底铲除了，年轻一代的新加坡人，在比较安逸的环境下成长起来，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都不能了解贫困是什么一回事，加以自身生活的局限，发之为文，就多是无病呻吟，吟风弄月之作。其实，目前大多数新加坡人的偏差是太注重物质生活，而忽略了精神生活，结果在很多场合，就出现了暴发户的丑陋咀脸。这种暴发户咀脸的心态，表现在物质上是希望不劳而获，因此赌风炽热；表现在精神上是空虚彷徨，只追求感官刺激的浅陋书刊与电影。作为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应该鞭挞入微地反映这种社会病态。新广已播映过的《网中人》及还在播映的《鳄鱼泪》，虽是发生在香港的故事，但我们相信，本地文艺工作者，只要深入生活，也必能写出类似的有生活气息的作品来的。

本地文艺工作者还须解决的另一难题是停止相互攻讦，文人相轻的风气应立即中止，文人倘若继续相互斗骂，分门分派，就会使原本就够支离破碎的文坛局面，更加四分五裂，这种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相互攻讦，会使华文文艺更快死亡。文艺工作者应该把精力用来介绍外国的好作品，尤其是亚细安成员国的好作品。有阅读及翻译外文能力的文艺工作者，应该尽快把它们翻译过来，华文文艺只有在借镜外国好作品的高超写作技巧后，才能逐步提高自己的写作能力。

在日本，至少有二间大学把马华文学当作一个科目来教导的。华文文艺工作者只要努力创作，团结一致，是不愁没有读者的。

07-11-1981

为有源头活水来

半亩方塘一鉴开
天光云影共徘徊
问渠那得清如许
为有源头活水来

——朱熹《观书有感二首》之一

朱熹是宋朝理学家，但诗写得很不错。这首哲理诗阐明一个哲理：若要清如许，就要源头有活水来。把这哲理用在推广华语运动，那就可以这么说：要讲词汇丰富，明朗易懂的华语，就要有丰富华语的词汇来源。但要认清，能丰富华语词汇的，主要来源不是方言，而是华文。文化部政务部长邝摄治先生，日前接受报章记者访问时透露，他曾向新广建议，在今后播映的香港连续剧上附上华文说明，俾便更多观众能了解剧情。他也说香港连续剧的华语配音要在香港录制，因为香港华文水准较高，他更阐明，如果我们让方言影响华语，那二、三十年后说标准华语的中国人，就会不能明白我们所说的华语。这些至理名言，值得我们深思。

语言是表情达意的工具，在选择一种工具时，我们应该考虑的是，那一种工具是最能无往而不利的，它才是最有效的工具。方言诚然也是语言的一种，也是表情达意的一种工具，但方言的局限性，

使它不能和华语所具备的更大普通性相提并论。何况，华语有华文为其基础，讲华语能减轻学习华文的负担，反过来看，学了华文又能转过来规范化华语，丰富华语，提高华语的水准。我们如果要保存自己的根，要使我们的下一代能掌握两种语文，舍说方言，只讲华语，是一条捷径。

任何一种没有文字作后盾的语言，都不是健全的，能永存的语言。爱斯基摩语，印第安语，诚然是爱斯基摩人与印第安人的沟通情感的工具，但这两种语文，都没有文字作后盾，因此他们也就没办法把他们的感情，经验记录下来，结果他们就很落后，而且他们的语言也只有他们的那个民族才能明白，其他民族要学也无从学起。

没有文字作后盾的语言，还有另外一个弱点，那就是容易被其他语文入侵，长此以往，那种语言就会沦为某一特定区的人们的共同语言，而不能为其他区的人们所能了解的。

为了方便我们的下一代学习华文，从而保有我们的根，巩固国家的基础，我们实在没有必要留恋方言。

13-11-1981

笛子宜在原野吹

我跑步回家，沿着一条幽径走着。是黄昏，没有风，空气凝着而干燥。夕阳黄澄澄的余晖照在一座座组屋的玻璃窗上，反射出的光刺得我的眼睛有点痛。我感到这繁华的社会，似乎缺乏一种什么的，使人的心情常常感到空虚。就在这时，我蓦然听到小径旁组屋的某个窗口有笛声幽幽传来，把凝滞着的空气震荡起来。在组屋与组屋间的小径竟能听到笛声，这对我是一大惊奇。但在惊奇之余，我又发现笛声应该在广阔的原野飘，至少也应该在弦月斜挂树梢，椰影婆娑的乡村里飘，那对听者来说，就更能体验到笛声的韵味。

看《生活之光》的演出后，我的感受就如在组屋的幽径听到笛声一样，感到惊喜，但也觉得《生活之光》的节目确实带有太浓的乡村气息，与组屋的格调不太融洽。除开相声是既收到娱乐观众的效果，又为下一个节目的布景而补上空白时间外，其余的节目，无论是歌唱、舞蹈或话剧，都几乎清一色是外国作品，本地作品绝无仅有。《翡翠箩舞》，《欢乐的草原》，《蝴蝶泉边》、《约会》，节目中呈现的那种草原景色，白雪皑皑的山峰，宁静的夜色，对大部分是住在组屋的观众，真难引起共鸣。尤其是这些作品的内容，有许多与我们的生活实在相去千万里的。日本歌曲《海滨之歌》是较能使住在这小岛上的观众引起联想的，可惜演唱者唱不出原歌曲的韵味来。

话剧《约会》是演出最成功的一个节目，这除剧本本身的成功外，男主角的杰出演技，是使这出话剧成功的另一因素。生活剧社如果能创造，或挑选本地杰出的话剧本，可以肯定，他们的话剧演出也一样会很成功的。把这么强的话剧演员，用来演与我们的生活全然无关的剧本，实在是一种损失，实在令人惋惜。

但正如我佩服住在组屋里的吹笛者的干劲与勇气，我敬佩生活剧社十年来坚守在正派文艺的岗位上，这不是没有高超情操的人所能办得到的事。生活剧社全体社员以实际行动捍卫正派艺术，这不仅教人佩服，也教那些只追求丰富物质享受，而又念念不忘要来沾一点正派艺术的光的人脸红。

18-11-1981



文化遗产是一撮泥巴

听许常惠教授讲“我采集中国民谣的经验”，犹如上了一课生动的中国戏剧史，而且受益的程度竟超过我在南大上的半年中国戏剧史。整个讲演是在妙语如珠、乐鼓声如诗的情景下进行的。许教授对好多问题的独特见解，既令人佩服，也发人深思。

许教授是深深地热爱着自己的民族音乐，但不是毫无原则地固执地热爱着它。他说中国文化有过光辉灿烂时代，可惜它中断了，没被提高起来。与此相反，西方的民谣则被提升为目前的交响乐，文艺歌曲。所以西方人士所欣赏的音乐，实质上已渗入民谣的成分。中国的民谣，则还是一撮泥巴，等待塑造。有见于此，许教授和他一批有才气的学生，把相当粗俗的民谣，用先进的手法，加以提高，加以改进，使之成为童谣，合唱曲或文艺歌曲。但许教授是执着地热爱民族音乐的，他说外国人研究非本族的文化，其成就总不比研究自己民族的文化来得高。既热爱民族文化，又不固步自封，而能以西方先进的手法，来改进自己民族文化，这是许教授过人的地方。

我曾和一位留日华侨教授谈过中国文化问题，该教授无限感慨地说，中国的五千年文明，正是中国要走四个现代化的障碍物。他很形象地比喻说，每一个中国孩子一生下来，就得背上一个五千年的包袱，这包袱中既有筷子碗碟，也有孔孟老庄，他开始会思考时，要走现代化了，他就得想一想，他检上来的任何一件外国东西，和他

包袱里的是否会相辅相成，凡是不会相辅相成的，他都不能检收，但包袱里的东西实在太多了，值得检拾的相辅相成的东西就很少了。那教授很悲伤地断定，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很不容易实现。

可是倘若用许教授的观点来看，有丰富的文化遗产却不是坏事。许教授的学生既能把《天黑黑，要下雨》这首相当粗俗的民谣用先进的手法，改编为很现代化的童谣；那中国的拥有丰富文化遗产，就不但不是它前进的障碍物，反而是它前进的原动力了。其中的关键是，要用先进的手法来处理古老的文化遗产。

我国各民族现有的文化遗产都是很古老的，我国的经济制度却是崭新的。古老文化与现代化社会的还没很好地挂上钩，正是我国艺术处于青黄不接的基因。许教授说在塑造一种包含有各民族色彩的综合文化前，各民族首先有必要整理自己的文化。这观点与我们的部长或议员所常常强调的，新加坡不要气压锅式的速成文化，可谓不谋而合。我国各民族该怎样用先进的方法，来提高，来现代化他们固有的文化遗产，看来是刻不容缓的事了。

25-11-1981

日本文化·中国书画·新华文学

尽管日本的科技在世界上是多么先进，尽管日本的经济成就在世界上是多么引人注目，日本人到目前还有两大遗憾。一是从出土文物看来，日本文化要不是从中国输入的，就是从韩国传过来的，日本文化难道没有土生土长的吗，这在发现埋在地下的土生土长文化之前，日本人只好很遗憾地接受，日本文化是从中国或韩国输入的这事实。二是大和民族到今天为止，还没出过一个象中国的老子、庄子、墨子、孔子等等的哲学家。日本人的哲学，也几乎都是外来的。日本人可以输出电视机、汽车、电脑、照相机等等先进工业品，但独独没有哲学思想可输出。这两大遗憾，是日本人在遇到中国人时，总会产生一种很复杂的矛盾心情，既对中国的丰富文化与哲学思想，有崇拜与自卑之感，又对中国的经济及科技落后，产生轻视之态。

日本的文化，即使是受到中国与韩国的影响，但并不失其独特民族性。不仅西洋人对日本文化的独特性欣赏，中国人看到日本文化的缤纷多彩也要叹为观止的。那日本人的为没找到土长土生文化，为还没产生杰出思想家而遗憾，就只能说明一个事实，那就是民族文化的传统，是每一个民族所引以为自豪的。

如果日本人的两大遗憾，足供我国三大民族作为前车之鉴，那我国各民族的必须保存自己的文化传统，实在是最重要的事了。这样的看法，在听了饶宗颐教授的《中国书画杂谈》演讲后，我更进

一步坚信保存文化传统，是创造新文化的最先决条件的看法。

饶教授一针见血地指出，当今的学中国画的画家，很多深受吴昌硕、张大千等大师的影响，蔚为风气，遂造成一种束缚，致使画风笼罩在大师的精神统摄下。饶教授说：当今画家，宜走出吴、张等大师的影响圈外，上溯到中国古代如汉、唐、宋等朝代的画风，从中吸取养料，才能有所创新，而超越近代或当代的大师的成就。

饶教授的这番至理名言，拿来用在新华或马华文学上，也无不得当。马华文学即以方修先生的以1919年为发轫朝，于今也只不过62年，原先作为中国文学支流之一，而后脱离中国文学影响，趋向独特地方色彩的马华文学，其养料来源无疑的是中国文学。新华文学则是新加坡脱离大马后的马华文学的另一新枝，其养料当然也是来自中国文学，所以要使新华文学蓬勃发展，则从中国古典文学中吸取养料，是必不可少的一条途径，但环顾学生的华文水准日益低落，该怎样培养学生阅读中国古典文学呢？这确实是个头痛的问题。

07-12-1981

新华文学前途何在？

约莫两年前我曾在香港的一份杂志读到一篇评论香港教育的文章，该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香港教育过于偏重英文的弊病。文章说香港青年多数只念完高中就出来谋事，而在工作中只用到很肤浅的英文，在实际生活上却又大量运用广东话，结果造成香港青年只能用广东话来思考问题，而广东话又因为用者不能以阅读华文来丰富它，所以香港青年只能作等因奉此的工作，而不能深入地思考问题，分析问题。该文章总结说，唯一补救这弊病的方法是，让香港青年多读华文，只有学习与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语文，才能培养青少年的独立思考与分析能力，这是非常切中香港教育弊病与论点。

在读过这篇文章后的一个月许，有位同事的太太到我在东京的家闲聊，当她看到我排在书架上的中英文文学书本时，她很诧异地问我在大学时代学的是什么，我说是中国语言与文学，她又问我为何学了中文文学却来做官，我说做官为的是生活，学文学为的是兴趣，业余可以涂些生活感受的东西。她听了才恍然大悟，但随后又后悔自己学了英国文学，以致有时想写点小说，却因生活中的事物，诸如筷子果条，豆花水等等等等，以及群众的语言，都不能用英语形象地表现出来，而致掷笔长叹。她说她现在彻底地了解，英文对她来说，只是一种很实用的文字，但却难以用来表现群众的生活。

难以用英文来思考问题，难以用英文来写反映群众生活的小说，

这都是生活在一个母语尚未消失，而英文却是重要书写媒介语的社会普遍现象。这样的社会现象，是使以母语为写作媒介语的写作人，比在一个纯商业化但却没有多种语言干扰的写作人，更感到寂寞的原因。这种寂寞感，加上商业社会特有的物质引诱，就很容易使稍有点名气的写作人，或投笔从商，或掷笔归隐了。我国的经济建设尽管令人另眼看待，文艺在政府的大力提倡下，却依然没法蓬勃起来，部分原因相信在此。

文学艺术，最难摆脱的是民族性。樱花给日本人的感受，不仅仅是花，而是漫漫烂烂的花，还寓有人生不在活得长久，而要活得灿烂的意义在。梅花对我来说，也不只是花，而是笑傲霜雪，寓有在恶劣环境中不畏艰难舒展胸中抱负的傲气在。夜来香带给我罗曼蒂克情调的想象，玫瑰使我想起又美又刁的晴雯。一位日本朋友曾对我说，每一个日本字，对他来说，他不仅能明白它的含意，能读出它的音来，他还能嗅到它的味道，惹起他的想象。中文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所以除了少数丧失了母语的非洲人，得用别国文字创造外，凡有母语的人们，若用母语创造文学，就更能感人。

我国将来会否成为一个只用英文的国家，那是将来的事，没人敢断言。但在这种局面出现前，作为我国文学重要一环的新华文学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胥视两种语文推行的成败而定。两种语文若成功，则新华文学，就会欣欣向荣，否则我国的文学就要经过一段很漫长的酝酿时期，而后才会有以英文为表现工具的文学出现，那至少得等待几十年的时间。

09-12-1981

太痴则惑 不痴无成

孔大山君在其近作《文学》中，曾例举他的两位文友的遭遇，以说明文学是文学，现实是现实，若终日里生活在文学境界中，就会与现实格格不入，而终致于自己活受气，别人活受罪的道理。孔君的论点，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但失之于过于消极，有超然物外的弊病。

对于艺术的喜爱，若缺乏“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执着热情，就难望有所成就。曹雪芹写出红楼梦，是“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看来都是泪”的精神在支撑着他的。对文学的执着，正是曹雪芹在文学上有成就的原因。以冷漠的态度，在文学园地边缘走马看花的人，绝对不会在文学上的所表现的。

但孔君的论点，也有足以令人三思的地方，那就是对文学的执着的爱，千万别痴到走火入魔的境界中去，但这是年轻人所最难以避免的过错。“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要吃过好多苦头的人，才能达致的境界。但这种境界，却又是年轻人应该尽早达致的。

对艺术或文学，过于痴情，则会走火入魔，但不痴情，又必难有成就，理想之道，是在痴情的同时，要清醒地冷眼旁观这现实社会。人的活着，就为了实现理想而来的，但现实是残酷的，它会教人对理想感到幻灭，如果在幻灭时，就此冷静下去，那就会成为一个对生活只是袖手旁观的人。这样的人一多，整个社会就会死气沉

沉，也就难以进步。孔君劝导年轻人要分清艺术是艺术，现实是现实的差别，这论点的弊病就在于，若人人都以这种态度对待文学，那文学界就只有看客，而没有参与者；若人人都以这种态度看待社会，那社会就只有冷眼旁观者，而没有参与社会建设者。由孔君的论述文学，也可看出我们的社会已步入这样的一个阶段：多数人努力追求物质享受，不少人沦为旁观者，少数在那儿关怀整个国家命运的人，可能被视为傻子，这种傻子一旦消失，那魏晋南北朝的清谈之风就会盛行。

“哀莫大于心死”，孔君对文学的论调，多少是他心死的反映。这种心死表现在文学上，就会出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作品，表现在社会上，就会出现阮籍这样的人物来。这些对环境特殊，绝少行差踏错余地的我国来说，都不是好事。无论对文学，或对社会，既要痴心地爱，也要冷静地思考，这应该才是我们的处世正道。“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这才是正确的文艺观或人生观。

22-01-1982

“江山也要文人捧”

在南大四年，最教我怀念的，是相思树花开的灿烂景色了。但相思树的教我怀念，却是它生长在南大那样的环境中。深红色的透迤走廊，有九重葛倒映的湖水，古色古香的行政楼，云南园的八角亭，亭里的竹丛，在这些景物的衬托下，相思树的穗状粉黄花，才能撩人情思。在那富有历史情调的环境里，看到相思树的红豆，很自然就会想起王维在《相思》中写的这情景来，“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而这诗情又加深了我对南大相思树的怀想了。

在日本五年，从电影上看到北海道的白雪皑皑，冲绳岛的椰树婆娑，蕉叶映月光的亚热带风光，长崎的山青水绿，秋田县的明媚风光，很为日本美丽的景色迷惑。待读到川端康城的《雪国》，巴蕉的俳句，才又知道日本的美丽，原来也有深厚的文化作基础的。巴蕉晚年淡泊为怀，跋涉千里，走遍日本的穷乡僻壤，乡民的淳朴性格，乡土的朴质文化，都是巴蕉撰写俳句的素材，但俳句描绘的诗境，文学作品刻划的旖旎风光，却又倒过来丰富了日本的大自然之美。

这两个经验使我明白，乡土的可资怀念，并不只是名山的雄伟，大川的澎湃，而是文化的魅力。黄河的气势磅礴，一半是诗歌赋与的；泰山的巍峨崇高，一半是文人的夸张致然的；庐山的云波诡谲，是

受苏东坡与李白的渲染。“江山也要文人捧”，没有史迹的江山，就如塑胶造的江山，既无性灵，色彩也不动人。这样的江山，就一定不能教人朝思暮想的。

因此王勃在《滕王阁序》中感慨：“关山难越，谁悲失路之人；萍水相逢，尽是他乡之客”。王粲在《登楼赋》中唏嘘：“斯土虽硕美而非吾乡兮”都不是无病呻吟，故作怀乡之念，实在是故乡的景物，既有自己的足迹可资怀念，又有自己的文化可供品赏的。

我对云南园的恩情，是可待成记忆的了，但乡土的值得我留恋，就因有此已成记忆之情在。扶桑五年，不能说全然没值得我缅怀的人或物，但彼邦文化，到底没有可资成记忆的感情在，因此我会渐渐忘怀扶桑的一切。人的可贵，就在于创造物资的同时，也能创造文化，创造物质，为了生存，创造文化，却是为了丰富精神生活。一个没有丰富精神生活的人，他的生活一定乏味与单调，一个由没有丰富精神生活的国民组成的国家，也必是精神贫弱的国家，这样的国家，在一个惊涛骇浪冲过来时，必然从历史舞台上消失掉。

28-01-1982

应可从文学作品吸取儒家思想

在东京选修三岛由纪夫的作品时，日本一位教授很为三岛的作茧自缚，而终致于为自己的那套不合时宜的想法自杀而感慨。他以很疑惑的神情问我，为何华人在感到幻灭时不会自杀？我想了一想，只能这么说，华人的哲学思想是不太执着，既有入世的积极抱负，也有出世的逍遥思想，最典型的是孟子说的：“达则兼利天下，穷则独善其身。”因为心胸广阔，个人的得失，并不太耿耿于怀。华人因此不会轻易自杀，这是儒家思想的精华的一部分。

儒家思想基本上是讲求个人修养，所谓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归根到底还是从修身做起，由于讲求个人修养，儒家主张从政者必须是正直又具有崇高品格的人。由于从政者都是君子，儒家的理想政治是以德服人，而不是以力服人的，所以孔子说过“苛政猛于虎”的话。儒家既自认从政者都是君子，因此胸怀兼利天下的抱负；但掌权者未必个个都能赏识自己，因此有时难免罢黜，在遇罢黜时，由于儒家是强调个人修养的重要，因此会回乡躬耕以娱残年。这种独善其身的思想，加上庄子的虚无主义人生观的影响，正是华人在困境中能自我求解脱，而不轻易自杀的主因。

中国的哲学思想，门阀众多，种类繁多，但可以说都起源于春秋战国时代，所谓的诸子百家争鸣时代。《论语》，《孟子》，《庄子》，《墨子》，《荀子》和《韩非子》等，从哲学思想的角度来

看，这些著作正是儒、法、老庄等哲学家的思想体系的结晶；从文学的角度来看，这些作品又都各具文采，给后代的各种文学体裁予很大的影响。

中国的哲学思想既大备于春秋战国时代，此后历代文人，在为诗作文时，都会把这种种哲学思想融入诗文中。因此《阿房宫赋》，《过秦论》无宁是儒家仁政思想的具体体现。李白的《将进酒》不乏老庄逍遥乐的思想闪光，杜甫的《三别》无异是揭露暴政的残酷，明代小品，抒发的闲情逸致，也该是文人愤世嫉俗后，寄情山水的老庄思想的表现，可见得中国哲学思想是已融入文学作品中去了。但儒家思想却由于得到董仲舒的倡导，历代帝王的拥护，而凌驾于其他哲学思想之上。

平心而论，儒家的积极入世思想，是有利于一个有凝聚力社会的成长的。从这一点来看，教育部决定增设儒家思想科目，是一个明智的决策。但我们说过，儒家思想正和老庄或法家思想一样，已融入中国文学作品中去，因此在教导相当枯燥乏味的儒家思想的同时，我们若能教好英校生的华文，使他们从华文文学作品中去吸收儒家思想，就更能收到牡丹绿叶，相得益彰的效果。一篇寓有儒家思想，而又文采丰富的文学作品，一定比一篇纯然阐述儒家思想的哲学文字，更能吸引学生去阅读，也更能收到教育的效果的。

06-02-1982

我国华文文艺有前途吗？

东方社会的一个特点是，上行下效之风甚流行，王安石变法，日本明治维新，都是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运动。在文学上也如此，汉武帝偶然读到《子虚赋》，大加赞赏，从而认识了司马相如，由于帝王好赋，于是两汉辞赋特盛。唐代帝王，多爱诗歌，中国诗歌大备于唐代。词起于五代，经李璟李煜父子提倡与发扬，词终于大成于两宋，可见得东方社会，文学艺术的兴衰，与为政者的好恶，是息息相关的。

我国幅员狭小，人口不多，语言复杂，文化根基薄弱，加上功利思想泛滥，华文的日趋式微，华文文艺的前途实在未可乐观。但也不是一定会自此消失，此中关键，与有关当局的提倡与否，颇有关系。功利思想的泛滥，使文艺在我国备受冷落，华文的式微，更使华文文艺少人问津，能够扭转这种趋势的，非得靠有关当局不行了。

但这样说，并不能因此否定华文文艺工作者本身努力的必要。华文文艺工作者，应该以提高本身的创作水平为首要任务，为达致此目标，文艺工作者就得多方吸收外国创作的优点。与此同时，文艺工作者在提高自己的创作水平后，要把眼光放到海外去，只有当我们的文艺能在海外开拓市场时，才能加强文艺工作者在艰困的环境继续奋斗下去的信心。但在海外开拓市场只是加强信心的方法，

而不是巩固华文文艺的措施。

华文文艺工作者要以本地读者为对象，创作本地民众所喜闻乐见的作品，只有紧紧抓住本地读者的心，华文文艺的根才会巩固，根一巩固，枝叶才会繁盛，才有办法横出海外。华文文艺工作者要深入生活，只有深入生活，才能创造出富有本地色彩的作品，这种富有蕉风椰雨的地方色彩，才有吸引海外读者的魅力。这种魅力，才是开拓海外市场的潜力。

华文文艺工作者在争取本地读者时，要认清的一点是，现教育趋势是华校的关闭，只是时间问题，华文文艺的读者是英校生。英校生的华文水准，是不能与华校的相提并论，文艺工作者在进行创作时，既要考虑以深入浅出的方式来争取读者，也要在普及中逐步提高，一味地毫无原则地提倡普及，会陷于媚俗的泥淖中去，但不顾现实情况地高唱“阳春白雪”，也是自取灭亡之道。以不媚俗的现实主义手法进行创作，是使华文文艺日益走向光明道路的另一可行方向。

10-02-1982

创作总根于爱

鲁迅在论述文学创造的意义时，曾说过“创作总根于爱”这句话，这真是一语道破有良知的写作人的心声。有良知的写作者，除与一般写作者一样，在进行创造时有快感外，前者一定有一股热爱民族，热爱国家的激情在。这种热情与激情，往往会教有良知的写作者忘掉自己个人的前途与安危，而鞭挞入微地反映该时代的陋习与丑恶面，由此促醒人们的注意，并唤起改革的要求。杜甫的《三吏》、《三别》，陆游的《示儿》，辛弃疾的《破阵子》（醉里挑灯看剑），文天祥的《正气歌》，无不流露着爱国忧民的情操，正是这种情操使这些文学家辗转反侧，坐立不安，也正是这种情操使他们的作品万古不朽，文学作品的感人力量，除高超的写作技巧外，作者的热爱国家之情，也是个很重要的因素。

七十年代是个风云激荡的年代，反映在我国华文文学上，就有追求光明，慷慨高歌的特色。这种激情进入八十年代，基本上是平息了。风住尘香花已尽，在丰衣足食的环境下，类乎汉赋的文风的兴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但这只是八十年代社会风貌的一面，而且是过渡时期较不重要的一面；另一面是思索与探讨的彷徨与困惑，这是主流，八十年代的我国作者，应该在这方面去寻找题材。

八十年代诚然不是激情的年代，它是慷慨高歌后，坐在树荫下喝茶思索的年代。在这丰衣足食的年代，我们在探索国家的前途，

人民的物质与精神生活不能平衡的问题。在思索与探讨后，我们或许会发现，中国盛唐的繁荣，正是晚唐衰弱的远因，这种历史教训，或许有供我们借镜的地方。历史循环论，盛衰定期论，都不是科学的历史观，我们相信举国上下，有意识地防患于未然，我们是能避开盛极必衰的陷阱的。人类社会发展史，到底是与一个人生命的盛极必衰有所不同；人类比动物聪明的地方，是能把经验传授给下一代人。因此由盛的一个高峰，拉向另一个盛的高峰，全看下一代人是否有能力接过这条线，而且要用适当的力把这条线拉好。在把这条线交给下一代人之前，文艺工作者就有责任帮忙民众寻求接线之道。

如此看来，八十年代的写作者，若留恋于七十年代的激情，那是患上历史思古病；但若停滞在赞颂歌舞升平，那是患上历史健忘症；前者会使写作者写出来的作品，失去时代意义，后者会教写作者写出来的作品，流于时过境迁了无痕道之病，在这思索与探求的年代，写作者若能本着创作总根于爱的原则，写出这时代民众在思索时的苦闷，在探求时的彷徨，在发现一条可走的道路时的惊喜，他应该就是建国文学队伍中的一名突出成员。

20-03-1982

打破框框与思路不清

各种不同的艺术形式，往往有共同的取景角度。一首耐听的抒情音乐，其中所洋溢的诗情画意，往往是可供写诗的人参考的。一张突出的艺术摄影，那摄影师的取景角度，往往也可供写散文的人借镜。一部情节紧凑，人物性格鲜明的影片，往往更可触发写小说的人的文思。不同的艺术形式，而能有相通之处，那是艺术家在创造时，有时会不谋而合致然的。

但这样说，并不是否认各种艺术有其独特的形式特征。就因为各种艺术形式有其独特性，艺术的世界才会缤纷多彩，琳琅满目的。音乐是以曲调来抒情，绘画是以色彩来表意，文学是以文字来表情达意的。这种种艺术形式，是能综合在一起，而提供鉴赏者以更丰富的精神享受。例如电影《一江春水向东流》，开头的那一个镜头，就是摄影、歌曲、诗词的汇合，这种汇合带给我们一种悲伤的情绪感染。但这种汇合，并不是排斥各种艺术形式和独特性，而是在保存各种艺术形式的独特性的前提下，所作出的一种牡丹绿叶相得益彰的汇合。

因此我们可以说，各种艺术形式的独特性是无可排斥的，甚至是同属于文学范畴的诗歌、散文、小说、戏剧、杂文，它们之间的一些特性，也是不容忽视的。诗要写得有意境，散文要凝炼，小说需塑造人物，戏剧要能在舞台上展现，杂文要泼辣，这种特质都须

受到照顾与保留，否则它们就会失去自己的面貌。

用这种标准来看我们目前一些写作人对文学的看法，就会发现他们患上概念不清的毛病。因此有人说要以盆栽的形式来呈现散文，这实在是匪夷所思的。一篇优美的散文，它所借重来展现意境的，是文字而不是盆栽，即使那是盆栽的意境，既是以文字为媒介的散文作品，它怎能以盆栽的形式出现呢？

这种概念不清，一味追求打破框框，而不顾及各种艺术形式的独特性的作风，正是我国文坛患上贫血病的主因。一个以为诗既然能以歌的形式出现，散文也必然能以盆栽的形式出现的人，是个思路不清，概念不明的糊涂虫。这种糊涂虫一多，怪论也就多，影响所及，就必然会出现一些文学非文学，绘画非绘画的东西来。

我们不否认，各种类的艺术家在表现同一题材时，常常会有不谋而合的地方，这是由于他们的审美观点相一致的结果。我们也不否认，朗诵诗时，配上音乐与绘画，能增强听者的情绪感染；但别忘了，在朗诵诗时，诗是主角，绘画与音乐是配角，在这时刻，绘画与音乐并不能取代诗歌的。任何意图以绘画形式来表现诗歌，而又说那就是诗歌，任何意图以盆栽形式来表现散文，而又说那就是散文，并不是打破框框，而是患上概念不清，不知所云的毛病。

29-03-1982

不是为了永恒 为了记忆

一些曾写过不少文章而目前已停笔的文友，在谈及新华文学的前途时，多感慨唏嘘，原因是华文日趋式微，廿年后新华文学或会成为绝响。新华文学会不会真的在廿年内成为绝响，目前就下定论，未免言之过早。但新华文学工作者若还不醒悟，而一味创作只有他及少数同道者才能了解的作品，那新华文学会加速死亡，却是可预期的。前些日子，日本东洋大学的两位研究东南亚华人社会及其文学的教授，来本报访问时就曾问我们，以华文水准日益降低的趋势看来，十年后的新华文学必定会没有读者，这难题该怎样解决。我们的回答是，华文前途全系在英校生学习华文的成败上面。为了争取英校生读华文文学，华文文艺工作者有必要走写实的道路。华文文艺工作者若还沉迷在扭曲文字，故弄玄虚的梦幻里，华文文学前途就堪虞。

但即使是前途堪虞，即使是廿年内新华文学会广陵散绝，有能力写作的人，还是应该写下去的。不是为了永恒，是为了记忆。我们的社会原本是移民社会，我们的文化是边际文化，这两大特质决定了我们的文化不可能是世界文化的主流，而只能是世界文化的一脉。如果马华文学始于1919年，而终于2000年，那它就有81年的生命。这81年的生命，记载了我们的社会风貌，社会进展状况，这记载可供史学家将来的研究资料。后人绝对不会忽视了这81年的历史

记载，凭着这一点，写作人就该写下去。

另外一点教写作人必须写下去的原因是，新华文学很可能是中国诗歌史上的宋词，词始于晚唐五代，盛于两宋，而衰于元朝，新华文学很可能衰于2000年，此后不是说就没人用华文写作，而是说华文文学不是主流，它要让位给英文文学，就如词要让位给元曲一样。但词虽让位给元曲，它并不会因此丧失它灿烂时代的价值。要研究两宋社会风貌的学者，一定得读宋词。如果我们在新华文学还有读者的时候，而搁笔不写，就是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我们的文化既是世界文化的一脉，我们就可以把81年的新华文学交托给世界文化长流，新华文学或会断绝，但世界文化长流依然会奔流不息，它就会带着新华文学前进。换句话说，反映时代，反映社会面貌，是我国文艺工作者的责任，在华文还有读者的时候，用华文写作是文艺工作者的责任，他们不用担忧将来华文的前途如何，华文文学很可能被英文文学取代，但这正如宋词被元曲取代一样，华文文学并不会因此丧失它的时代价值。为了记忆，但不是为了永恒，华文文学工作者应该继续写下去。

06-04-1982

专栏作者的苦恼

孔大山最近写了《八婆》，既对那些江郎才尽，而只能在自己身边琐碎事件绕圈子的专栏作者刺了一下，又以自己为例，说倘若有一天，他的三十六道板斧都玩完了，沦落到要露着肚脐在读者面前幌来幌去，那该怎么办？他藉此来说明专栏作者的不易为，这真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但只要处理得当，专栏作者是不会有题材枯竭之患的。

专栏作者要避免以露肚脐来哗众取宠，首先就得进修。他最好是心无旁骛，一写完专栏，就去看书，而且最好什么书都看，阅读范围广阔，才能触类旁通，对什么问题都能有点见解，这样题材才不会枯竭。书看厌了，他最好是去坐咖啡店，观察别人怎样生活，这也是在阅读，不过对象是活的人，而不是死的书。

在阅读书本或观察活人时，他要多思考。多思考，他就能发现这社会有很多值得他担忧或发笑的事、的人。但他的情操最好高一点，别把别人都当作傻子，俗人，只有他自己最清高，最有头脑。这样他才不会整天唠叨自己生活中遇到的一点小情趣，孩子会背诵唐诗，或太太给蚊子叮了一口等等身边琐碎事。作为专栏作者，我以为他应该有“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胸襟，不然，他还是去享受“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的意境好了。但这样说，并不是教他整天愁眉苦脸，或者象孔夫子那样遍游天下宣传他的学

说,那是大可不必的。 he可以和常人一样笑闹,也可以喝酒唱歌,不过不能天天醉,在笑后,喝酒后,唱歌后,他要多思考。多思考社会问题,国家问题,人生问题,那他就有题材多得不胜写的乐趣。

要避免神经病,他最好每年休假三个月,而且要到外地旅游去。在度假期间,他要什么都不想,打球就打球,跳舞就跳舞,爬山就爬山,游泳就游泳,一句话,尽情欢畅。这种尽情投入新环境的生活经验,三个月的,足够他半年使用。如果在旅游中,他太急于收集写作题材,他就会犯上为了结婚而结交女朋友的错误,不单精神紧张,而且所选择的往往不合心意。

这些这些都是专栏作者要遵循的生活方式,而以我国的经济成就,专栏作者要有这种种生活条件,是易如反掌的。可惜的是,华文日趋式微,华文的市场价值也就日益低落,因此专栏作者想要每年有三个月假期,可能是个梦想。既然可能是个梦想,我担忧专栏作者的倒不是题材枯竭,而是长期操劳以致患上神经病,既患上神经病,就很可能露着肚脐在读者面前幌来幌去的,这见解我倒是与孔大山不谋而合的。但这是谁造成的悲哀,我看可以研究研究。

13-04-1982

文史学家为何困惑

写作的人最难克服的困难是跳出自己的亲身经历，而冷静地以客观的眼光来看自己的作品，从中寻找出作品的缺点，并从而加以改善，正由于有这困难，写作的人往往会把己身的经历，来弥补他作品中所缺乏的情景，而误认自己的作品可感天地，泣鬼神。但究其实，则其作品是漏洞百出，毫无可取处。这种“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弊病，实在是“只缘身在此山中”致然的。

同理，作为一位文史学家，他往往最容易犯上的错误，也是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以己之好恶为褒贬的标准，从而造成党同伐异，排斥不同派系的弊病。但对文史学家来说，他并不是不知道在评论或总结人物或事件时，他应该客观，不偏不倚的。和写作人的不能跳出己身的经验框框一样，文史学家是在下意识里潜伏着合我心意者都是好的，不合我心意者都是坏的观念在作祟，而致使他不能慧眼识英雄的。

这样说，是不是就可断定文史学家不能较客观地分析事物呢？却也未必。凡人最难看得开的是他与别人之间的恩恩怨怨，这种特性东方人尤为突出。也许正是东方人把人与人之间的恩恩怨怨看得很严重，他们就只有在与大自然取得协调，要与大自然融洽相处，从中取得在人类身上拿不到的温暖，这结果是东方科技不发达，这损失委实太大了。相对地来说，西方人是把人与人之间的恩怨看得

淡薄一点的，由于看淡人间的恩怨，他们就把人性的好斗用到征服大自然上面去了，其结果是西方科技特别发达，也因此美国太空梭已射入太空，但中国四人帮的残余分子，还在搞报仇的勾当。东西文化的差异，实在大得令人惊奇。

要作为一位公正的文史学家，他最该认识的是，他的敌人是他要编纂的文史，而不是文史中的人物，只有把“仇恨”的对象，从人与人之间的恩怨转到文史工作上去，文史学家才会呕心沥血地把文史工作做好。换句话说，文史学家若能把文史编得越客观越全面，他才算是完成他击败敌人的任务，否则，他若只一味排斥异己，那只是在挖自己的烂疮疤，于己于人都是无益的。

因此要作为一位公正的东方社会文史学家，他最该抛弃的是传统的以个人恩怨为取舍人物的弊病。只有彻底做到就事论事，以所做的工作为他的头号敌人，他才可能是一位突出的文史学家。中国古代文人以诗进高官以求功名，以写墓志铭来表扬某人以达致利己，都是很不好的作风，都隐然含有操生死大权于己手的恶习在。文史学家只是学者而不是判断是非的大法官，在东方社会，文史学家不仅是法官，还是以己之喜怒哀乐为判案的法官，文史学家在东方社会常招来物议，原因在此，但这覆辙却是我们最该避免重蹈的。

17-05-1982

精通外文与体验生活

本年度书籍奖华文组得奖人之一的蓁蓁，在接受《海峡时报》的陈永堃的访问时曾说，本地的华文作家应加强英文来增广视野。他认为多懂一种语文能使作家“立体化”，能看到单语的人看不到的空间。蓁蓁也谈到现代的年轻作者，写作题材狭隘，无病呻吟。蓁蓁的这两个意见，的确是击中时弊，很可供写作人参考。

华文文学的一个特点是文以载道的气息很浓，这是传统，但不一定是优点。文以载道的作风发展到末路，要不产生劝世文，就会出现歌功颂德的文章，而致使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这是文学的致命伤。要冲破文以载道的框框，单单阅读华文作品是必不能做到的，但即使阅读已译成华文的外国作品，由于译者很可能也是深受文以载道思想影响的作家，因此他所选择的外国作品，也还是带有文以载道特质的作品，这就会使阅读华文译作的外国作品的读者，也误以为文以载道是全世界文坛的公认真理。从这角度来看，一个华文作家，若能直接阅读原文的外国作品，他就不只能扩大视野，也能打破华文文学既有的思想框框。

要打破文以载道框框，并不等于说文学不涉及现实，恰恰相反，文学应该是以反映现实，以指陈时弊为其要务。不过，文学不同于社会学的地方在于，文学家可以有社会学的知识，也可以用社会学的观点来分析现实，但在表现这些现实时，文学家是通过感性的人

物与形象，来阐明他的看法，而不是以科学的剖解来缕述社会现象。

任何作家如果不关心时事，不提高自己的思想认识，他对整个社会现象，就只会感慨，这结果是，他只能从感性认识的阶段，来孤立地描写与他本人有切身关系的社会现象，而不能从理性认识的角度，整体地来剖析社会现象，从而写出与大众利益有息息相关的作品来，这就是某某所说的那些年轻作者无病呻吟的原因。

我们想进一步说明的是，能直接阅读外文文学作品，只能帮助作家扩大他的文学视野，并提高他的写作技巧，但并不能帮助作家去认识他所处的社会。作家只有多阅读哲学、政治、社会及其他范畴的书，由此提高思想认识，才能对错综复杂的社会现象有透彻的理解，也才能从中取舍题材，来创造既有现实意义而又能感人的作品。

但是，能直接阅读外文作品，却真的能体会到文以载道，在某种程度上来说，是道学家强加给中国文学的一项任务，是外国文学所没有的。文以载道思想若受到过分的宣扬，就会窒息作家的性灵，致写出索然寡味的劝世文来，宋诗大多不能卒读，就因受理学的影响致然的。也因此，华文作家确实应该多掌握一两种外文。

22-09-1982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朋友和他的太太到邻国的一个小岛上度假回来后，颇为该岛上居民刻板的生活唏嘘不已。岛上生活宁静，只有两个小市镇，居民以收割树胶与种植果树为生，生活节奏缓慢，方式单调，朋友很不习惯，住了五天就跑回来了。

朋友说岛上年老居民，每早赶看日出，黄昏则欣赏晚霞，此外别无娱乐可言，因此朋友很为那些老年人的境遇叹息。朋友的这些感触，很引起我的深思与赞同。这几天来，我反复思考，却发现我们久居闹市，无形中也卷入竞争的漩涡中去，致丧失了人性本爱山丘的特点。

人生在世，就要立功立德立言，这是东方社会知识分子的抱负。人生在世，就要追求荣华富贵，物质享受，这是西方的人生观。这两种人生观都没有错，人类社会能不断进展，科学会越来越昌明，基本上是根源于人的欲望的。

不过，过分追求现实这种人生观，却也产生了一些弊病，从消极面来看，过分追求荣华富贵及物质享受，就易流于营营苟苟，只为三餐有山珍海味，而不知人生原来还有好多精神境界可开拓，当然就更不知道家外还有社会，还有国家了，这种人在我们的社会里比比皆是。从积极面来说，急急于立功立德立言，就会犯上忧患意识太重的偏差，这种“人生不满百，常怀千岁忧”的处世态度，往

往也会使人但知为别人着想，而忘了开拓自己的人生境界。

人活在世上，当然不能不为社会做点有意义的事。但与此同时，若能不断从日常生活中去发掘情趣，不断从大自然中去寻求美的意境，那不只能减低你追求物质享受的欲望，也会减轻你的忧患意识的负担。

朋友与我原先为邻国小岛居民的恬适生活感慨，归根结底是忧患意识在作祟。人原来就脱离不了大自然的，因此朝看日出晚望彩霞的生活，未必就是浪费生命的。我在十多年前曾读过美国著名散文家梭罗的《湖滨散记》，很为他笔下的山光水色，丛林鸟语花香而神魂颠倒过。于今还未达不惑之年，但我对白居易与王维晚年的闲适诗，却非常喜爱了。

白居易的《秦中吟》，新乐府诗，并非不好。王维早年的反映社会风貌的诗作，也很感人。但我自觉能为这些诗赞叹不已的年龄已过，我倒喜爱吟吟王维的“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返景入深林，复照青苔上”，或《独坐幽篁里，弹琴复长啸。深林人不知，明月来相照》，或“人闲桂花落，夜静春山空。月出惊山鸟，时鸣春涧中。”，或李白的“众鸟高飞尽，孤云独去闲。相看两不厌，只有敬亭山。”品味这些闲适诗的意境，就能令我们恍然大悟，深居小岛看日出日落，未必就不是幸福的人生。有时看厌了在这都会中营钻者的丑恶咀脸，我倒以为柳宗元的“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是个可追寻的凄绝人生境界。

16-10-1982

文学题材与生活经验

人的经验有两个来源，一是亲身经历的直接经验，一是从书本或大众传播媒介而来的间接经验，直接经验由于亲身经历，感受特深，间接经验由于非亲身经历，感受就没有那么深刻。

文学作品的题材，可说是作者从亲身生活中去摄取的。但这样说，并不排斥作者可以间接经验作为作品情节的架构，而只是说，亲身生活体验是文学作品的主干，而间接经验只是枝叶的烘托。即使是象西游记这样的想象成分很浓的作品，作品中的人物与情节，也还是作者从现实生活中的经验去提炼出来的。

强调亲身生活经验的重要，并不等于说每事每物都非亲历就不可动笔。凡事凡物都须亲身经历，非但不可能，而且是没有必要的。有些人强调，要写非本身经历的事物，就非得去经验此事物不可，这种作法应该是写报告文学的作法，而不是写文学作品的作法，文学作品，或多或少都是作者的自传。唯其带有自传的特质，文学作品是以作者的亲身经验为主调，而间接经验只能是辅助。

决定文学作品成败的关键是作者的亲身经历与情操，而不是作者的间接经验。作者兹有关怀国家与人类前途的情操，那即使他写的只是身边琐碎小事，也必是有价值的。作者本身若是情操卑劣的人，即使他的亲身经历是如何惊天动地，他的作品也可能是毫无足取的。

人的时间与活动范围都很有限，他不可能对每一种生活与事物都有机会经验过，也不可能刻意去经验每一种事物，才来下笔为文。由于作者只能就近取材，写身边的生活感受，这就要求作者要有热爱生活的激情，分析生活的能力，与关怀人类前景的情操，这样才能从滴水中见到海洋，从一粒砂中看到世界。

由于人的生活经验都有所局限，理想的做法是，各个阶层的分子，都应该有能执笔为文的人存在。这样产生的作品，才能感人。由局外人经过几个月的生活体验，就下笔写工人生活的作品，应该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教育还未普及阶段时的过渡时期的作法，而不是理想的作法。

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既不用过于强调写作题材的大小，也不用耿耿于怀没法体验每一种生活。文学作品所表现的，不外乎真善美，能表现这种境界的是作者高尚的情操与真挚的感情，而不是题材的大小，或何种性质的生活经验所能决定的。

29-10-1982

我国华文文学的生命源泉

总理公署高级政务部长兼人协副主席李炯才先生，在国际华文文艺营开幕礼上说，华文作品在东南亚的市场越来越小，因此中港台开放其市场给华文书籍，是对华文作者的最佳奖励办法，这呼吁是及时且正确的。我国的华文作品能销售到港台的，为数甚少。我曾在东京的华文书店看到本地的一些作品集，但东京华人不多，且多已在文化上与日本人同化了。在东京的年轻华人而能阅读华文的，更是凤毛麟角。本地作品要在东京和中港台的作品排在一起，来争取那为数甚少的华文读者，实在是守株待兔，白费心思。

所谓文化交流，应该是双程交通，而不是单轨的输送。我国一向来对中港台的华文作品，除少数带有很浓的政治味的而外，都准其入口。这种开明政策，使我国的华文写作者不只能从此三地的名作家的作品中学习到写作的技巧，还能通过阅读华文书籍而获取各方面的知识。反观中港台，由于对海外华文作品有意或无意的忽视，致使此三地的读者对东南亚的华文文学的现状，或社会的风貌，都很陌生，这是个不小的损失。

文化交流，从知识交换这角度来看，确实有点象贸易上的互通有无。不过，中港台的没开放市场给东南亚的华文书籍，对东南亚的华文作者来说，固然是一种损失，但蒙受更大损失的，却是此三地的读者，这是文化交流单程交通的弊病。因此，在国际华文文艺

营举行过后,此三地的有关人士若能从此采取具体步骤,有系统地介绍及输入我国的华文作品或书籍,那才不会失去这次交流的意义。

不过,即使有了海外市场,并不等于我国的华文文学自此便自然而然地会蓬勃起来。争取到海外市场,对我国的华文写作者无异是寻觅到一种激生素。但单有了激生素,而没本身成长的条件,却也无从产生相当水准的作品来。我国华文作品所必然具有的地方色彩,是我们的作品能在中港台吸引读者的条件,但拙劣的技巧,会对这种色彩起着破坏作用,而致引不起读者的阅读兴趣。可见争取海外市场,只是我国华文文学寻找生路的一个办法,本地写作者能在主观上努力提高思想认识与写作技巧,这才是我国华文文学能否延续下去的最主要条件。

从更长远的角度来看问题,我们甚至可以说,年轻一代对学习华文所持的态度是否正确,及他们阅读华文的能力或以华文表情达意的技巧的高低,才更是我国华文文学存亡的关键所在。任何国家或区域的民族文学能否蓬勃,是与该民族的文字在该国家或区域是否受到民众的重视息息相关的。我国华文文学的兴衰,胥视年轻的学生对汉文的重视与否而定。

举办国际文艺营讲座,是刺激本地文学蓬勃的办法之一。从根本上鼓励学生重视华文的学习,是延续与发扬我国华文文学生命的途径。只重视前者,会产生少数写作者往往要到海外朝圣的弊病;但过于忽略了它,也会产生本地写作者囿于己见,而不能从较高的角度来看问题的弊病。不过,我们要认清的是,不断培养广大学生喜爱华文文学,喜爱本国的文学作品,才是包括华文文学在内的我国文学的长生之道。

争取海外市场若在未来成为事实,对我国华文文学工作者的激励是无比巨大的。作者从海外市场的利润中分享到的酬劳,也可能促使我国产生职业华文作家。但这样的美好远景,必须在华文普遍受到重视的前提下才可能出现。因此我们认为好好教导学生认识学习华文的重要性,才是我国华文文学的真正生命源泉所在。

18-01-1983

华文文艺应该脱离报章吗？

星洲日报副刊主任兼执行编辑黄彬华先生，日前在国际华文文艺营上的有关报章与文艺的讲话，固然发人深思，但也有值得商榷之处。他认为世界报章的发展趋势是，报章的基本任务是报导与评论，其次是提供情报，因此今后副刊扮演的角色，是增加读者的生活情趣，增广见闻与激发文化共鸣，且副刊文章是小块式的。他的立论是，华文报章的竞争对象，已不再是南洋与星洲，而是与英文报章之争，而华英文报章的生死存亡之争的胜负，是看谁的报导准确快捷，评论客观正确，内容充实可靠而定。

华文报目前的特色，确实定是各报在副刊上出尽花招以吸引读者。黄先生认为报章的主要任务是报导与评论，这是对的。不过，华文报能靠加强副刊来吸引读者，这说明华文报章同时在扮演着两种角色，一是报导与评论，二是传播文化。在加强后者的同时，若在有意或无意中忽略了对前者的加强，那要改善的是报导与评论，而不是取消后者。

附在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的确是温室里的花朵。如果气候适宜，花树本身的条件够，这花树应该放到室外去承受阳光的照耀与风雨的吹打。问题是，在马华文学繁盛的50到60年代，文艺尚且未能全然脱离报章而独立发展，在这华文文学面对风雨飘摇的困境时，报章如果抛弃文艺副刊于不顾，那只有加速华文文学的死亡，并从

而导致华文报章危机的加速出现。

附在华文报章的文艺副刊, 不仅提供现有写作者予耕耘的园地, 更重要的是, 它也在培养有写作潜能的新作者。而且, 它也争取了文艺的潜在读者。在幅员小, 人口少, 而语言种族复杂的我国, 任何纯文艺刊物的读者, 都很难支撑一份有水准的文学杂志的。

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 我国国民素质与先进国的一比, 还是相当低的。提高国民素质, 无疑的是华文报章的一个重大任务, 而能胜任这角色的是推广文艺。在我国的特殊环境下, 华文报章若只加强报导与评论, 就只能收到提高国民认识事物水准的效果, 而未能做到提高国民欣赏精神文化生活的水平。

只有不断地普及文艺, 使文艺读者群日愈壮大, 那文艺才有办法脱离报章而独立更生。我们认为这样的时机尚未到来, 由文化节的款项须由成功企业家的赞助一事看来, 便可证明华文报章即使要走怎样的纯商业化道路, 它切切不可抛弃传播文艺的角色, 否则, 华文报章会更快消失掉。

我们面临的问题是, 华文报章与书籍的读者日益减少, 廿年后华文报章的读者会骤减, 几乎是无可争辩的事实。那华文文艺的更难有读者, 也便是未卜先知的了。在这样的困境下, 华文报章若真的抛弃文艺副刊, 那紧随着文艺读者的渐渐减少的同时, 就是华文报章读者群的日益缩小了。

从报章与文艺发展的角度来看, 文艺必须脱离报章是健康的现象。但在华文文艺读者非常稀少的现在, 在文艺还没独自生存的条件下, 就把它从报章上掷弃出去, 这种做法无异是把幼嫩的花苗, 置放在狂风暴雨下, 而希望它能茁壮地成长起来。这种希望肯定是不切实的。

19-01-1983

华文报章与文艺应相依为命

一种文字能否在一个国家或社会延续下去，胥视该种文字是否有社会功能而定。在多元种族的我国，英文既已是行政语文，它在经政上的地位，即使没造成其他语文在经政上全然无用武之地，至少也使它们黯然失色了。

使用英文的美英，不只科技先进，影响所及，美英在大众传播新闻事业与学术研究方面，也较世界各国先进。在亚洲，到目前为止，在学术研究上能和美英分庭抗礼的，应该只有日本。但在政论或时评及其他经政与文化的研究上，日本无论在方法上，组织规模，人才的济济方面，都还是落在美英之后的。

英文在科技与学术研究方面的先进，造成世界各国对英文的特别重视，这现象至少会维持三、五十年之久。我国以英文为行政语文，用意应该在此。但其客观后果却是，造成华巫印族母语的社会功能减低。因此，若从纯功利观点来看，则母语对某些人来说确是可有可无的语文，这对华人来说，也不例外。

在此时此地，对华人来说，华文唯一可见的最大功能是文化与价值观的传播。我们相信，这项功能是英文所不能负起的，而这也正是华文唯一的生路。理由是，华族文化与传统是一座深锁着的大花园，内有奇花异卉，曲桥流水，楼台亭榭，万紫千红，风光明媚，而能打开这花园的锁匙是华文，不是英文。英文只是这深锁着的花

园的一个小窗口的锁匙，打开小窗口固然也能看到这花园的一隅佳景，但要一览全景，却非得通过华文不可。

惟其英文在世界上与在我国地位，才造成以往的马华文学与现今的新华文学，必须和报章联为一体，才有办法生存。我们可以预测，如果一切条件不变，华文报章与文艺的相互依命的关系，在可见的廿年内，只能朝向加强的方向发展，而不该转向脱离关系的道路走。

英文在经政上的领先地位，必然形成我国的才智之士会以英文而不会以华文来撰写经政评论文章。加上事实是，世界上以英文撰写的经政论文远较其他语文的为优，华文报章要想在时评上出人头地，大概只有假借英日文时评的力量一途，而这对我国的知识分子来说，肯定的都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因此，较客观与冷静来看华文报章的前途，它的重大任务应该是传播文化与传统价值观，而这正是它生存的本领。当然，从东方人的观点来评论世界局势与本地时事，也是华文报章的另一任务。不过，过分强调华文报章的报导与评论任务，而致忽略了传播文化的任务，在客观效果上就会产生紧随着独立文艺刊物的寿终正寝，便是华文报章的逐渐没落了，更具体地说，华文报章是以通过传播文化来完成它吸引读者接受它具有东方观点的报导与时评的任务的。换句话说，华文在我国的局限性功能，是华文报章不能象世界各国的其他母语报章那样能充分发挥单单以报导与评论为其要务的原因所在。

21-01-1983

爱美使社会进步

中国的电影杂志《大众》，在其5月号中以老明星张云作封面，结果只销售一百万份。该杂志每期的销售量为九百万份，5月号却剩下八百万份销不出去。编辑人员因此紧张起来，召开紧急会议，议决把封底的年轻貌美女明星倒放过来作封面，结果终于把剩余的八百万份卖完了。这是刊载在《新报》的一则趣味性小新闻，但它说明了一个真理：爱美是人类的天性。

理想主义者教条地把一切事物机械化的结果是，在违反人性的桎梏下，一个社会或国家的一切事物都僵化了，社会停滞不前了。在体育竞赛的场合里，理想主义者强调友谊第一，比赛第二。在文化艺术领域里，他们提倡革命性比艺术性重要，在经济范畴内，他们相信生产关系比提高生产力重要。

理想主义者的一切行为，表面上看起来是维护真理，其实它的后果是阻碍社会进步。老明星不是说没人尊敬她或他，但年轻貌美的女明星才是众人爱看的对象。这应该与异性相吸拉不上关系，而是最彻底地说明爱美，爱护新生事物，是人类的本性。唯其人类有爱美好事物的本性，人类社会才会不断地进步。如果众人对皱皮鹤发的老明星有兴趣，要不说明那些人的心理有问题，也至少说明人类的审美观已陷入可悲的绝境了。

我们常说邪不胜正，恶不敌善，其实便是人类爱美的精神力量

在起作用的结果。爱美表现在精神上是对美好艺术的追求，表现在物质上是对丰富物质的追求，这两者只要取得适当的平衡就是好事，颠倒是非、美丑，而硬要说这是真理，这是教条主义者最大的悲哀！

27-05-1983



为下一代制造不寂寞

几位朋友聚在一块，总要喝上几大杯的啤酒，无非是想在几分微醉中，说些互相激励的话，这也是很无可奈何的事。物质生活是相当丰富了，但精神生活呢？理论上也可从阅读书报来充实的，但有名山大川吗？有名胜古迹吗？难怪经济条件较好的朋友，一有假期就纷纷往外国跑。

没法子跑外国的，便只有寻觅哪家菜馆或摊位的菜烧得好，有空时三五成群去饱餐一顿，也算是增添点生活情趣。人是怕寂寞的，大家多聚聚，发发牢骚，生活也似乎不太单调了。

但能永远这样生活下去吗？我看没多大意思。在这时代而生活在历史短暂的国家，是要苦闷的。不过，历史却不可以象快餐那样速造的。该怎么办呢？我看现在感到苦闷的人，就该动手做点事。

方块字在这儿还有多长的生命，十年？二十年？没人能预知。但能写的就该继续写下去，即使有一天方块字在这里成为古董，至少也为我们的后代的博物馆，多增添一些古迹资料。寂寞的人，为下一代的人多制造些不寂寞的东西，这应该是有意义的事吧。这会不会比只喝酒，只逛名菜馆名摊位更有意义点呢？

28-06-1983

小国也有人才

杨振宁教授在电台的两小时谈话，实在教人听出耳油来。他对每一个问题，都有非常正确和独到的见解。别的不说，单单只提他说新加坡并非没有条件培养出科学家一事就教人钦佩的了。

或许是实用主义泛滥的结果，好多人认为新加坡不可能产生世界级的作家、运动员、科学家。杨教授却认为新加坡的经济成就已达致相当高的阶段，也不乏深具科技技术的人才，只要主观上有培养科学家的愿望，并在事实上去推行，科学家是不难产生的。他举例人口只有五百多万的丹麦，说明小国并非没有人才。

我相信杨教授的话很有道理。经济可说是培养各种人才的最主要条件，经济一有成就，许多问题都好办多了。但大家也须有主观上的强烈愿望，否则也是枉然的。

仔细想想，有时真要为实用主义泛滥，而导致经济成长，结果却没能适当分给有才华的艺术家、科学家等等而惋惜。就拿以华文写作的人来说吧，香港出现职业作家为时已甚久，为何新加坡独独没法培养职业写作人？最简单的道理是，本地文学作品不受重视，任何写作人若希望靠写作谋生，就只有饿死。因此，写作人只好寻觅一份职业，而在业余写点东西，这情况若没得到改善，新加坡就难以产生有水准的文学作品来。其他各领域的人才，若要让他们有施展才能的机会，也非得更适当地把经济成果分给他们不可。

抛弃自卑心理，抛开实用主义，站在更高处来看问题，把经济成就的一部分用来培养各方面的人才，不只会使新加坡在国际上有更高的地位，对国家意识的形成，也会有所促进作用。

30-06-1983



诗才与商才

君子固穷，这是很迂腐的观点，也是传统华人社会读书人的看法，这看法既误人又误己，也误国。个人若致富，国家的物质成就就高，连带而来的，文化艺术也才会兴盛。但也不是因此就说，人人非得混进商场不可。以为从商可赚钱，又从而否定从事精神文化者对社会的贡献，这是以己之是，判别人之非的作法。

人非低等动物，求温饱是生存的条件，但创造文化艺术，却是丰富人类精神文化的途径，至少与创造物质一样重要。现今社会进展迅速，分工越来越细，造成隔行如隔山的局面，因此若有人以为自己既可创造物质文明，要非自欺欺人，便是幼稚无知。

物质文明会改变精神文明的面貌，但精神文明却又会倒过来影响物质文明的进展。这二者原本不可截然分隔，但人的秉赋，各有不同，是研究学问的料，还是从商之材，多少有点先天已决定的成分在。陶朱公固以巨富文明天下，但讲诗才却只能推崇李白了。陶朱公当年若想在成富翁之后，再来写诗，他不只不会成为李白第二，我看连钱也要赚不到的。

古代的社会结构较今简单，古代的各门学问，也不似今之繁复细分，陶朱公尚且没法同时成为李白。那在今天的每门学问，都要穷终生精力才会有所成的情况下，要想同时成为陶朱公与李白，这办得到吗？

19-07-1983

雅士的可恶

虔诚的教徒教我钦佩的一点是，他们不但自己精神有所寄托，逢人还苦口婆心劝导别人入教，即使遭到旁人的讥笑，他还是逢人落力说教。信教能不能摆脱人生的苦闷，而获得精神上的快慰与幸福，我非教徒，无从知道。但社会能一天天进步，却是由于有许许多多具有教徒般热忱的人们，在关心与指责社会上的一些偏差促成的。

住进舒适的屋子，焚香读书，煮茶下棋，学书习画，浑然忘群地在小室里过着优雅的生活，这是一些知识分子的理想。只要他们不害人，那人各有志，谁也不会去说这种知识分子的是非，不过，这种人往往又会以己之是，议人之非，非要别人也跟着他们优雅不可，那就可恶了。

可恶的地方在于，这种人什么事都不做，活着只为自己的与家庭的幸福而奋斗，但又看不惯别人在做事，就訾议别人不知死活，不识时务。好象整个社会的人，如果不和他们一样悠哉游哉地生活，就是不明智的人一样。

其实社会会进步，归根究底，还是靠好多埋头苦干，仗义执言的人来实现的，我从不讥笑虔诚教徒说教时的口沫横飞，或从事社会工作者的奔走繁忙，或议论家的据理直争，这些人表面看起来是傻子，其实是社会进步的原动力，没有了他们，雅士们是不可能有关理想的生活环境，来过他们的优雅生活的。

只一味寻求自我幸福，而忘了幸福是众人劳动的结果，并从而批评众人的傻劲，这正是雅士的可恶处。

21-07-1983

品格与作品

中国自儒家思想出现后，文以载道思想就盛行了。其流弊是解说道德与谈论国家大事的文章受到统治者的重视，而抒发性灵之作则只在民间流行。这流弊若我们毫无意识地继承下来，便会写出酸味十足的劝世文来。

但抗拒这流弊的人，却也往往把仁义道德与做人的道理混淆起来，以致得出艺术家的作品与其思想无关的谬论来。

满口仁义道德，背地里男盗女娼，这样的伪君子，当然是创造不出什么感人的作品来的。但不歌颂儒家思想，而只发扬杨朱的利我主义的人，就能创造出感人的作品吗？

阮大铖的《燕子笺》不会是拙劣之作吧？汪精卫的“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不会不感人吧？但阮、汪的沦为汉奸，就使他们的作品成为废物了。理由是，有责任感的作家，要对自己的言论负责。否则，呼吁人们去冲锋陷阵的诗人，自己却躲在象牙塔作夜莺歌唱，吃血淋淋的牛扒，这未免把众人当傻瓜吧？

艺术家的作品，到底是要给众人欣赏的。艺术家当然可以从不同的角度来反映生活，但他本身却须有爱人类之心。孤芳自赏或损人利己的艺术家，即使他创造出多么感人的作品来，那作品也是废品，这不是用文以载道的标准来判决它，而是用艺术归根究底还是要充实人类的精神生活，与促进人类的发展的标准来衡量它的。一句话，艺术家的品格与其作品有关。

23-07-1983

阅历和人生观

人的思想和情操，基本上与他所处的周遭环境有关系，但人的思想与情操的高低，却不一定是与环境有必然的关系。孙中山与汪精卫是同一时代的人吧，但前者是革命家，后者却是汉奸，这又怎么说呢？

肥沃的土地可种鲜花异草，但也可栽可提炼雅片的罂粟花，一样都会生长茂盛的。一个思想龌龊，处处为己利打算的人，即使他游遍天下名山胜水，看遍世界的风土人情，至多只为他的坏主意多提供点灵感而已。

不过，对于有正确人生观的人来说，多接触社会，多遍游名山胜水，无疑的是会扩大他的心胸的，也能增强他对理想追求的信心。

那正确的人生观，何以形成呢？我看与一个所结交的朋友，和所阅读的书籍息息相关。

一个有了正确人生观的人，缺乏阅历，只能造成他的思想稍微偏激，但不会使他的思想成为害人的东西。一个没有正确人生观的人，缺乏丰富阅历，只能使他的馊主意拙劣点，却不会使他的主意变成利人的思想。因此，我想好人应该多游山玩水，以增广见闻，增强追求理想的信心。满脑子是馊主意的人，则要把他放在沙漠里，让他的馊主意在黄沙滚滚中消丧掉。理由是，多馊主意的人，见闻一多，害人就更严重。

27-07-1983

打骂自己人

推己及人原本是儒家思想的精神支柱，但对缺乏面对现实勇气的人来说，却往往把它转化为不辩是非黑白，一味打骂自己人的恶劣作风。

从前住在乡村，就曾看过不少在社会上驯服得如奴才的大男人，回家后却大打骂老婆与孩子出气，理由无他，在社会上与人或老板理论，吃亏的不用说是自己，但在家里打骂老婆与孩子，既不损自己一根毫毛，又能满足自己的自尊。

这种作风一发展下去，就演变为毫无原则地非议朋友，而不敢批评时政。于是我们看到有人指陈朋友不识时务，乱发议论，有人规劝朋友该深居简出，焚香读书，煮茶下棋，理由也很简单，骂骂朋友，既于己无损，又能表现自己的明智与超然。

但正如打老婆与骂孩子会造成封建思想无法铲除的恶果一样，无原则地责骂朋友，往往却是打击正确意见的势力的帮凶，其后果是使冷漠症更为泛滥。

每个时代，每个社会都有其特殊的问题。自己不敢以原则来谈论问题，除顾左右而言他外，又在那儿呼叫别人也别谈论问题，甚至责骂别人的不知死活，这是彻头彻尾的自私自利的表现，但更可恶的后果却是这种呼叫，往往却是在一旁帮忙涂黑正派角色的形象的帮凶嘴脸。我国国民的冷漠，我看大半原因在于打骂老婆、孩子与朋友的大男人太多造成的。

01-08-1983

唱高调

《新一代的价值观》座谈会，是一个不太精彩但用意至善的节目。与会的年轻人都是好青年，因此他们的价值观都很正确。这固然不能代表所有新一代的人生观，但至少说明新一代能推己及人者，为数着实不少。

座谈会中那位说愿意拨出一部分宝贵时间，来赞助同学解决难题的学院学生，可说是拥有助人为快乐之本的精神了，在此时此地，拥有这种精神的人，是往往会招致讥笑的。

我们的社会，似乎已发展到事事为己利着想，才是正常人的想法的地步。因此，若有人敢说做人的道理，要非遭受讥笑，也要被人骂为讲大话的人。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理想，但理想到底有多少成份能达致，这是个大问题。同理，做人的道理，也是全人类的理想，能做到什么程度，也会因人而异的。不过，既有理想在那儿，大家就可凭己力去做，做到多少算多少，总比漫无是非标准，一味为己利而钻营来得好。

问题就在于，任何人只要提到理想，就有可能被指为唱高调。那种眼睛只看到自己鼻尖的利益，而又躲在黑暗处大放冷箭的鼠辈，其可恶处在于，以其利欲熏心的人生观，来判断别人的良善用意。对这种人来说，那位学院学生要非在唱高调，便是傻瓜一个。然而社会会进步，就因为有傻瓜存在。

18-08-1983

文化无国界之分

有空时喜欢写点东西的人，除感叹文章无价，没法藉此谋生外，另一苦恼是喜欢看书的人越来越少。尤其在华文水准每况愈下，读者越来越少的此时此地，还想写华文文艺作品或学术论文，不也是太傻了点吗？

我却不以为然，文艺作品当然带有地方色彩，因此也应该有地方读者群，但地方读者群的多少，并不一定是决定作品有没有永存价值的要素。理由是，文化无国界之分。

好的文章，不会只在某一固定的，为了政治上的需要而建立的国家内流传的。它还会在世界各处流传，而且不限于该作品所使用的文字的国家，因为有能人异士为好文章进行翻译。

要紧的是作品的素质，如果你能写出震撼世界文坛的好作品，是不愁没有读者的。丹麦的现有人口五百多万，在安徒生生活的年代，丹麦的确实人口数目，我不清楚，但肯定会比目前的为少。可是安徒生童话集，在世界各处流传之广，读者群之众，又有几个大国的作家能与他相比呢？

能认识到文化是全人类的财产这道理，我们就有信心继续写下去。以新加坡的现有人口只有两百多万，又分为华英巫印四种语文的事实来看，要期望有任何语文会出现杰出的作品，是不太容易的。这点或许至少要使我们感到比丹麦人自卑，但却不足以成为我们掷

笔叹息的原因。

能从小岛往外望一望，能认识到创造文化是全人类财产的道理，我们就能不为一小部分人的不学华文或不阅读华文文艺而悲叹或不写作，而能锲而不舍地写下去。

22-08-1983



炒 粿条和写文章

卖炒粿条的小贩炒出来的粿条，难免要千盘一味，而顾客的口味却各有所好，因此小贩受到顾客的批评，是无可避免的事。写文章也和炒粿条一样，每位作者都有自己的一套人生观或思考方式，因此写出来的作品，也难免会有观点上的偏差。一篇作品发表出去，难免会引起持不同观点的读者的批评或誉议，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对作者来说，读者的批评，应该是于己有利的意见。作者应持着有过则改之，无过则勉之的态度来对待读者的批评。如果作者摆出我对事物的看法是最正确的姿态，损失的无疑是他本身。他不能从批评中求进步是一回事，坚持自己的谬见而终于慢慢失去读者，那才是更大的损失。

对读者来说，他应当明白，作者也是普通人，他不可能对事事物物都有正确的了解，因此偶而写出一两篇观点稍嫌偏激的作品来，也不是就该受到无情的打击与谩骂。

而且，炒粿条的小贩在心情不好时，很可能炒出一盘太咸或淡得近乎寡味的粿条来；写文章的人在情绪不好时，也很可能写出一篇观点偏激的作品来的。我们绝不能因为炒粿条头手的偶而失手，而断定该位头手是没用的人，同理，我们也不可以以某位作者的一两篇观点不正确的文章，而宣布他的死刑。小贩和写文章者的处境到底是一样的，他们都是为了生活，当然，我指的是以卖文为生的文人，而不是业余写作者。

01-09-1983

文艺拉车手

大众传播媒介的在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文艺的重要性，固然是文艺在我们的社会日益衰退的原因之一。但更重要的，却是我们的社会缺乏深厚的文化根基。因此，快餐式的软性读物与录影带，就大行其道了。

吃个什么包，啃点什么鸡，再看看什么录像带或消闲漫画，几乎是这都市的年轻人的标准生活方式了。当然，这样生活着，也能快快乐乐地过一生的。问题是，不吃正餐，身体会不会因此而虚弱呢？

是不是说我们就不能做一点事呢？我看办法还是有的。办一份综合性的，既谈上下古今，也刊登文艺作品的适合年轻人的杂志，应该还会有读者的吧。

但谁愿意来领头呢？谁愿意出钱呢？这才是关键问题，只希望有钱的文化商人，能够挺身而出承担这重任。

大众传播媒介的缺乏刊载文艺场所，部分原因也是群众缺少冲劲的结果。有认识的文艺爱好者，带头出发发动群众搞创作，应该是突破文坛沉寂的好办法。文艺只有在群众的支持下，才会有深厚的发展根基，文坛也才会活泼与热闹起来。

有谁愿意在众人都只追求名利的此时此地，做个拖着文艺马车前进的拉车手呢？若有，则文艺就不会一再衰退下去。

05-09-1983

巧妙的构思

原甸最近写的那篇《构思的独特》，颇能道出写诗成败的关键来。自华文成为华族子弟的第二语文以来，中学生能读懂文言文的，已少如凤毛麟角了。但一些自命为新潮的年轻人，在文字基础尚未打稳时，竟然以扭曲文字，创造些不合乎语法的句子为荣，并美其名为新诗。这实在是走进写作的死胡同去了。

这些年轻人最喜欢写作的体裁是新诗，原因是，写出来的新诗，若因文句不通而使人百思莫解，他们却可沾沾自喜地说，那是含蓄。我曾经看过这批年轻人写的散文或议论文，真是文句不通，错误百出。通篇文章，毫无结构可言，而只是杂乱地堆积素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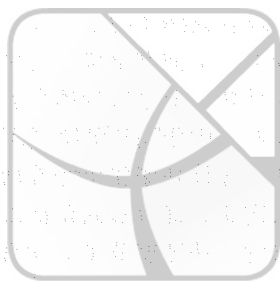
写作固无捷径可走，但文字要通顺，却是最基本的要求。其次是作者的思想认识，最后则是作者的巧思。要在语言上取胜，倒不是最大的难题。要对某一题材，作正确的处理，也不是太难的事。最难的倒是构思。

每个写作者，都有他独特的构思方法；但每个写作者，却都容易陷入他特定的构思模型中去。原甸强调，一个诗人要在语言上与形象上，有所表现并不太难，但要求构思独特、新颖、巧妙和别具匠心，倒是难度相当大的课题，这真是经验之谈，足供年轻写作者参考。

对某些以扭曲文字为荣的年轻写作者，我想他们即使没能力或

时间去好好修读古典文字，也应该好好精读五四以来的上乘白话文作品。只有娴熟地掌握了语文，再在提炼题材方面费点心思，并在构思方面大下功夫，才有可能写出成功的作品来的。标新立异，哗众取宠，只能取得无知者的空洞的欢呼，但却教有识者心痛。

09-09-1983



高级迷信

《火烧圆明园》最教我感慨的是，清军骑马握矛进攻联军的镜头。由于联军以逸待劳，又拥有枪炮，清军即使如何勇敢，如何爱国，也只有落得人仰马翻，全军覆没的命运。

从一部中国史来看，中华民族的确是不屈不挠的。此中原因很多，但华族文化较高，应该是华族历经五胡乱华，元清三百多年统治，而始终没被他族同化，却只有同化他族的要素。

唯其如此，华族的一些迂腐分子，就自以为高人一等，即使国土受蹂躏，也阿Q式地自我解嘲一番。把外国人形容为蛮夷之族，以示自己是开化的；把外国人的侵略指为野蛮行径，以示自己是爱好和平的；把外国人的锐利武器视若无睹，以自己的爱国热忱去迎战敌人，这些都是迂腐分子的行径。

火药、印刷术、纸、罗盘针，的确都是中国人最先发明的。但中国为何较别人落后呢？这值得深思。文明最早，虽不一定衰亡得早，但在强权面前显示文明以表明自己先进，在锐器之前显示浩然之气，以表现视死如归的精神，这是清末中国受列强宰割的原因。任何国家的国民，在八十年代若还相信浩然之气可以御敌，那就只是一种“高级”迷信。

29-10-1983

开拓生活深度

即使少出国门的新加坡人，在周末礼拜有闲暇时，也是要感到很寂寞的。对曾经在外国呆过的人来说，有闲暇时就更感到闷得发慌。几个可逛逛的名胜，一去再去的结果，就再也引不起游兴了。于是在星期天往西马跑的人，就越来越多了。但没车又有孩子拖累的人，却是要连这点乐趣也没法享受的。

是不是说住在小岛上，就注定非要过精神空虚的生活不可呢？想想，这也不尽然的。旅游原本就不是经常可即的赏心乐事，金钱与时间都是难以兼而有之的。因此，即使是居住在泱泱大国者，也不一定常常藉旅游乐趣，以增添生活情趣的。

生活情趣的获得，来自对生活深度的开拓，而生活深度，却来自对居住环境的创造。所谓生活情调也者，其实就是在日常生活中融进文化色彩而已。因此，雨夜与三五好友聚首咖啡店共饮，对有文化修养者来说，不妨想象为古人把杯茶楼酒肆的情景，这么一来，发思古之幽情，就不是无中生有的了。

但藉古抚今，到底是美中不足的。若能在住所附近创造深富情调的场所，让今人抚今并展望未来，则那种现代情思就更为幽远了。从这点来看，建屋局想在后港和碧山兴建餐馆街道，就是开拓生活深度的措施了。

13-12-1983

发展话剧的障碍

科学与艺术并不会相克，但传统艺术若不能利用科技的成就，来进一步提高它的表现力，那传统艺术就会成为曲高和寡的事物。日本的鬼戏“能”，与古典戏剧“歌舞伎”，在现代的日本社会已不受年轻人的欢迎，这固然是由于电影、电视剧与录像带已抢去了大部份年轻观众，但最大的原因恐怕还是这两种艺术形式过于陈旧，已不适合科技发达的社会需求了。

据说电子乐器并无法取代钢琴、小提琴、大提琴或其他乐器的。但诗余是词，词后是曲，古典诗歌衰歇后是新诗的崛起，都在说明艺术形式要不时改变，以适合时代的需求的道理。

如果地方戏剧的没落，是由于剧本内容过于陈腐，那话剧的未能在现代社会争取到更多观众，却恐怕是碍于形式的局限性了。话剧要如何利用科技成就，来提高它的反映生活的表现力，话剧要怎样更改它的较有束缚性的形式，来争取一般民众的喜闻乐见呢？这些问题似乎早已有人在探索与试图解决之，但收效看来不大。

好的艺术所阐扬的哲理都有共同性，但好的艺术毫无例外地必须带有浓厚的地方色彩。话剧这形式本身既非东方社会的原有物，若内容也是外国的，加上各种语言的隔膜，话剧的发展就会受到种种限制了。

23-12-1983

死后被捧为天才？

世界名剧《油漆未干》反映的是，天才画家克里斯宾生前穷困潦倒，以致英年早逝，而他死后却在美术界掀起一股争购争睹他的名画的热潮，这的确是够教人感慨的。但若因此而推论这样的事，也会在新加坡发生，却未免有点天真。

这十多年来的经济高度成长，确实使不少雅士培养起收藏名画的风气。不过，倘若就这样断定以文字为表现工具的文艺工作者，在他们死后也可能被人当天才来吹捧，就不只是幻想，也同时是没有看到语文发展趋势的错误结论。

如果一切现有条件不变，华文在二十年后没落到近乎绝迹，已是未卜先知的事实。因此，目前还在用华文写作的写作人，他们的作品在二十年后就难找到本地的读者，哪还会有人来把他们当天才吹捧呢？

二十年后，一般民众的英文水平或许会提高不少，但距离以英文来写作，来反映现实生活的境界，还是很大的。因此也就不会出现有人把死后的英文作家，当天才吹捧的现象。

可以预料的是，华文颓势若没法挽回，新加坡的文坛在二十年后，就会出现一段既没有突出华文作品，也没有优良英文作品的空白阶段。其实，在还有华文读者的现在，华文文艺工作者是不用感叹不被人赏识的，更不用幻想死后被人捧为天才。老老实实，脚踏实地地充实自己，倒是可行的办法，其他一切问题，暂时可撇在一边不理。

28-12-1983

序 何晓《玲玲的星期天》

与何晓相识不算不久，但相处的机会并不多。在不多的接触中，我发觉何晓是位很诚恳的文艺爱好者。诚恳不是美德的一切，但诚恳却是文学生命中很重要的一个要素。文学讲求一个真字，因此七十岁的诗人，也往往有颗赤子心。

我常常想，一个有灵魂的人，他本身便是一首诗，一篇动人的散文，或一部有血有肉的小说。诚恳并不是一个人的灵魂，热爱人类却是。何晓不只是诚恳，他更热爱人群，尤其是生活底层的人们，因此他的灵魂是美丽的。

爱与憎是对立的，但却又是一个人的情操的两面，热爱应该热爱的事物，憎恨应该憎恨的现象，这原则本身其实就是人类社会进步的原动力。具有这种情操的人，他本身便是一部文学作品。

何晓诚恳，他热爱广大人群，憎恨少数人渣，他本身便是很好的文学作品。但他又会写作，他写出来的作品，其实是饱含着他的爱与憎，是美好灵魂的一部分。从何晓的作品，可窥见他灵魂的一斑，但只有接触何晓，才知道文学作品其实只是他整个人格的一部分。

何晓诚恳，他的作品因此也较平实，何晓出身贫寒，他的作品因此多涉及底层人物。对看惯风花雪月作品的人来说，何晓的作品并没有太大的吸引力；对喜爱浪漫色彩作品的读者来说，何晓的作品

也没太强的感染力。但对经历过五十年代贫困生活折磨而今是中年的
人，或对喜爱阅读写实主义作品的读者来说，《玲玲的星期天》
这本书所收集的作品，无疑的都是感人至深的。

我知道何晓并不是文艺的尖兵，他只是利用教余闲暇的一小部分
时间，没倾全力地进行创作。集中的一些作品，容或有略嫌粗糙
之作，那不是才力不足的证明，而是漫不经心的说明。

何晓的可爱在此，但他的没能鹤立鸡群的原因也在此。多少人
巴结营钻，为的是想在文坛上一露头角，但何晓却对文艺创作若有
意似无情，他对名的淡薄，就是他可爱的地方。但艺术创作本身却
要求创作者有几分痴情，过于漠然往往是艺术创作的致命伤。何晓
的没作适度的投入，是他的部分作品未臻艺术巅峰的根源所在。

在这小地方尚且不知称得上文人与否的我，承蒙何晓君看得起，
要我代他的书写篇序，就这样坦然地写出我对他与其作品的观感来。
人很容易在别人的捧喝中消失掉，文学作品也会在无稽的赞扬中消
迹，我认为何晓的作品，在这小岛上，虽不是通衢大道旁的鲜花，
却是泥泞小径畔的小花，不太抢眼，但娇红可爱。只要何晓脚踏实
地，一步一泥泞向前走，他是能种出鲜艳夺目的红花来的。因为他
具备了文学家应有的诚恳、热爱人群与爱憎分明的性格。

1983年

序 (散文一年——散文集)

收在这集子中的作品的文字水平是有差别的，但即使是文字驾驭能力没那么好的作者的作品，也颇清新可读。当教育制度已改变，而母语只当第二语文来学习的现今，较年轻一代掌握华文能力不能与年长一辈相提并论，那是理所当然的，不过，当你读完这集子时，你又会惊讶于他们驾驭文字的能力，并不亚于有经验的写作者。

少年不知愁滋味，为赋新词强说愁，如果这是年轻写作的通病，这集子的作品却不是如此的。这集子中有游记，有怀旧之作，有说理的，也有抒情的，教人感到意外的是，在较幸福的环境中长大的他们，在作品中透露的，并不是嘻嘻哈哈之情，而是颇有深度，含有哲理的生活经验。

集中较成熟的作品，无论在文字上，或在文章结构上，都不会比成名作家的作品差。其中一两位作者，倘若作品数目足够的话，已有资格出个人单行本。

写作是一条漫长而崎岖的道路，其中固然有不少乐趣，却也有不少困难与艰辛。创作是一种乐趣，与此同时也负有时代使命，这点本集子的年轻写作者似乎都明白，我由他们的作品看到这讯息。

出多人合集在当前颇为盛行，好处是给年轻写作者精神上很大的鼓舞，也给他们予互相切磋的机会。写作是终生的事业，合集的出版因此就只是写作生涯过程中的一个里程碑，它既记录了写作者

成长的痕迹，也让他们总结过去的经验以作为继续前进的参考。

在此时此地搞文学得有较广阔的心胸才能长久坚持下去，语文水准的低落势必造成知音更难以寻找的后果，环境的改变又会使你周围的文友逐渐地减少，十年后在本集子中的作者如果都仍然能持续创作固然最好，倘若只剩下三五位坚守岗位，那也不用灰心。

世界由于众人不断的奉献才有今天的美好生活环境，在文学园地里种上几株鲜花，也是为人间留下一点美的作法。而且不妨有这样的想法：这些鲜花是为世上所有的赏花者而栽种的，我们周遭的人欣赏不欣赏是不用斤斤计较的。

晋江会馆既成立了文艺研究组，又不惜拨出基金为学员出版习作，在文学园圃美化工作方面所作的贡献是教人赞赏的。我个人是很为会馆主持人的高瞻远瞩的作风而心服的。





捷 径

周槃在接受本报同事吴启基的访谈中，曾针对诗歌作了精辟透彻的剖析，其中以他所说的，担心年轻写诗者走火入魔，最能击中时弊。华文文学虽已式微到快将绝迹了，但在报刊上还时常看到，年轻写诗者尽写些不知所云的所谓诗歌。这股歪风若没及时纠正，那在老一辈写作者相继停笔或谢世后，华文文学的丧钟即会敲响了。

华文水准一降再降的结果，许多年轻学生连普通的散文体文章都写不好，同时又碍于古文程度很差，根本就没能力涉猎诗词或古典散文，藉以加强自己的文字表现能力，但他们却偏偏要写教人百思莫解，胡乱扭曲文字的诗歌，这是投机取巧，哗众取宠的不负责任作风，也是自我灭亡的作法。

自五四运动发轫至今，新诗已走过六、七十年道路，新诗的格式，毫无疑问的，不可停滞在五四时代的框框中。但若没看到台湾诗人在走过一段曲折迂回的晦涩道路后，已摸索到一条新的，既有技巧突破而又不晦涩的光明大道，而只一味重蹈台湾诗人曾踏过的泥泞，那是可悲的。

作为文学唯一的表现工具的文字，是不可速造的，一切文字的表现技巧，都必须在原有的基础上加以继承和发扬。忽略了这一点，而独自闭门苦思，想创造出令人惊喜的词句，那是不实际的。就记忆中所得的年轻写作者当中，梁文福的散文文字是很有特色的，但我相信他是在前人的基础上蜕变出来的，而不是抄捷径。

27-01-1984

闭关的祸害

全世界懂得英文的人，并不会比懂得华文的人多出多少。但一般来说，懂英文者的知识会较丰富也较新颖，原因并不在于懂得华文者绝大多数是华人，而在于最多人应用华文的中国，除了近几年外，自清朝以来的三百多年内，都采取闭关政策。

闭关政策不只造成中国科技落后，民众知识贫乏，经济不上轨道，也使华文沦落为基本上还是只能传播古老文化与价值观的文字，而不能在现代科技或管理知识方面，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这局面也影响及华文在海外生存的能力，华校在我国消失，原因很多，但中国的积弱与华文的局限性功能，也是其中要因之一。

懂得英文的人，分散在全世界各地，其中相当部分的人，还是居住在落后国家的。这些人只能从英美国家吸取先进科技与管理知识，而并不能对英语世界有何贡献。真正对英语世界在科技与管理知识方面有贡献，是英美的二亿多人口中的知识分子。

比较起来，绝大部分是聚居在中国的懂华文者，应该是能在科技与管理知识方面，对人类有更大贡献才对。只要少数懂得华文者在英、俄、日、德文方面下功夫，不断翻译这些国家的传播先进知识的书籍与文章，那懂得华文者的知识是应该比只懂得英文者丰富的。但事实并非如此，原因就在于中国采取闭关政策过久造成的。

10-02-1984

道德观念

西方的社会道德观念，基本上是以圣经为依据的。但科学昌明的结果，日益证明神的存在是人们主观想象的产物，因而随着神的地位的动摇，道德观念也瓦解了。

东方的儒家思想，基本上不言鬼神，但强调人与动物的差别，在于人有良知，并由此而引发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上尊下卑长幼有序的是非标准来。这种以人性为依据的道德观念，由于不会受到科学的挑战，倒往往会使一些忽略了时代背景与社会结构的人们，误言在数千年前农村社会奉为圭臬的道德观念，也是适用于现代社会。

不能否认的是，以人性为依据的道德观念，是比以神为依据的道德观念，更经得起时代的考验的。但也正因为这样，前者的落后观念就更误人。

社会诚然不能没有一些是非标准，以供大家遵守，但同为忠孝仁爱礼义廉耻，在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环境中，却有不同的内涵。忽略了这一点，在推行儒家思想后，就会产生两种与现实格格不入的迂腐分子，一是道貌岸然的伪君子，一是食古不化的腐儒。而且这种恶果，并不会由于儒家思想是以英文教导而不产生，文字到底只是传达思想的工具。

15-02-1984

文化人与商人

在工商社会或经济落后的社会里，搞文化事业者生活很清苦，这至少说明此二类型社会的大多数民众并不重视文化。有人因此认为，文化工作者若在业余搞搞小生意或买点股票，就有可能改善生活的。这想法不能说没道理，但从专业的角度看，文化人而去搞生意，至少是心有旁骛，事业也就搞不好了。

在先进国或文化受重视的社会里，文化人的生活就较舒适，这是文化受民众重视的结果。由于民众喜爱文化，文化人的生活有了保障，所创作出来的艺术，不只有水准，且能普及民间。因此，在这样的社会里，固然有唯钱是命的商人，但却有更多能欣赏艺术的事业家。

赚钱并不是坏事，但文化人若也要一味寻求利润，那艺术品难免要渗进铜臭味，或甚至是从商之余的副产品，既降低艺术的水平，也使本身充满市侩气。在文化不受重视的社会里，最常见的现象就是文化人商业化，从而使商人更充满铜臭味，使社会更缺乏艺术气息，使国家更充满勾心斗角的市民。

文化受到重视，文化人的生活安定舒适，文化人能专心一致搞创作，并以艺术来净化一般民众的心灵，提高他们的情操，扩大他们的人生境界，这应该才是真正可教人向往的社会。赚钱到底是商人的专业，创造艺术品才是文化人的责任，后者若也涉入商场，就只有使民众的精神更加庸俗化。这不会是唱高调吧？

28-02-1984

精神失落的悲哀

高才学生的家长，要求教育部准许其子女同时接受华英文为第一语文的教育，这不能纯粹理解为这些家长对其子女期望高，而应该可以理解为，这些大多受过高深教育的家长，认识到母语对一个人的重要性。只要稍微注意重视华英文名校的学生家长背景，我们就不难看出，越是受高深教育的家长，越希望其子女能同时学好华英文。

双语政策是有民众支持的基础的。一般家长送子女进英校，大多是误认为学了英文，将来就一定能找到较轻松的工作。到全国学生都进入国民型学校，而英文成为很普通的语文后，政府部门或私人公司聘请职员，是以学业成绩优劣为取得标准时，好多人的梦就会破灭的。

为了觅职容易，不惜牺牲母语，这是一般民众对待子女教育的态度，是多么现实，多么眼光短浅的选择。到那么一天，当优胜劣败的规律发生效用时，这批梦破的民众，将是何等痛苦呢？

是不是有必要使更多民众明白，社会分工合作的重要？是不是该让他们深一层认识到，语文并不是分工合作的取舍标准？是不是该提醒他们，在物质上竞争失败了，若又在精神上失落了，那人生是何等苦闷？

受高深教育的家长，要让其子女同时学好华英文，一般民众则倾向于要其子女学好英文，这偏差不只蕴藏着梦破后的失望和痛苦，也潜伏着母语消失而来的精神失落的悲哀。

05-03-1984

讽刺博士论文的恶劣态度

不久前读到一篇讽刺博士写论文，都是东剽西窃的文章，觉得其中观点，很有商榷的必要。

攻读博士课程的学者，是才踏入学术之门的学生。在撰写论文时，他并不可能对某一课题有特别新颖的见解。论文要求多引述而少论说，用意应该是让准博士扎下研究学问的根基，这并不是迂腐的作法。而且，在涉猎了所有研究某一课题的论文，并加以消化与引述后，准博士才会知道自己今后有何途径可走，或如何独辟途径以取得研究成果。

做任何事情，都须先掌握一些基本常识，博士论文引述各家学说，便是在练基本功，以为将来做学问的基础。随意讥笑别人在练基本功，要非外行，便是藉打击别人以抬高自己的恶劣作风。

当然，这么说并不就是说所有博士都很有学问，而只是说以讽刺态度对待准博士的撰写论文方法，无异是在抹杀学者对社会的贡献。

人的劣根性之一是，对自己所得不到的东西，往往嗤之以鼻。又从而以自己的粗浅看法，来否定别人的成就，讽刺博士论文的缺乏创见，只是其中一例。但这种态度并不足效法，否则对缺乏学术风气的我国，只有百害而无一益。

17-03-1984

编辑与文风

文艺副刊的编辑并没有能力扭转文风，但思想认识高的，却可抑制歪风的吹袭，在歌舞升平的年代里，反映在作品中的必然是丰衣足食的盛景，编辑是没法叫作者去刻划路有冻死骨的惨景的。因此从内容上来说，是时代决定了作品的一切。

不过，每一个时代都必然有其不足处，文艺作品若不能指出其缺憾来，则社会就会永远停滞不前。在刻划或反映时代缺憾这点上，作家思想认识的高低，往往是决定其观察角度正确与否的主要因素。因为反映精神生活空虚之作，思想浅薄的作者，难免要流于无可奈何的悲叹。思想有深度的作家，则能在指陈时弊的同时，又让读者看到光明与希望之所在。编辑会刊登那一类作品，是与他的思想认识息息相关的。

每个人都是以其思想认识，来作为取舍事物的标准的。因此，思想认识高的编辑，必能录用观点较正确的作品，因而也就能带动风气，使不正的文风得以抑制下来。

一个人的好恶，也必然与他的思想认识有关。要做到兼容并纳，存异求同，在理论上是办得到的，在事实上却不易做到。掌取舍稿件大权的文艺编辑之所以会影响文风，就在于他的取舍是以其好恶为标准，而其好恶又是以其思想认识为依据。

20-03-1984

要 文保持文体的特色

写惯文艺作品的人在写时论时，最易犯上的两个缺点是，在文章中忘了以逻辑推理取胜的特点，而在文字上却又忘了别以华丽耀人的禁忌。因此我们就经常读到味同散文或杂文的时论，这不能说是个严重的错误，但由此而削弱了议论文的说理力量，却是很教人惋惜的。

在议论文中出现过重的文艺腔，基本上是文艺写作者的职业病发作的表现，这本身已足以削弱时论内容的深度与广度；更糟的是，一些文艺写作者竟然把一些现象当作本质来写，而且是以杂文的笔调写出来的，这就使到他们的文章既缺乏议论文的深入剖析的特点，也缺少文艺作品的以情感人的特质。

文体的划分，自然是为方便称谓而来的，但每一种体裁都应该有其特点，却也是必须遵守的准则。过度模糊两种文体的特色，却又同时使两种文体都大幅度地丧失掉其特色，这样的文章，既收不到教育民众的后果，也会使读者对某类文体失去信心。

不少颇有经验的写作者，在写议论文时还会犯上这样的错误：要非写得太滥，就是思想深度不够造成的。这虽不是文坛的歪风，却是议论文的致命伤。有心之士，应该仔细研究，并从旁协助矫正这不良的倾向。

23-03-1984

都市生活

我始终相信文化的盛衰，是与大自然及气候息息相关的。热带与寒带的文化，不如温带的繁荣，便是一例。居住在热带都市而又缺乏农村或大自然调剂，那文化就更不容易成长的。

但如果在大同小异的单调生活中，再加上有才干的人们都转去从事能赚钱的行业，而文化涉及的社会内容，又多所限制，那文化要不窒息就很难了。

丹麦出现安徒生的时代，人口也不比我们的多，这固然与丹麦的四季明显的海洋性温带气候有关，但西方的开放风气，无疑也是文化能繁荣的要素。

住在热带都市，固然写不出反映农村生活的作品来。只是都市也有都市的生活面，若能深入挖掘，细心刻划，却也能写出动人心弦的作品来的。

地理环境诚然会影响文化的兴衰，但搞文化的人能否深入生活，发掘生活，却也是文化能否较顺利成长的决定性因素。但真正的问题关键在于，包括落后的既存社会道德观在内的种种限制，能否网开一面让文化成长起来。

26-03-1984

农村文化与价值观

住在乡村，清晨可看闲花开在庭院里，午后就有鸡鸣犬吠声来撩破周遭的宁静，黄昏则有旷野上的野火与夕阳相互辉映，在这样恬静的环境住久了，村民自然而然培养出纯朴忠厚的性格来，彼此之间也会守望相助。

生活既简朴，传统的节日，也就受到特别的重视。外来价值观既无从渗透进乡村，村民就自然遵守传统道德观。三十年前的乡村，既没收音机，更没电视机，一年一两次的街戏，便是大家都向往的娱乐。忠孝仁爱，礼义廉耻，这种种传统观念都通过街戏，打进人们的脑海里。

都市化后，大家住进组屋，邻居之间的辐射式的互相帮助精神，并无法直接移到组屋区而变为垂直式的团结力量。地方戏剧也面临不能适应环境而要没落的悲惨命运，电视台播映的节目多是外来的，并不能加深民众的乡土情感。来自农村的文化形式，不能在大都市生存，民众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自会接受藏在外来文化之中的价值观，这影响是不分文盲或知识分子的，只是前者较易受到冲击，而后者多少有点抗拒感而已。

广阔的农村与在农村居住的广大民众，都是传统习俗与价值观保留下来的基础。民众在这样的环境中生活，一生下来耳濡目染都是世代相传的价值观，自然也就保留了传统节日与习俗。居住在开

放的大都市里的民众，既无农村环境又无农村文化以酝酿，保留传统价值观，那民众若没受过系统的传统价值观的灌溉，传统价值观肯定是在外来文化的冲击下消失掉的。

31-03-1984

又见一次 1973年



文艺前途不太暗淡

由搞文艺的教师的谈话看来，当前学生华文文艺水准低落的原因在于，学习华文的时间大幅度地减少了。但由我国学生英文文艺也不见得蓬勃的情况看来，却又说明英文到底是外国语文，较难表达内心的复杂情感与民族文化的精神实质。如果英文是升学，谋生，及吸取科技知识所必须具备的工具，那华文就能在充实精神生活方面，扮演一定的角色了。由此推论开去，华文文艺的前途倒不一定是十分悲观的了。

在我国的特殊国情下，华文文艺的生存与继承的一个关键在于，中学生所掌握的华文程度够不够阅读普通文学作品。倘若足够的话，则在繁重与枯燥的功课压力下，或者在繁忙的日常生活压力中，华人很自然地就会通过阅读华文文学寻求精神粮食；而凭着这一点社会功能，华文文艺就能继续发展下去的。

倘若中学生所掌握的华文，并不足够阅读华文文艺作品，那离校后踏入社会的青年，就不能通过阅读华文文艺寻求精神粮食，慢慢地他们便会把华文忘得一干二净。无论从功利观点，或从文化观点来看，这都不是好现象。

但要达到以最少学习时间掌握华文的目标，却必须从民族文化精华的观点来编纂课本，而不能从外国人学华文的经验来编写课文。否则，学生就只能掌握一些与英文词义相近的华文词汇，这既引不

起他们的学习热忱，也达不到要他们吸取东方文化精华的效果。这后果是，华文文艺越来越没年轻读者，而学生花在学习华文的时间也会付诸东流。

13-04-1984

余台太个五附系



庸俗的经验论者

借助娱乐来推广一种语文，在理论上来说，也并非坏事。问题在于，所借助的娱乐素质是否过于低劣，若然，则首先要做的工作却是提高娱乐素质。

有人强调，包括娱乐在内的一切艺术作品或文章，最主要的是作者的生活经验。这也不能说是错的，但更重要的是作者的思想认识与人生观。

经验有两个来源，一是直接的生活参与，一是间接的从阅读书籍或听取别人讲述而来的生活经验。限于时空地，也碍于某些生活方式并不值得作者亲身去体验，因此没有一个人能对各种生活都有直接参与的机会。

有机会参与，且应该参与的生活经验，作者若不去参与，那就是他的过错。但不值得参与，或已成为历史陈迹的事物，作者却没有必要或没有可能去参与。在这种情况下，翻阅资料就是体验间接经验的唯一途径了。

过分强调直接生活经验的人忘了一个要点，那就是，在某种程度上来说，缺乏思想深度的作者，即使他有多么丰富的颓废生活经验，他所写出来的作品或创造出来的艺术品，却很可能是毒害读者或观众的鸦片烟。好的历史剧的现实意义，往往并非歪曲现实的，渲染低趣味的所谓歌台舞榭文学作品，所可相提并论的。这一点是庸俗的，没思想深度的经验论者所不能理解的。

25-04-1984

文人的良知

误信越低趣味文化越拥有众多观众或读者的人，不妨闭起眼睛回忆一下，五、六十年代那些以讲不咸不淡，渗杂方言或马来话的三流电视闹剧演员，于今安在？

科技的进展，使娱乐方式呈现多样化，从而也威胁到正派健康艺术的成长。那些靠玩弄猥秽字眼，制造笑料的三流艺术，就更休想在现实中生存下去。

在现代化的社会里，一般民众为排除生活压力，多会观看或阅读轻松活泼的娱乐或文章，却不一定喜欢强调宫能的东西。

但在发展中国家，由于民众认识较低，渲染乳房乳罩的黄色文章，或许会拥有一定的读者。不过，无论从建设国家或民族文化的角度来看，这样的东西只有拖缓文化的成长。

搞文字工作的人，不一定得拥有使命感，但至少要有良知。缺乏纠风正俗的良知，就只能沦为嬉皮笑脸，聊搏一餐的小丑角色。

而且，发展中国家民众的认识，也会随着教育的普及而提高。因此，他们鉴赏艺术的品味也会随之提高。日本小电影情节之离奇怪诞，镜头之伤风败俗，我看当今黄色电影是无出其右者的。但日本小电影观众之寥若晨星，却足以说明色情文化势必遭受民众唾弃的道理。

没血性慷慨悲歌的文人，至少也该创造些陶冶民众性情的闲适小品文，这样做，于人于己，都有好处，理由是，文人可贵就在于他有籍作品提高民众生活境界的良知。

26-04-1984

政客与商人的壮志

在现实社会里，文人与政客和商人比起来，确实是落拓得很。因此，对少有壮志的人来说，从政或从商，就是谋图展现个人抱负的最佳途径了。

但事实却未必如此。怀着理想去从政者，一旦掌握了政权，往往非但无法实现他想造福民族与人群的理想，倒反而会做出违反原先理想的事来。其中奥妙在于，政坛如战场，掌权者既日日忙于争权夺利，哪还有余暇来实现有利人群的理想呢？

怀大志去从商者的下场也大致一样，稍微在商场上得意时，他所想的如何去击败对手，去获取更多利益，而不是原先想服务人群的壮志了。

名留青史的伟大政治家，或杰出企业家，并非没有，但寥若晨星。于此可见权力与金钱的惑力，是如何与民众的利益相互冲突的。

与政客或商人一比，文人虽言多于行，虽空有理想而无法实现，但他们热爱人群的赤诚之心，却是更可爱的。杜甫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所发出的愿望，是感人至深的。但如果有人批评杜甫是言而不行，不去搞政治，从商或攻读工程系，那文人从此大概只有停笔了。

文人的理想虽可望而不易即，但它是利人不利己的，是代表着大多数民众的愿望的，因此总比政客或商人的壮志可爱且可靠多了。

04-05-1984

把艺术普及民间

新加坡交响乐团的户外演奏会，是真正做到把音乐普及民间的了。其他健康文娱演出，若也能这么做，那假以时日，我们的民众的精神生活就会丰富点。

百货公司及超级市场已深入到每一个组屋区，多到民众只须跑几步路就可以看到一间。结果是，民众把逛这些场所当作茶余饭后的消闲处。因此，平日里这些场所固然顾客不少，假日里就更塞得水泄不通。

这自然不能说是坏现象，但民众一有闲暇就只往超级市场钻，却也说明我们的可提供精神生活的场所，是远远比不上提供物质享受的场所的。

偶尔去咖啡座坐坐，却发觉人声吵嘈，加上播送的音乐也多是流行曲，就更感到我们的民众艺术品味是有必要提高的。

在咖啡店民众喜文乐听的讲古艺术形式消失后，倘若我们没能及时提供一些较优雅的艺术以丰富民众的精神生活，那么民众的势必流连于赌马或逛超级市场，似乎就是个无可避免的趋势了。

健康文娱团体或许可考虑借民众联络所来搞演出，联络所的一切演出设备自然不尽理想，但交响乐团既然能在户外演奏、舞蹈、话剧或歌唱，相信也必能在联络所演出的。把健康艺术普及民众，这应是当前我们该做的要物。

09-05-1984

书店

总觉得组屋区缺乏象样的书店是一大憾事，建屋局最近采取的优待书店租金的措施，相信必能改变这种偏差。但也须得到各方面的合作，读书风气才有可能兴盛的。

书店须普及到每个住宅区，这是我在日本得到的概念。回来后每每下班都懒得奔向书城去买书，就更使我相信书店有必要深入到每个组屋区去。

在东京郊外居住时期，通向火车站的那条长街两旁尽是形形色色的小商店，夹在其中的那间书店就是我常常流连的场所。

办公的地方在市中心，周围书店多的是，连政府刊物出版中心都只有一箭之遥，这些书店又成为我午饭后常去逍遥的场所了。

后来搬去市中心住，办公室和住家在一起，中午回家吃饭，就没去逛书店，但黄昏与家人散步，例必到那条热闹的道路走走，那间专门贩卖旧书的书店，也是我经常驻足翻书的地点了。

我现在住的组屋区的商店是很零乱的，一点情调都没有，唯一的一间印度人经营的文具店，只可看到一些娱乐性的与知识性的杂志。店面零乱，我避之惟恐不及，哪还会经常去光顾。

后港南巴士转换站的商店建筑设计颇不俗，在那儿要有一间书店，相信顾客会不少的。但店主得多动脑筋，在店面设计与书本摆设方面多下点功夫，在店内也不妨播放些优雅的轻音乐。店租的优待只是书店能经营下去的原因之一，其他因素就要靠店主来创造了。

14-05-1984

读书风气

单单在组屋区开书店，并不能担保读书风气必能兴盛起来，但至少是推广读书风气的可行途径之一。

五、六十年代的读书风气是很不错的，七十年代后的读书风气就差了点。现在的问题是，五、六十年代的年轻读者，于今要非进入老年，也已跨进中年了。倘若我们再不鼓励年轻人培养阅读风气，那随着老中年人的凋谢，读书风气就只有更为低落。

读书风气低落，是不能一味归咎于年轻人的。学校的功课那么繁重，年轻人都忙着搞好功课，稍有点闲暇，却又消磨在电视节目或录影带上去了。

观看电视节目或录影带，也是能获得知识的，只是不比自己阅读书籍那么牢靠。但也不能期望年轻学生除了啃课本外，就只啃书本，否则，他们也会成为书呆子的。

大众传播媒介所传播的知识较新颖，绝非书本所能做到的。但书本的知识较具系统性，多读好书，人的思考力就强些，这些好处又不是大众传播媒介所能给予的。

但年轻学生的功课确实太繁重了，重到剩下的时间倘若要看电视，就不能看书，要看书就不能看电视。因此，我想根本的解决问题之道是，学校要认识到鼓励学生阅读课外书所获得的知识，其实并不比鼓励学生啃课本来得少的道理，并真正拨出一些时间让学生阅读课外书，而且最好全国学校都如此做。这样一来，读书风气才有可能兴盛起来。

17-05-1984

艺术的慰藉作用

总认为不管艺术还是宗教，喜爱者或皈依者切切不可把它们当作生活避难所，而只可把它们当作生活的慰藉素。人活着到底是为解决人类的问题，而非为寻求解脱。宗教与艺术因此就只可当作前进的手段，而不是人生的目标。

我非教徒，宗教能给信徒予什么精神力量，我不甚清楚。但对失意的信徒来说，宗教却肯定有慰藉作用。

艺术的作用也如此。无论你从那一类型的艺术获得精神力量，那慰藉与你日常生活一比，也只是很短暂的。不过，这短暂的慰藉。即使你看到常人看不到的美妙境界，也使你更有目标地活下去。只是我们该分清的是，活下去并非单单为艺术，更主要的是为人类的前景。

这道理由中国的出现朦胧诗，或台湾曾出现现代诗，与当前新华文学的出现挽歌式文章，都可获得证明。台湾在独处中国大陆的一隅之初，正是该地诗人彷徨失措，而企图寻求解脱之时；四人帮倒台之后，年轻诗人担忧中国前景吉凶未卜，并旁及对社会制度的怀疑，正是朦胧诗兴起的原因。新华文学当前的哀叹特色，也正是华文式微的征兆。

很明显的，对这些文学爱好者来说，他们所营造的世界，并非纯然为逃避，而是想藉此获得精神力量，以作为寻求出路之准备。唯其如此，任何人若把宗教与艺术当人生避难所，不只会丧失人生目标，连带也会丧失艺术生命。

18-06-1984

家法的可怕

记得鲁迅曾说秋瑾是在众人的捧唱声中死掉的，言外之意，是有惋惜之情的。

最近我曾为此苦想了几天，却认为以秋瑾之果断性格，崇高情操，与视死如归精神，在缺乏民主风气的当时的中国，要不博得众人的掌声是很难的。

我们一向过分夸大西方传统与价值观的不足取，而忽略了其可贵处。西方基督教的强调人性本恶，人类有罪观念，其实是进取精神的源泉。准许别人犯错，准许别人发表意见，不只是西方敢向现实挑战的原因，也是民主能蔚成风气的根源。东方社会的强调上下有别，长幼有序观念，好处是社会现状较能维持下去，但坏处却也不少。

秋瑾生活的时代，有三座大山压在她的头上。她冲破家法和父权，也冲破夫权，但没能冲破君权，就就义牺牲了。秋瑾要冲破家法与父权之前，就得冲破个人与国家孰重、孰轻的纠缠；在冲破夫权之前，就得摆脱妇女应扮演的角色的传统力量的束缚；在当时的东方社会，有多少人能冲破此二关呢？

东方社会似乎特别推崇烈士与义士，我看原因就在于东方社会有太多障碍。秋瑾的可贵，在于她能冲破家法和夫权，她的就义是对整个时代的怒吼。我们在敬佩秋瑾的同时也别忘了，其实还有好多好多秋瑾，在家法下已成为牺牲品了。

东方社会的悲哀，不只在于缺乏民主，还在于许多正义的声音，在家法下已遭到窒息。家法的可怕在此。

18-08-1984

游 记 难 写

出外旅游倘若存着写稿的念头，是会大扫游兴的。带职远游很不愉快，这是一回事；走马看花，又要对事物评头评足，万一犯上严重错误，于人于己都没好处，那更是沉重心理负担。

游记难写，不在于作者有没有文采，而在于作者一朝看尽所有名胜，所得的印象都只是浮光掠影，只鳞半爪，写出来的文章，既教外行人满头雾水，又教内行人摇头叹息。

不是因此就说不能写游记，但作者最好在旅游前多读有关国家的书籍，在旅游时也要多看多听多问，这样子写出来的文章，即使粗浅了点，至少也不致闹笑话。

但一般人缺乏的就是这种实事求是精神。一位英国人自称足迹遍及大马东海岸与檳城，但在为英国航空公司的杂志撰稿时，竟然把黄梨称为果王榴槿。很显然的，他根本就未尝过黄梨与榴槿，才会闹出这么大的笑话来，而这又会误导多少未曾到过大马的旅客。

04-10-1984

在明朗中显露诗意

见成君著《河的独白》

像成君这般年龄的写诗者，在八十年代而没染上现代的作风，可说少如凤毛麟角。要是现代派诗歌产生于五十年代的台湾，是由于台湾独处于中国大陆之外，知识分子深感被遗弃的悲伤，因而欲寻求朦胧意境以求解脱的表现；那八十年代中国出现朦胧诗，则是敏感的写诗者担忧中国前景的具体写照了。但不管是现代派诗歌，还是朦胧诗，它们对本地华文诗歌都有一定的影响，都是无可否认的事实，成君的没受到影响，可说是个例外。

这本诗集共收三十一首诗，写作时间由最早的一九七八年，到最近的一九八四年。仔细阅读，可看出成君的写诗技巧在逐日成长中。他的诗总的基础是欢乐的，颇有少年不知愁滋味的特点。他的诗的意境是明朗的，一点也不晦涩。

没爬过金山

不懂金山险

没踏上金山的土壤

不懂金山妍

金山磅礴巍峨

气象万千

——《重游金山》

千丝万丝
拨弄小花风姿
悬桥欲醉
跨越绿丛深处
银珠！银珠
你挂上枝头无数
让生命迎风飞舞

——《云顶雨景》

像这样的诗句，是明朗而显露的，但却也是形象而感人的。就写实的眼光来看，这样的诗的可读性已颇高了。

一公里蔚蓝
一公里碧绿
一公里观海岸净明
一公里看花木茂密

一分钟 一种景致
一分钟 一种新意
一分钟过百幢高楼
一分钟越千丛新绿

——《敬意——写在十八周年国庆前夕》

在沉寂中消失
一桨一桨的波光
在沉寂中消失
点点鸽群的飞翔
在沉寂中消失
幢幢船影的浮荡

——《河的独白》

依然是浅白如口语的诗句，但作者摄取意境的技巧，与构思的巧妙，于此也可见一般了。

·但诗却须有耐人寻味，与供人再三咀嚼的含蓄美。《归来》有些诗句，就有这些特点，例如：

终于回来了
把北国花香带回来
一小瓶碎花瓣
代表一份真挚的温暖

我们周遭顿然充满了清香
胸怀也豁然开朗
是晴空万里的七月天把她送回来
是五年的离情将她送回来
我们聚首
 握紧今夕与明朝
我们聚首
 谈遍东方与西方

回来了
又要离去
需要的，是异乡的空气
需要的，是他国的芬香
需要的，是万里外晴朗的气象

基本上这些诗句也是平白如话的，但整体来看，意境就较含蓄了。可惜的是诗集中像这样的诗并不多。

欠缺沉着的感情与更深的意境，似乎是成君诗歌的不足处。这应该是他年少生活经历较浅显，而又没从现代诗或朦胧诗中去刻意探索写诗技巧的结果吧。然而，这也正是成君诗歌独树一格的成因。只是我们应该可以期待，成君今后的诗歌能有更高的意境出现。

——稿于一九八四年六月

些澄清——答潘亚墩先生

潘亚墩先生在第19期的《赤道风》刊登的随笔《关于“为之序”之我见》一文，对我诸多冷嘲热讽，使我觉得有必要作出一些澄清，以正视听。

关于外国作家批评新华文学作品是否有溢美之嫌，我不想进一步声辩。我在《香港文学》所写的那篇文章，重点并不在此。即使我提及外国作家对新华文学的介绍有“吊高”之嫌，用意也只在警惕新加坡的写作人，别把人家的溢美之辞当作我们已取得的成就看待而已，而不是在抨击外国作家的批评有何不当。而且，我始终认为，一个国家的文学批评，总是由本国人来进行较为恰当。这道理很简单，本地人对本地的文坛最为熟悉，对本地社会背景，政治气候，也最为熟悉，下笔进行批评，才能“有分寸”，才能“顾及后果”，而不会“损人损己”。

当然，外国学者或作家若相当熟悉本地文学，批评态度严谨认真，能结合有关作家的人品与作品，作深入且有系统的剖析，我们也是非常欢迎这样的文批。我手头有一本苏菲的《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就是很有系统的，有深度的研究马华小说的著作。

“隔岸观文”，就不会受人事纠缠，我也希望事实会如此。但由于隔岸观火，就难免无法掌握完整的资料。譬如说，我就不只是“从校门到报门”那么数十年安于一份职业的人。我做过邮政局、移民

厅、外交部的工作，目前的职业是“第四行业”，所以我何止不是“从校门到报门”，简直是“从校门到离国门”又“重返国门”呢。

我在东京生活五年，高官政要，学者名流，巨商富豪，市井小民，都有所接触，相信人生经验不可以说是不“富有”吧？我出身也贫寒，而且贫寒到一日三餐都吃番薯叶配饭度日，这样的出身应该够清白吧？

李龙诚然与我同时期在华侨中学读书，但学校规模大，学生多，我与他可说素昧平生。后来他到南大读书（我却得到社会工作），途中有事，未毕业即离校。这点是他改我为他写的序的一句话，我才知道的。潘先生既然那么详读我所写的序，为何没看清李龙所改过的“肄业于南大”那句话呢？

李龙的认识我，得追溯到1984年12月。那是在主持“宗乡会馆研讨会”分组讨论时的事，他刚好在我那一组。此后，他就不时来找我，并拿些小品文给我看，要我代为修改，并转去文艺版发表。收在《只有浪涛知道》一书中的大部分文章的原稿，我都看过，有些作了若干词句的修改，有些我直接向李龙提意见，他再改写过，有些则是我认为还未达到发表的水平。我相信潘先生一定也不知道这些事。

李龙的《只有浪涛知道》诚然是他的第一本集子，前此他有没有写作，我就不知道。但李龙的走进文坛，我却是一清二楚的。我也不是“自请为序”，而且我为此感到很惊讶，我一向只知道序是受邀而写的，毛遂自荐写序，我是第一次听到，实在孤陋寡闻之至。

我不是第一次为人写序，我为何晓、尤琴、成君写过序，我也为我在晋江会馆的学员的两本散文习作集子写过两篇序，我怎样赞扬及鼓励他们，潘先生有兴趣可找来详读。我对李龙的要求较高点，他与我年龄相仿佛，而进入文坛较迟，我认为我们的创作岁月所剩都不多。李龙要在文坛上崭露头角，他的步伐就得比年轻起步者快速，而我认为李龙的《只有浪涛知道》中的文章水准，与他的年龄与社会经验并不尽相符。这点在他要我为他写序之前，及序写完后亲手交给他时，我都告诉过他，我相信潘先生也不知道这点。

我觉得写序也不能一味赞扬，也得讲出缺点来，我说李龙的“小

品文纤巧有余，韵味不足，有一览无遗之不足处。”这“纤巧”难道不是褒义词吗？

我对潘先生所写的文章一向都读，我在我所写的博士论文中，就曾引用过潘先生对马华文学的评论观点，而且给予正面的肯定。我不认为学位高就高明，脑袋糊涂的人，读再多的书也是学究一名。

新华文学的前景堪虞，而且虞在没有读者，而不是没有作者。我和潘先生一样不喜欢“鲁迅走在金光大道”，所以我不会借高论抬高自己。我甚至常常想“退出文坛”，因为我觉得我不是很好的搞文学的料，而且我认为我写不写作品，于世界华文文学的兴衰根本无关。作为新加坡公民，也是中华民族的后代子孙，我常为1840年后的中国的积弱而悲伤，我相信潘先生与我有同感，我是沽名钓誉之徒吗？让时间与事实来证明一切吧。



附关于“为之序”之我见

潘亚暎

书之所以要有序，在于为读者服务。“为之序”者不仅要为读者服务，还要为作者服务。“二为”一致，旨在鼓励作者，启发读者，起导读作用。其原则应是：与人为善，弹赞得当，实事求是，顾及效果。倘若作者或作品不够格，自可婉言谢绝，不必“为之序”。

近年来，笔者应邀为海内外文友“为之序”者不下50篇，皆本着上述原则，认真读写，详加评价，虽非美文佳序，唯有一己之见，成“一家之严”，褒多贬少，以文扬誉，反响颇佳。窃以为，心不诚则笔不正，人品与文品都会在序中暴露无遗。为不失误起见，首先要端正态度。

“为之序”者大都是应邀或受命而作，也有个别是毛遂自荐的。为文必须认真负责，出于公心，不论是宏观概述或微视剖析，还是一般评价，都必须资料翔实，有感而发，言之有物，以诚待人。倘若敷衍塞责，或一味吹捧，或一味贬损，或顾左右而言他，或吹毛求疵说假话，都瞒不过读者的眼睛。这就要求作者审慎从事，不可掉以轻心。

记得五年前，有位泰华女作家向我诉说其第一本书的遭遇：“为之序”者把她的书贬得一钱不值，面对序者乃当前前辈，使她不知如何是好？其夫（亦是作家）说，为了敬重序者，相信读者自有道，还是随书刊发好。书出版后，不出所料，高明的读者大骂“为之序”者

有眼无珠损人利己，但一般读者却被误导，影响欠佳，直至仗义执言的评者出现，为时已晚矣，使作者、序者、读者和评者都不甚快意。

据我考察，这种现象以东南亚华文文坛为最。事有凑巧，无独有偶。李龙的第一本书《只有浪涛知道》，“为之序”者从头到尾一贬到底，我周围的人读了该序无不惊诧莫名，连我的小女也愤愤不平。奇文共赏，有“序”为证：

从商之余而动笔写作，这在我们这个社会上并不是什么稀奇的，教我较惊讶的是李龙在文章中透露的感情竟然是那么的纤弱，纤弱得象是入世未深的青少年……他对社会人生了解得不够透彻。……李龙缺乏的正是中年人的沧桑感，也因此，他的小品文纤巧有余，韵味不足，有一览无余之不足处。……李龙的文章就不乏似曾相识的例子……在题材方面，有些是过于陈旧的，是不应该写进文章中去的……感情似乎太平淡了……

总之，从选材立意、思想感情、遣词造句到布局谋篇，一一否定，竟无一句肯定或鼓励的话，叫人不忍卒读。既然一无是处，何须结集出版，更不必“为之序”，岂不存心让文友献丑，我真怀疑序者居心何在？

为了探讨其中奥秘，先说作者和序者的关系。作者李龙，1945年出生于新加坡，毕业于南洋大学经济系，“干过好多行业，而最后是从商”，近年来商发文兴，发表各类作品，颇受读者欢迎，第一本书《只有浪涛知道》“荣获姚紫文艺基金会赞助出版”。可见李龙并非初出茅庐的习作者。序者风沙雁亦出身于南洋大学，曾获东京上智大学硕士学位，现任报刊编辑。由此观之，他俩先是校友后为文友。序者自以学位高，又是以文字为专业，自恃比亦商亦文者高明，便自请为序，借空论以抬高自己，所以无视评委们和编辑们的水平与眼力，对李文不作具体分析，居高临下如训蒙童一般，既不讲礼谊，更无分寸，又不顾及后果，一味放言高论，否定一切。结

果只有贬人自贬，损人自损了。

须知，作者出身贫寒，道路坎坷，商场险恶，不比“从校门到报门”的序者富有人生体验乎？！作者从事各类文体写作，有感而发，真情实感溢于篇章，不比空洞议论有说服力？！俗话说得好，人生练达即文章（按：应题情练达即文章）。序者理应向作者学习才好，首先学习作者勇于随书刊发尊序的胸襟与胆识，进而反省自己的为人处世和文学观，也许不无裨益。

如此写序，除序者孤芳自赏外，主要是认识问题。请读如下一段文字：

进入九十年代的新马华文文学，正面临着语文水平日益低落，而一些写作人又只追求文字上的标新立异，因而使内容显得非常空洞的困境。与此同时，近十年来文学批评非常落后，一些中国作家对新加坡华文文学所作的介绍或批评，颇有“吊高”着来赞扬的弊病。如果我们毫不自觉地把这种溢美的褒语，当作是我们的华文文学所已取得的成就，那我们一定会窒息在这种一味赞扬的褒语中。

《香港文学》78期37页

序者正是在这一偏颇的空论指导下，从反对“一味赞扬”的极端跳到“一味贬抑”的另一极端。应该说这两种极端都是非常错误的，都应予以防止和消除。比较而言，后者比前者更为严重和有害。如果说新华“文学批评非常落后”（？），正需要外来批评加以推进，中国作家“隔岸观文”，不受人事关系所纠缠，自是比较客观公允，为什么会有“吊高”的感觉呢？主要是受“文章自己的好”和门户之见所囿。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是具体作品具体分析，可以进行抽样调研，拿出实例来，一般的泛论无补于事。之所以会发生诸如此类的分歧，往往“只缘身在此山中”，为现象所迷惑，以偏概全，看不到主流，看不到别人的优点长处，眼前一团漆黑，所以一味的指责、贬损，结果闹得文坛四分五裂，作家垂头丧气，作品没有市场，文坛停滞不前，果如此，批评家倒成了千古罪人，何苦来哉！

根据海外华文文学现状，我仍主张写序者评应以表扬为主，提倡“文励而后工”，群策群力，团结一致，冲出困境，持续繁荣。只有这样，才能水涨船高，更上层楼。这就是说，在困境中多看到光明面，在批评中多发现美文佳作，在繁荣中警惕潜在的危机，在受赞扬中自觉寻找差距，如此互促互进，互学互补，沟通交流，共同提高，增强团结，克服困难，把华文文运推前一步。



序 《尤琴小说散文选》

居住在热带的文人，由于缺少四季景物变化的撩人情绪，往往会苦于没写诗的题材。住在热带而又是繁荣稳定的都市，就更有写作题材枯竭的苦闷。单调的组屋环境，大同小异的生活方式，使文人搜索枯肠，也难写出撼人心弦的文章来。

在《小岛醒了》已显示出写小说才能的尤琴，在其最近与何晓合著的《今日桃李》中，又展现了她能从生活琐碎事件中发现情趣与哲理的本领。然而环境是会限制一个人的才华发展的。这本小说与游记选，我想与其说是她的创作力旺盛的表现，不如说是她在努力突破组屋生活的束缚。

游记是不容易写的。有关外国风情人物的游记，就更不容易写。以外国人物和事件，作为写小说的题材，那更是雪地里栽花的工作。然而，在《桥》与《素丽叻要去合艾了》中，尤琴的悲天悯人性格，与精雕细琢本领，却又教我们不得不相信，这样的以外国题材来写小说，并非全然不行。

谁要想在尤琴的游记中，看到樱花盛开的美景，或郁金香满开的盛况，是要大大失望的。她的游记集中在介绍缅甸边境的小镇，或泰北的荒芜的“世外桃源”，或砂劳越古老的城镇，或拉让江上的浊黄波光，或长屋的风光。这些一般旅客鲜到的地方，却在尤琴简练的文字中呈现在我们面前，它们让我们看到五十年代新加坡一些

村庄的依稀影子，也因此会使读者读来倍有亲切感。

安乐时代的文学作品内容确实会平凡点，即使文人本身已意识到这不足处，并在主观上努力突破狭隘的生活圈子，但时代与环境的局限，却依然会使作品内容缺少可歌可泣的力量，尤琴的这本集子说明了这道理。

富裕物质生活享受与单调的生活环境，确实教稍微有点认识的人们要感到窒息。近几年来文坛上游记的蓬勃现象，固为新华文学添上另一时代特色，但却也说明这小岛的生活是够乏味的了。尤琴的游记或许能使我们在乏味生活中，看到一些平日看不到的生活画面。

能深入生活，写出反映新加坡八十年代民众精神面貌的作品来，固然是好事；但深入邻国，并勾勒出异国的风土人情来，这样的作品，也无疑的必会增添新华文学的色彩。尤琴这部小说游记选内容是紧扣着生活的，也较全面地体现出她那悲天悯人的性格。这本集子是有一读的价值。

1984年

文艺应与国家命运挂钩

马华文史学家方修先生，曾非常透彻地对马华文学的特色作了这么一个总结：即在中国解放前侨民意识与本地意识始终在互相消长着。当中国在进行抗日战争或反饥荒反内战运动时，马华文学就特别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但当本地问题特别明显化的时候，例如1929年的世界性大萧条，马华文学就转向反映本地现实来了。

进入五、六十年代，马华文学则全面投入反殖反黄的战斗中，一直到七十年代，这余绪依然波澜起伏，不能平息。这些特色，说明马华文学的特质是与现实紧密挂钩的。但很遗憾的，近年来的华文文学，似乎颇有远离此特质的倾向。其中原因固然是错误复杂的，但却也可归纳为几点来谈谈。

共产主义在八十年代的幻灭，是政治思想呈现真空状态的背景，人类由此对自己的前景失去了憧憬。作家生活这样的环境里，难免也要感到前途茫茫，反映在作品里便是抒发个人情绪的调子了。文学作品原是社会现象的反映，这时代的特点既是幻灭后的失望，作家在彷徨中抒发个人胸中的郁闷，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不过，际此华文日趋式微，华文文学日益消沉的时刻，我们的写作人如果没能及时认识到，在我们特定的环境里，华文文学若不能与国家命运挂钩，那华文文学就必然会更迅速消失的道理，那就是我们最大的悲哀了。

因此，尽管彷徨、苦闷、失落是这时代的基调，作为华文文学写作者，却须以更冷静的态度来对待生活的。华文文学若一任它跌进抒发个人苦闷与牢骚的陷阱中去，它既会遭受其他民族的唾弃，也必引不起当局的重视，而这正是自取灭亡之路。

在迈向廿一世纪的过程中，我国所面临的社会问题，文化问题，是既复杂且繁多的。及时反映这些问题，既是文艺工作者的重任所在，也是华文文艺生死存亡的关键所在。

因此，在建国的过程中，华文写作者所肩负的责任实远比其他国家的作家所肩负的还要大的。他们必须认清的是，在此后十年的阶段里，他们的作品若不能与国家命运挂钩，那华文文学不只会出现苍白的一页，也可能是它寿终正寝的开始。

华文写作者在振作起来的时刻，必须认识到反映现实，揭露社会黑暗面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的行为之道理。过分谨慎，不敢接触现实问题，不只是不明智的懦弱行为，也是不能完成时代任务的愚蠢做法。

01-01-1985

华文文艺前景光明

中国名作家萧乾甫下机就告诉我们一个好消息：中国汕头大学的海外文学研究中心，已以新马文学为研究重点。中国的一些出版社，还准备出版新加坡诗选与小说选。

新华文学若能在海外受到重视，并开拓市场，对华文文艺工作者，无疑的必能增强他们创作的信心。其实，马华文学在日本的一些大学里，早已在教授中。日本的一些刊物，也偶尔会刊载介绍马华文学的文章。因此，中国的开始注视新华文学，就是锦上添花的了。

以中国人口之多，市场之大，它如果能出版新华文学，那对新华文学的成长就是注入不少激生素了，因而，摆在本地文艺工作者面前的重任是，应该如何提高本身的写作水平，以创造出更具国际水准的作品来。

由新一代政治领袖提出来的廿一世纪新加坡蓝图看来，他们不只重视物质成就，也同时兼顾文化建设。是故，只要华文文艺工作者不自暴自弃，努力写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来，华文文艺的前景应该还是很光明的。

既年轻又有良知的文艺工作者应该认识到，深入生活，并写出这时代特征的作品，是本地华文文艺与其他语文文艺竞争的首要条件。外国读者或研究机构重视我们的作品，固然能扩大与加强我们

的生存基盘，但紧紧抓住本地读者，却也是我们不能忽视的一项工作。

除了须认清文艺要反映现实的道理外，我们也须具备揭露社会灰暗面的胆识。只有具备这两层认识，本地华文文艺才不致在其他语文作品前黯然失色。

近几年来随着华文水平的日益低落，华文文艺已陷入有史以来少见的低潮困境中去，国际华文文艺营所带来的令人欣慰讯息，与外国大学重视本地华文文艺的措施，是能增强我们的文艺工作者的创作信心的。再加上母语在先天上所占有的优点，我们相信本地华文文艺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境界出现。

当前文艺工作者应把文艺营当作交流的一种形式，重要的是我们必须创造出有血有肉的作品来，这不只是华文文艺的生存之道，也是促进国家繁盛的大业。可以说，文艺营引起外国大学与出版社重视我们的作品，是足教我们欢庆的，但在欢庆之余，冷静下来埋头苦干，却是更为重要的。

05-01-1985

迎接文艺春天的到来

第二副总理王鼎昌在为第二届国际华文文艺营开幕时的致词，是令人兴奋的。他不仅建议报馆、文艺团体、作家与宗乡会馆联办全国性文艺活动，还倡议设立文艺基金与举行文艺节。以王副总理的身份来倡议举办文艺节，相信势必得到全国上下一致的支持，再加上今后的建国重点是放在塑造一个有教养的社会，我们应可预期，文艺在今后的岁月里必会有更良好的发展环境。

但在乐观的同时，我们也须踏实地做些繁琐但却是有意义的工作，其中的二项应是：一为培养文艺新兵，二为提高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与待遇。只有作好此二项工作，文艺种子才能健康地萌芽成长，并开花结果。

我国的文艺工作者，长期以来都是在极端备受冷落的困境下埋头苦干，他们既须终日为三餐而烦忙而苦闷，也须牺牲掉好多消闲时间来从事文艺创造活动，但所得到的物质报酬却非常微薄，在社会上受人尊重的地位，也远不及其他专业人士的崇高。近几年来，文化部所颁发的奖状，固然给文艺工作者带来不少荣誉，但一般市民对文艺工作者的藐视并没改变。

在讲求功利与实效的我国，若要文艺工作者受到社会人士的重视，只有使他们的工作专业化，并提高他们的待遇，他们的社会地位才会有所提高与受到应有的重视，正如其他专业也须有一批中坚

份子作为支柱一样，文艺阵营里也须有一队尖兵从事创作，而培养尖兵的唯一方法是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与工作条件。

品赏文艺不比吃大餐那么轻松，各种文艺形式的繁杂内容与内涵，都要求每个鉴赏者在接受了一定的训练后，才能有所领悟。而且，品赏文艺的训练，最好在年纪很小时就做起，这才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因此，除了须培养一队文艺尖兵外，从小学时代就训练学生鉴赏文艺的能力，也是不可或缺的烦琐工作之一。

过去廿五年新加坡在经济方面取得的成就是足以教人自豪的，今后廿年的建国方针既在塑造一个有教养的社会，那我们应该可以很乐观地盼望一个文艺春天的到来。举办文艺节，联办全国性文艺活动，都是为欢迎春天到来而准备的节目，但提高文艺工作者的社会地位与待遇，并培养大批文艺鉴赏者，也是非确实去推行不可的工作。否则，我们会迎来一个但有春风，而缺乏百花齐放，千叶相映成趣的春天，那是教人惋惜的。

09-01-1985

艺术气氛

新加坡廿一世纪蓝图中最难实现的是，人民具有文化修养，懂得欣赏艺术这一点。

文化修养是自幼培养起来的一种气质，除学校教育外，家庭的熏陶也很重要。欣赏艺术不同于上餐馆吃大菜那么轻松，对某种艺术的理解与体会，须经过长时期的、枯燥刻板的进修。国家、社会、学校、家庭若没创造培养欣赏艺术的风气，能鉴赏者就不会多。

搞艺术者的生活待遇与社会地位，也是个关键性问题，文人固穷的论调早已过时，社会分工越细，各个行业都必须得到尊重，才有可能行行出状元。过分强调科技工科的重要，使搞文史者不只生活较别人潦倒，社会地位也较别人低，那就永远无法使社会充满艺术气息。

我们不是没艺术人才，也不是不可能培养有文化修养的人，但关键在于艺术家的地位该得到肯定，艺术气氛也须刻意去营造，这样才能塑造出一个有文化气氛的社会来。

23-01-1985

人生任务

我是相信人活着原则上是为了丰富自己的生活而来的，只要一个人的业余嗜好是正当的，他不只能找到知音，在发展这项嗜好时，也会对社会进展有所贡献。我想，一个人不一定要把自己的一生当作完成一些任务而来的，这太刻板了，也太索然寡味了。

我当然不会反对有人把自己的一生当作为完成某些任务来度过，不过，这样的人到底不多，而且多是先天下之忧的人物。以我本身来说，我较喜欢培养能发展我的个性与特长的良好嗜好，因为在这过程中我深入地享受到了生的乐趣。至于这种良好嗜好会不会完成某一种社会任务，那是较次要的问题。或者说，任何良好的嗜好都会完成一种社会任务。不过，你如果是为完成一项任务才来培养嗜好，那生活就会很乏味。对找不到路的少年来说，尤其如此。彩装少年需要的是找到生的乐趣，而不是人生任务。

游离少年，访客，彩装少年，这并非我国独有的现象。每个人的一生都有一段彷徨时期，只是这些少年人在学业上失败了，在生活上又没找到较健康的嗜好，就只好以出奇制胜手法来发泄心中的不满。五、六十年代新加坡各个角落都有流氓，基本上也是失败青少年所组成的，只是现今警方管得严，学业上的失败者只好转向奇装异服，怪诞行为方面去发展了。

每个人一生下来都有几十年岁月可供度过，在这过程中若能全

心全力贯注于一项利人利己的嗜好，生活就会丰富点，日子也会发出光辉来。这道理看来很浅显，却往往须在苦闷好一段日子后才可悟出的。鼓励找不到出路的青少年顺其自然而生活固然不好，但板起脸孔向他们说教也必然要碰壁。

17-02-1985

星 三 星 /



独具慧眼

叶嘉莹在一篇谈论红楼梦的文章中曾说，贾宝玉周旋于群钗中并非好色，而是喜爱她们的高尚品格，这见解相当新颖。

我向来是很讨厌贾宝玉的，为的是他的脂粉气太重，一点也没有男子汉的气概。这样的男人只能是没落富家中的败家子弟，而不是能干出可歌可泣事业的英雄。

但细细回味贾宝玉一生的言行，却很同意叶嘉莹的论证。贾宝玉由始至终甚深爱的只是林黛玉，薛宝钗得到的只是贾宝玉的身而不是心，袭人与贾宝玉初试云雨情是她勾引他的结果，错不在贾宝玉。即使是贾宝玉最喜爱的婢女晴雯，他也从没与之有何暧昧关系。

我不知道曹雪芹所描写的贾府生活有多少事实根据，但他所划的贾宝玉高尚情操的形象却教人敬佩。只是在男女授受不亲的东方社会，贾宝玉这样的人物，大概只能生活在小说里，万万不能在现实中出现，否则就会永远背着黑锅生活。

我看过一些研究红楼梦的文章，过眼都忘却了，独独记得叶嘉莹的此论点，为的是她能独具慧眼赏识贾宝玉。可见研究学问，有时并不能单靠死功夫，冲破原有的道德观念，从另一较开放的观点来看待问题，往往就有意外的收获。

25-02-1985

非 缘 分

始终相信，能成好友的人，总是在性格、人生观、嗜好、品味和气质上和自己有相似者。人与人的相互认识，当然得靠机会，但朋友能否长久维持下去，却不是靠缘分，而是靠具体的生活内容，对异性朋友，也不例外。

贾宝玉初见林黛玉就嚷嚷五百年前见过她，原因在于贾、林都是藐视封建礼教的年轻人，这不是玄之又玄的缘分所能解说的。

人对初认识的朋友，有时会有一种惊喜，这种惊喜可能来自对方的一颦一笑，也可能来自对方对事物的看法与你很一致。要说这惊喜是缘分也好，但惊喜并不是维系友谊的重要因素。

在惊喜的基础上来往一段时日，倘若你发现对方在很多方面的观点和你大相径庭，这就是友情不能再深化或维持下去的缘由，你说这是缘尽，那是蒙上一层纱的说法。

你可能崇拜某一个人，并从他的文章中认定他必定是不凡者，偶遇上他，果然由他的谈吐中觉得他气轩不凡。来往日久，他的短处暴露，你失望了，不想与他继续来往，这也不是缘尽，而是你心中的美丽幻影已破灭了。

友情需要时间考验，而巩固友情的因素是相似的人生观和兴趣，但对一个人的人生观的了解须费颇长时日。好多朋友与我们来往一段时日后，就中断了，原因就在于彼此发现对方的人生观原来与自己的是那么南辕北辙。

08-03-1985

劝世文

喜欢写作的人最好不要读太多儒家思想的书，尤其是宋明理学的书，更不要去接触。近代的，则最好少读文革时期阐述革命思想的书。

诗经中的寄情之作，原本是纯纯正正的诗歌，一经饱受儒家影响的迂腐之士的诠释后，就变为思君之作了，于是一首好端端的诗，就被歪解得不忍卒读。

受传统华文教育者，在学文学时，最该有的认识是，中国文学的文以载道思想太浓了，即使没能力阅读外国文学以冲淡这股腐气，也应该多读民歌，唐诗，宋词，明清小品及五四时代的散文诗歌，藉此寻获性灵的解放。

写作者并非可以不关心政治，也不是不必遵守社会道德，但写作者若只装出道貌岸然相，并为为政者涂脂抹粉，他的作品生命力就会全然消失。写作者要拥护真理，但不可拘泥于迂腐的道德观念，否则他的性灵就会窒息。

写作者须流露真情，即使那是颓废如郁达夫的，也胜过虚假的，欲说还休，欲盖弥彰的感情。真情未必是正确的，但真却是文学的生命要素。板起脸孔，装腔作势说大道理的人，不是文艺写作者，而是道学家，他所写的东西，也不是文学作品，而是劝世文。

19-03-1985

写作的快乐

有人以为写作者的生活一定是很多姿多彩的，其实不然。写作者应该是只较常人敏感点，他们较易从平凡生活中发现情趣。他们又耐不住冲动，而要把自己的生活感受表达出来，因此令读者误以为写作者的生活是充满诗情画意的。

但写作者的可爱处也在此。倘若写作者过于世故，言不由衷，虚情假意，那他写的文章就一点也不感人了。因此，成功的写作者，尤其是散文作者或诗人，他们的作品一定得流露真情，否则就会缺乏感人得艺术魅力。好的写作者应该没有个人的隐私或秘密，这或许是他们的不幸，但却是艺术成功的必备条件。郁达夫的日记与散文感人至深，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在于他赤裸裸公开他的情史。

常人误以为写作者的生活多姿多彩，原因在于写作者把他们的生活感受都抖出来了。但也不是因此就说写作者没较常人生活内容丰富的地方，由于长期培养起来的观察事物的能力特强，他们往往就能从貌似平凡的生活或景物中，看出不平凡的道理或情趣来，这应该就是写作者最大的快乐。

21-03-1985

个 人 化

越来越相信，生活的丰富与否是很个人化的。是知己也好，是好友也好，甚至是夫妻也好，他或她都没法把自身的生的欢乐，原原本本传授给对方。而且，在很大的程度上，生活内容越丰富，活得有意义与长久的感觉也越浓。

在清晨的草地上，看到绿油油的野草的茂盛，我欣然感到生的欢乐，看到湖水在微风中荡起圈圈涟漪，柳丝轻拂，我体会到生的意义之一在于欣赏这种诗意。山边的一朵云，树丛的一声蝉鸣，旷野的一点萤光，都蕴藏着诗味，那么地教人遐思与寻味。

午夜漫步异乡街头的落寞感，秋晨看落叶的书肃瑟感，冬夜看雪飘的凄清感，春天看百花盛放的充实感。雨中在异乡的小店吃炒面的孤单感，滂沱大雨在故乡咖啡店喝啤酒的冷落感，夕阳下在海滨吃海鲜喝啤酒的苍凉感，百感交集确是人生最大美好享受。

或许是一向来泛览不少文学作品，自己对周遭事物才那么易于兴起感触，但却从不后悔自己这么情绪化，情绪的易于波动，正是我感到生活内容丰富的要素，象本身性格上的这种特点，确实是无法传授于任何人的。我说生的欢乐是很个人化的，原因在此。

08-04-1985

真 诚

有朋友说我写的东西有些太个人化了，听后我并不耿耿于怀。知道自己生活圈子小，住的小岛也没什么名胜可一玩再玩，又懒于啃读大块头文章，泛览报章、杂志与单薄书本，一有所感触，就只能写出抒发个人情怀的文章来。

但自信自己的感情还很真挚，而这对写作人来说是最可贵的品格。一向最讨厌吞吞吐吐，欲说还休的掩抑感情者。

外表道貌岸然，内心胡思乱想，既要人家尊敬他，却又想干偷鸡摸狗勾当者，我只能称之为伪君子，尽管他整天在高发议论，装作闲适状。

我对生活的感受未必都正确，我对事物的看法也不尽没谬误，坦然地披露出来，即使有荒谬处，世人也尽可指正我。

尽管有人喜爱淑女的弄姿，绅士的作状，我却认为毫无掩饰者的心胸更光明磊落。真诚，不只是我的人生观，也是我的文艺观，过于世故者不能成为我的知己，他们所写的掩饰真情的文章，也只有教人作呕。

20-04-1985

立足点

读了杨朔散文选，又看了一篇评价他的散文的文章，觉得杨朔散文写得好，主因在于他有诗人的气质与敏感，既有敏锐的感触能力，又有旧诗词的学养，往往一下笔，就能抓住读者的心。

但杨朔的好多散文，却也是说教味道太浓的。我甚至认为，杨朔若没那么受到文以载道思想的影响，他的文学成就应该更高的。文学家与道学家应该是死对头，但中国文学的文以载道思想却是个老传统，这使到学中文的人在不知不觉中就陷入其陷阱去，以致写不出较富纯文学味的作品来。

我想欧美的闲适小品文，或日本的恬淡随笔，在中国文学作品中不是没有，但比重太少了。自中国解放后，而倡导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以来，适闲之作就更少见。

文学不是没有社会功能，但过分强调此功能却也会戕杀文学的。杨朔的过分刻意要在每篇散文中都能说出一个大道理，正是他好些文章过于矫揉造作的原因。

但是彻底扬弃文学的社会功能，却又易使作品流于唯美之作，要如何在社会功能与过分闲适之间找到一个适合的立足点，看来是我们的困难所在。

01-05-1985

世界华文书展

由今日开始在报业中心举行的“世界华文书展”是深具意义的，爱书的人可借此机会泛览来自各地的华文书籍是一回事，更重要的是此风气一开创，若能从此经常举办这类活动，那对培养读书风气必有所促进作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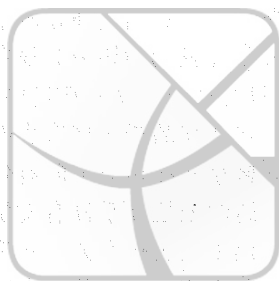
书展的格局颇为壮观，以我的所闻所见，大约只有东京八重洲大厦的那家规模宏大的书店，可以比拟。那家书店我并不常去，然而每回一去，就会呆上三两小时，浏览英日文书外，也顺便看看根本不懂的德、法文书籍。该书店书本多自不在话下，摆设的灵巧和气氛的优雅，才是使爱书者流连忘返的。本地的书店似乎尚无这样的规模和格局，此次书展也算是让我们稍微能体会此种格调之一二。

银座的秋天的星期天，例必有露天书籍展卖会。有时在步行者天国的街道两旁，就有这么十多摊连续不断的书摊，让你在秋风送爽下慢慢踱方步，慢慢翻阅你喜爱的书本。日本人不在春夏冬举行露天书展会，独独在秋天才进行这种活动，我看除了由于秋天高气爽宜于露天漫望外，也由于秋天落叶缤纷易使人兴起人生几何，从而立下努力学习的壮志之故吧。

我们没有秋天，除了一雨成秋而外，然而雨天却又不能在露天举行书展。因此在报业中心的有冷气设备礼堂举行书展，也算是犹如在秋天般的气温下从事这类活动吧。

在许多时候，读书风气的形成是需要刻意推动的。琳琅满目的书本，优雅的摆设，以及宁静的气氛，便是引发读书情绪的好环境。我们既无条件开设规模宏大的书店，像世界华文书展这样的联办式临时大书店，也足以弥补这方面的缺憾了。

23-05-1985



文穷而后王

柳宗元被贬到永州十年，这期间他在政治上的抱负无法施展，只好寄情山水，并藉文章抒发胸中块垒。他在这十年内所写的山水记、传记等等作品，不只是他个人文学活动中的高潮期的旷世之作，即使在中国文学史上，这些作品千多年来也闪耀着不朽的光芒。

再贬到柳州五年，柳宗元在地方上颇有建树，他的政治理想有相当部分得以实现了，这时期他几乎没有文学创作了。

文穷而后工，印证诸中国古代文人，几乎屡试不爽。柳宗元从京都再贬至柳州，只因胸中抱负有小部分得以施展，就可以放弃文学创作活动，可见中国文人到底还是以服务人生为重要任务，文学创作到底只是从政之余的产物。

文穷而后工，是中国文人从辛酸生活遭遇中得出的结论，它的可悲处有二，一是文人得意，就少创作，只有失意才搞创作，因此中国文学多为鸣不平之作，而较少抒写恬适之情之作；二是中国文人，似乎始终无法摆脱统治阶级而自力更生，这种依赖统治者而生活的特点，应该也是中国文学作品以温柔敦厚为良好传统的其中一个原因吧。

27-05-1985

艺术的副作用

中国影片有一个很明显的特色，那就是强调爱国思想。无论是战争片，社会问题片，爱情片，历史剧，都离不开这主题。说中国影片说教味道太浓也好，批评它们万变不离其宗也没错，它们经常会带给我很大的震荡却是事实。

西洋影片不是没阐明正确人生观的，但更多的只是刻划现实中发生的故事，其长处是没说教味，也没大力渲染维持既有的社会道德观念的意图，因此能令人轻轻松松地来享受观赏艺术的乐趣。不过，缺点却是少了一个耐人寻味的主题。

每看完一部中国影片后，我总觉得这么严肃对待影片的中国，其前途应该是很光明的。但中国这百多年来始终还未能在这个世界上脱颖而出，却又使人不得不发出这样的感慨：影片中所阐述的正确主题，到底有多少人去身体力行？

在艺术的诸多功用当中，有一项是近乎麻醉式的逃避现实的副作用。唯其如此，许多在现实中不可能实现的愿望，艺术家往往会安排它在艺术中出现，而观赏者也以此自得其乐，自我陶醉。

中国影片的拍摄者，相信还不致有意识地滥用艺术的此种副作用。但爱国主题的必须经常受到强调，也许足以说明一般民众的爱国意识尚有待巩固与提高。若从这角度来对待中国社会现实与影片的内容，相信就不会产生太大的疑惑与感慨。

30-05-1985

素描

培芳的《我心深处》已放在书桌上好些日子了，因忙于琐琐碎碎的事，才只读了廿来篇。培芳虽是我在南大时的同学，但念的不是同一系，就只见面而从未打过招呼。但我在东京时，她却曾两度到那儿接受为期数月的专业训练课程，因此太太与我有机会与她在我家吃过两次便饭，并有一次我全家大小偕她共游明治公园。对这位职龄比我高，但年龄较我小的同事，也就有些认识。

从纯文学的观点来看，我并不是很好的写作者。理由是我的逻辑思维似乎不比形象思维弱，也就是说形象思维并不太强，而这正是文学的致命伤。我看了培芳的一些文章后，直觉得萧乾先生所说的，从文字基本功来说，还是应多从事些素描，是非常有启发性的。

培芳的采访经验与生活阅历不可说不丰富，这只要读一读她的文章就知道。可惜的是，她只写报告文学与收在此书中的小感触文章，这似乎有点糟蹋了题材，她应该可以把其中的一些题材发展为小说或散文。

小感触也有它的生存价值，而且能让读者更直接了解作者的心态。不过，素描功夫确实是踏入文学门槛的必要步骤。素描不只能锻炼文字基本功，还是培养描写能力的有效途径，我想培芳或应从这方面多下些功夫。

12-06-1985

感情的海洋

看了好些青年的习作，很为其中的一些文章的伤感情绪所震撼。自己也曾疯疯癫癫过，但那日子已很遥远了。现在是即使在文章中透露一点伤感或颓废的感情，夜晚一喝上两小罐啤酒，也就似乎释然了。因此相信，淡淡的哀愁，是与年龄有关的。

文学是人学，不是神学。学文学而没充沛的感情，是不会有成绩的。但文学作品的充满感情，与学文学者的满腔溢满的感情，有时都会使学文学者溺死在感情的海洋中。自己的经验，就是如此。

年青人要如何避免溺死在感情的海洋中？我实在指不出一条道路来。只是相信，每一个教训，并不一定得亲身经历过惨痛的经验才能取得。

学文学的年青人或许能这么理解文学：不深入文学作品的意境中去，是不能欣赏到其美妙的，但能入而不能出，却也肯定会在感情的海洋中溺毙。

对待自己的作品也一样，当书写一篇充满哀愁或幽怨的文章时，往往是自己把该事件当为往事之际了。一句话，由于文章是痛定思痛后的产品，文章一写出后，自己就不用为它而自杀。许多伟大的作品，都是作家感情挫伤并已冷静下来后才写出来的，而他们之所以能这样洒脱，就在于他们有惊人的毅力与理智。可以说伟大的作家，也必然是能理智地、冷静地分析包括自己的感情在内的思想家。年青的学文学者，或许应在思想方面有所提高，这样才能免于溺死在感情的海洋中。

14-06-1985

秦牧的散文

秦牧的散文给人的第一个印象是，他的阅历与各方面的知识非常丰富。不论是花草鱼虫，天文地理，上下古今，艺术戏剧文学，他都能娓娓道来，并夹叙夹议地说出一番道理来。

读他的散文，觉得他那支带柔和语调的笔所透露的感情，是那么清新与刚健。更重要的是，他的散文令你发现生活中有那么多情趣，直把你心中可能存在的邪念都一扫而清了。我因此认为，感情脆弱者，应该多读他的散文。

我不曾在秦牧的年轻时代的散文中，嗅出他感情遭受波折的味道，更不曾在他的近几年的散文中，看出任何情绪的波动。甚至在十年浩劫中所遇到的打击，他也那么潇洒地一笔带过。秦牧的散文不是没带感情，但他的感情似乎经过理智的过滤，而且是彻底地过滤过，因此读他的散文，全然没伤感或悲伤的情绪感染，而是自己的情绪净化了不少。

我相信秦牧日常生活一定是很恬适的，但又充满情趣与诗情画意。学文学而能臻至此人生境界，是我所向往与羡慕的。

但对感情丰富者来说，秦牧的散文的一个不足处，或许是读者无法从中看到自己的悲怆情绪的影子。秦牧的富于哲理，而感情又彻底过虑的散文，可能轻易取得中年以上读者的激赏，而较难引起年轻或感情丰富者的共鸣，尤其是那些联想翩浮，篇幅不短的散文，更是如此。

28-06-1985

阿达的风格

学文学的人最容易犯上的毛病是，不问时事，但求阅读与写作之乐。这结果是，有些人躲在故纸堆里找生活，有些人却生活在梦幻世界里。对当前的现实矛盾，要不避而不谈，就只知摇头叹息。我的同事阿达，在大学念的也是中文系，但却是彻头彻尾的头脑清醒者。读他的新著《花香鸟语》，就知道他是个积极干预生活者。

他没吟风弄月，文章内容也多是周遭的小事物，可一经他风趣幽默的笔轻轻一点触，就妙趣横生，且收到针砭时弊之效。杂文的特色若是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阿达的杂文却多是嬉笑之间露真情，绝少有怒骂的成份在。

马华文学的传统，还是严肃的成份多些。抒情就抒情，说理就说理，议论便议论，指陈时弊归指陈时弊，阿达的在言笑间寓一一点点教育或教训意味的特色，在马华文学史上还少见，我相信在极度荒凉与沉闷的华文文坛上，阿达的风格，是能讨好读者的。

阿达的才智相当高，但有点“吊儿郎当”，有一次我和另一位同事喝酒喝到半醉时提到阿达，都认为阿达若能稍收其“玩世不恭”的态度，潜心钻研些学问或专心攻读一些好书，他的成就必然更大。另一次我就把这结论告诉阿达，想不到他却幽了我一默说，如果我能够他那样“玩世不恭”成就也必然会更高。我听了只有为之气结，这就是阿达的风格。

26-07-1985

文艺团体与宗乡会馆继续合作

南方文艺研究会迁入同安会馆，借后者之场所展开活动。这虽不是新闻，但却是文艺团体继续与宗乡会馆取得联系与合作的好现象。好多文艺团体在财政压力与都市重建影响下，一旦搬出旧会所后，往往就会面对何去何从的困境。大多数会馆则因领导人是商界巨擘或社会贤达，少有时间与精力来从事文娱活动，因此导致会馆活动只局限于新年团拜，春秋两祭，喜丧事联系，与颁发奖助学金等等。

随着形形色色的，较能吸引年轻人或专业人士参与的组织之出现，宗乡会馆的活动范围若不能有所扩大，它们就会在时代潮流的冲击下，无声无息地消失于无形。宗乡会馆的容纳文艺团体，可说是为本身引进一股新血，这么做，自然并不能担保宗乡会馆一定能枯木逢春，但至少它们却比较能担当起时代的任务了。

本月七日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章程已拟就，最近即将向社团注册官申请注册，同时，该会也宣布今后一年内所要展开的七项主要活动计划。这些计划包括节日文娱演出，会馆现状调查，体育活动，及出版会刊与文艺作品等等。总会的活动方针，简单地说是以推广健康文娱为主，这方针不只与1999年的社会远景相吻合，也大大提高了宗乡会馆的社会地位。

但总会只是一个咨询与协调中心，它所计划的活动须得到各宗

乡会馆的支持，才能完善地实现。因此，文艺团体与宗乡会馆的合作，不只是解决了它们彼此所面对的难题，也间接为总会实现既定计划献出力量。

八十年代与六十年代末或七十年代初期的最大不同点是，官民在解决了基本生活问题之后，都想为建设一个有文化素养的社会而努力。文艺活动不但不会受到限制，还受到当局的积极鼓励。在这样的环境下，文艺团体与宗乡会馆携手合作为文化建设而尽棉力，是合时代需求的作法。

我们希望更多的文艺团体能积极与宗乡会馆合作，在保持各自的独立性的原则下，为我国的文化建设作出贡献。宗乡会馆引进文艺团体，无异于输入新血，文艺团体加入宗乡会馆，等于减轻本身的财政负担，并扩大自己的活动场所，二者之间的合作，再加上总会的领导，它们对文化建设的贡献就不容忽视了。

30-08-1985



胸

襟

一群爱好文艺的年轻人投诉，写好的文章无处刊载，这实在是教人丧气的事，初学文艺者，要在非常有限的版位上，与已成名或略有名气的作者争一日之长短，真是谈何容易。自己在刚起步时，每投十多篇稿才有一篇被录用，且须等待数月才见天日，那种痴痴苦等的滋味，也是遍尝过的。

但现在的年轻文艺爱好者，却还有另一层担忧，那就是华文文艺的寿命到底有多长。人生是短促的，若把生命献给一种永恒的事业，可说是不朽的话，那文艺便是不朽事业之一，问题就出在华文文艺在本地的寿命可能不是很长久的，这就难怪文艺青年要彷徨了。

我由这群文艺青年对文艺的执著看到希望，但却也因他们的彷徨眼神而感到悲痛。能认识到生命的意义的人原本就不多，既有了认识，又有了奉献的对象，却苦于对象很可能夭折，世上还有比这更痛苦的事吗？

30-09-1985

语文与传统文化

传统的华文课本相当注重历史人物的介绍与价值观的阐述，一些著名篇章如《阿房宫赋》，《正气歌》，《长恨歌》，《张巡死守睢阳》等等，不只文采华丽，内容也涉及史实与为人处世的气节问题，华校出身人士较有民族意识与忧患精神，原因大半在此。

随着教育制度的逐步统一，母语的列为第二语文，语文教学内容自然也有所更变。华文课本自小学至中学的偏重现代生活的描述，可说是很自然的转变。问题是，小学生由于着重双语的训练与科学知识的吸取，史地知识无形中受到忽略了，加上华文科也忽略了历史人物与事件的介绍，我们的年轻学生也就缺乏传统文化知识了。尚育区国会议员简丽中博士日前在该区“讲华语之夜”上所强调的，小学华文课程应增加传统文化内容，确是有感而发的。

语文学习原本不应与道德教育混为一谈，宗教与儒家伦理课程的设立，就足以说明这道理。但此些课程并非必修科而是选读科，有些没选读这些课程的学生，他们的历史与传统文化知识就很贫乏。中学历史课程又偏重本国与本区域历史，学生也无从了解本族历史，在缺乏世界史与本族文化传统的情况下，他们的视野势必受到局限。因此，摆在我们眼前的一个问题是，如何在不降低掌握语文效率的前提下，也向学生有系统地灌输史实与传统文化观念。

以报章新闻或评论作为华文的教材，其优点是切合现实，适用

性大，无论词汇或事实都很新鲜，随学随用，一点也没浪费时间，但也有一个偏差，那就是没触及民族历史人物与优良传统价值观。忠孝仁爱固然可通过儒家伦理课程来教导，但正如简博士所说的，文化传统的传递应该在学生年纪小时就开始，这样他们才会吸收得更快。

但母语只作为单科课程在中小学教导，它能同时担起表情达意与传播传统文化价值观的重任吗？若能，史实与历史人物该占多少份量？这似乎是个值得大家探讨的课题。或者，我们可否考虑在《公民与成长》课程中，穿插一些历史人物的丰功伟迹或感人的史实。

简博士的建议很有意义，问题的关键是作为单科课程的母语，要如何在肩负起一般语文的功能之外，再担起传播传统价值观的重任呢？中一中二学生只修新加坡史，会不会太狭隘了点？我们可以不可以考虑让学生以母语选读本族史，以达致向学生灌输优良价值观的目标？

09-10-1985

解剖刀

总认为学文学的人虽然感情较丰富，但在分析一切事物时，最好还是诉诸科学方法。把一切都归诸于命运或玄之又玄的所谓哲学，于己既无利，又会误导别人，这不应该是受过高深教育者所应有的态度。

一切学科都须与科学挂勾，是现代社会的特征，文学也不例外。以为文学与科学挂勾，文学的生命就会受到扼杀，那是迂腐的看法。文学虽是以情动人为其特征，但作者若能以科学方法来剖析社会现象，则其作品必更有深度。

我想在现代社会搞文学者，他的头脑必定得清醒才行，这不只为己，也是为读者着想。一个连自己的遭遇都无法解决的人，他的创作至多只能是梦呓，麻醉自己，也误导别人。

要同时找到一个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一样强的人并不容易，但形象思维较强者却不可因此排斥逻辑思维的重要性，写抒情文章的人若逻辑一塌糊涂，他的文章的价值也要大打折扣，伟大的作家，往往也是伟大的思想家，就足以说明这点。

愿所有爱好文艺者的笔都是一把解剖刀，在剖析一切现象时固然要带着爱憎之情，但也别忘了要科学地看准部位下手。带着落后的，陈旧的，不科学的观点来解释一切现象，就只有把自己与部分单纯的读者带进死胡同去。

11-10-1985

平凡年代

轰轰烈烈的时代，才会产生感人肺腑的伟大作品，古今中外的文学史，好象都证明此说不谬，但我们除须明白这样的境遇是可遇不可求的之外，也须知道在这样的时代，人类所付出的代价有多大。悲惨年代若是人类前进所不可避免的难关，大作家生活于那样的年代，固然有机会写出伟大的作品来，但他的内心切望的还是人类能赶紧得到幸福。换句话说，伟大的作家在悲惨年代写出感人的作品，为的是伸张正义，揭露黑暗，并指导民众走向光明。

我们该感谢伟大作家为我们留下悲惨年代的巨幅图画，但也无须为自己生活在风平浪静年代，而感叹写不出感人的作品来。文学除会促进人类进步外，也有美化人生的作用，生活舒适者，为何不开拓追求人生美丽的境界呢？

奇花异树，鸟兽虫鱼，山川风云，深山老林，小桥流水，春风秋月，生活中的小情趣比比皆是，把它们发掘出来，让一般人也因此与你分享乐趣，这样的作品不也是很有意义吗？

中国文学文以载道思想根深蒂固，我们自幼受到影响，在不知不觉中也特别强调文学服务社会的功能，而致忽略了它也能美化人生。

在平凡的年代里，多写一些抒发性灵之作，应该不是个错误吧？

25-10-1985

变 化

搬到新组屋已近一年，依然保持天天晨跑的习惯，跑道筑在马路旁，比普通标准跑道短一些，也是砂砾铺底。跑道中央绿草如茵，又栽满果树，翠绿不减旧居的那条细沙为底的直伸跑道。但看不到流水，看不到绽放的红花，天天兜着圈看着千篇一律的组屋，是有点厌倦的。

但晨运的人特别多，年老妇女更多，看其模样都是从乡村搬来的。我童少青年都在乡间度过，就从没看过有人在晨间运动的。搬进组屋了，我想人们一不能忘记大自然，二也没农事可操劳，早起到运动场去走走应是很自然的事。

到熟食中心买早点，又赫然发现卖素食的摊子顾客特多。我旧居的熟食中心也有摊素食的，生意似乎不太好，新居的却生意兴隆，看来人们是越来越重视健康的了。

晨运后回家站在阳台上往对面组屋一望，上上下下几乎每一家的阳台都摆满大小花盆，栽花植树，又俨然是组屋居民的另一嗜好了。我旧居的邻居也似乎没那么多人栽花的。

搬来新居十多个月的另一经验是打麻将的人不多，把电视机或收音机开得震天价响的也绝无仅有，我住所附近既没电影院也没其他娱乐场所，离熟食中心也远，但邻居都安安静静在家度过平静的夜晚。我由上述的这些现象，似乎发现到这么一个变化：不少民众在生活方式改变后，已更重视健康与优雅的精神生活了。这是一个好的转变，但须有人继续引导，电视台在这方面可说肩负着最大的责任。

11-11-1985

结集

志同道合的青年把习作结集出版，近年来颇蔚为风气，手头看到的就有《经历》与《朝露集》。文坛近来更为沉寂，大家都这么说，事实也确是如此。文艺青年结集出书，虽不比把作品刊在报纸上来得有影响力，流传也不那么广，但把心血结晶呈在大众面前，能得到一些知音的赏识，也就较有信心与勇气写下去。

文学的流传方式原本就多样化的，古人写作多是先给老师或好友欣赏，这样的传阅方式所能达到的读者非常有限，可古人还是有信心地写下去，许多传诵千古之作也因此流传下来。比起古人来，青年人自资结集出版，其所争取到的读者，也必比古人更多，这是我们可以欣慰的。

文坛沉寂的原因很多，在科技发达，娱乐形式众多的现今，文学面临诸多竞争，这又是文学作品的严厉挑战。我们可庆幸的是，文学作品所持有的明显个人风格，似乎远较其他娱乐突出，而这正是文学万古常青的因素。

结集出书既在与同道进行观摩，也在寻找知音。有观摩自会有进步，寻知音却未必能如愿以偿。只是大家都有观摩机会，就也能较不寂寞地坚持写下去，这应该是培养文学继承人的方法之一。

04-12-1985

序《六月》

在《散文一年》出版两年多后的今天，晋江文艺组学员又满怀信心地要把他们的作品结集出版，无论从那一个角度来看，这都是一桩教人鼓舞的事。

岁月的流逝，会促进年轻人的成熟，收在这本集子中的十多个作者的二十多篇作品，从文字到思想内容，与两年前他们所写的已有相当大的不同。有些作者在以前驾驭文字的能力还相当弱，如今已俨然有名家的风格；有些在以往已文词娴熟，于今却朝返璞归真的方向发展。在内容方面基本上与前一本集子一样多姿多彩，只是个别一两位作者在散文中寄寓哲理的手法甚为高明，教人对他们寄有厚望。

我知道这批年轻人都在孜孜不倦阅读古典诗词与散文，希望从中能吸取到提高写作技巧的养分。中国古典文学无疑是个宝库，不过，古人所运用的词汇不如今人的那么丰富与广泛，他们的知识，尤其是科学方面的知识，也不如我们的博大。因此我想学习古典文学，最重要的一点应该是，深入探讨古代作家怎样对待他们的时代与本身的遭遇。要是我们仔细研究一些杰出的古代作家，我们就可看出，这些作家都毫无例外地绝对清醒地看到他们的时代的弊端，而且往往是在本身遭受不如意打击下，坚持自己正确见解，在极端艰难的生活条件下抒发自己的感情，写出大量历久不朽的文学作品。

我们不否认从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品，以及中国一切有价值的古典文学作品，都能是写作人提高表现技巧的养料，但作者与时代，作者与他的生活环境，作者与自然景物等等的关系，却是决定于他本身的人生观。不同的人生观使作家与其生活环境保持着不同的关系，表现在文学作品上也就有迥然不同的风格。人生观不必强求一定要一致，只是作家本身一定要清醒才行，否则他的作品就会一味诉诸于感性的粗浅认识，也就全无耐人寻味的特点。

做为现代的写作人，我们真的应该有宽阔的胸怀才好。多关心民族的前途，国家的前途，这绝不是口号，如果你只沉迷于自己周围的景物，你的作品的感人力量就不大。这样的作品即使文字再华丽，再形象，那也只能感动与你同样经验的读者，它是跨不出你周围的人群的，更不用说跨越国度了。

关怀民族与国家，并不等于说不可吟风弄月，有思想深度的作家的描绘风花雪月之作，必然不同于思想肤浅的写作人的抒发一己之哀的作品。因此，在学习写作的过程中，不断通过学习提高写作技巧固然重要，但深思民族国家的前途，或者甚至整个人类的前途，却是更为重要的。

我希望这批年轻人别从此钻进故纸堆中去，他们应该在比较高的水平上，看看这个新兴国家与民族的前途有何险境，并时时想方法来解决险境。因为我相信，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在给人于美的感受的同时，也使鉴赏者有更强的信心继续推动历史前进。

我们需要文体发展史书

根据马华杰出文学史家方修的论证,新马华文文学是起源于1919年的。72年来,新马华文文学的走向有何特征,新马华文文学有哪一些较引人注目的作品,新马华文文学作品如何与时代紧紧挂钩,并促进某一种社会思潮或运动的展开,方修在其《马华新文学简史》、《战后马华文学史初稿》,以及自1956年起至1978年止,23年里每年年尾都为一年来的新马华文文坛动向所作的总结评论的文字中,已为我们相当详尽地勾勒出一个轮廓来。

可以说,有关战前与战后新马华文文学史纵的方面的发展轨迹,方修已条理分明地为我们描绘出来了。再加上较年轻的新马华文文学工作者如杨松年的努力在战前新马华文文学的点方面的深入探讨,写出诸如《战前新马文学所反映的华人生活》、《新马早期作家研究》、《战前新马报章文艺副刊析论》等等专书,更使我们对战前新马华文文学有关点方面的内涵有进一步的了解。

然而,有关新马华文文学的横的方面的研究文章,就不如纵的与点的方面的研究那么全面与深入了。有关散文、小说、诗歌与戏剧这四种文体的发展史,我们迄今所能看到的,只有苏菲《战后二十年新马华文小说研究》,原甸的《马华新诗初稿》与朱绪的《新马戏剧活动四十五年》三书。散文的发展史,至今尚未有人加以研究,并写出有分量有见地的书来。即使是原甸与朱绪的那两本书,

在深度与广度方面，也还是可以进一步开拓的。

至于对马华文学史上有较杰出成就的作家，作全面与深入研究的，更是洪荒未开的领域。市面上所看到的一些有关这方面的书，如赵戎的《新马华文文艺词典》，马仑的《新马华文作家群象》与《马华写作人剪影》，以及新加坡文艺研究会出版的《文艺的敬礼》等，都只是对一大群作家作浮光掠影的介绍文字，而不是有系统，有深度的研究文字。

进入九十年代的新马华文文学，正面临着语文水平日益低落，而一些写作人又只追求文字上的标新立异，因而使内容容易显得非常空洞的困境。与此同时，近十年来文字批评非常落后，一些中国作家对新加坡华文文学所作的介绍或批评，颇有“吊高”着来赞扬的弊病。如果我们毫不自觉地把这种溢美的褒语，当作真的是我们的华文文学所已取得的成就，那我们一定会窒息在这种一味赞扬的褒语中。

新马华文文学史上，曾出现过一些自诩为马来亚的契可夫、马来亚的屠格涅夫的作家，那种往自己脸上拼命贴金的恶劣作风，正是井底之蛙的夜郎自大的浮夸。我们如果在扬弃这种浮夸作风的同时，却又犯上另一种借他人的溢美的褒语以抬高本身地位的毛病，那我们的华文文学真的就会在一片赞美声中慢慢消失掉。

在追溯诗歌、戏剧、小说、散文及理论发展史时，我们就会清楚地看到，新马华文文学曾经走过怎样的道路，在针对某一特定历史大事时，各种文学体裁有过什么方式的表现与反映。新马华文文学虽然是马来西亚独中的教学科目之一，它却不是新加坡中学的教学科目。正由于新加坡的年轻一代在学校中少有或甚至可说是完全没有机会接触新马华文文学作品，那他们对什么是新马华文文学的优良传统的全然无知，也就不会教人感到惊讶了。

对本身的文学作品与文学史的缺乏了解，不只会无法从中吸取有用的养分，继承优良的传统，且会不知道新马华文文学在世界文坛上到底有何地位？对这方面的无知，不只容易使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变成井底蛙，自以为很了不起，而且会轻易在别人的吹捧式的赞扬中踌躇满志起来，而不知道应在不断进修中求取进步。

无法继承本身的优良文字传统，也容易在创作方向方面随波逐流。新马华文文学的萌芽既是受到中国五四运动的启示与影响而引发的，在接着下来的岁月中，新马华文文学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受到中国文学的影响，那是可以理解的。甚至在中国推行关闭政策时，新马华文文学作品，转向港台作家吸取养料与表现手法，那也是正常的。然而，我们独立已26年了，在文化艺术方面，我们总不能一味模仿别人，我们总得找出本身的传统来，加以继承并发扬光大。在华文文学方面，要做好这方面的工作，我认为几部不同文学体裁发展史得先整理出来，另一方面，有水平且有见地的文学批评也得建立起来才行。



文 学

马来文化协会最近举办一项青年文学节活动，但反应不热烈，颇教有关人士失望。其中的班顿比赛节目，由于只有五人参加，只好取消，其他节目的参与者也不踊跃。

班顿也许与中国文学的古诗，或日本文学中的俳句一样，形式较古，又须押韵，因而不受年轻人欢迎，也就不足为怪。但其他文学形式的反应不热烈，就足以说明文学在我们的工商业社会已不受一般人关注了。

最近读到一篇赞扬俳句的短文，很与该文作者的读诗心得有同感。仔细深思，才觉得生活在工商业社会，想从静静的意境中去寻求寄托，实在不是易事。更何况欣赏艺术，并非一蹴可就的。文学在工商业社会里，原本就可有可无，在学校既不比理工科目更受重视，在社会上又难以此为生，它能不没落吗？

只是文学到底是一个国家或甚至人类进展中必不可少的一环艺术，有兴趣于此艺术者，在以此充实自身精神生活的同时，也应看到它所肩负的任务，有了此种体验，那即使此路是多么艰难与寂寞，也应该走下去。

马来文化协会主办的活动反应不热烈，固然较人失望，但该组织应继续努力下去。如果志同道合者尚且对前途缺乏信心，又怎能号召民众呢？华文文学界也不例外。

12-01-1986

巴金的唏嘘

巴金最近在接受《朝日新闻》与《读卖新闻》访谈中，除感叹岁月不留人，并强调自己想在有生之年多译作外，也提及在文革期间他本身的心态。巴金说那些年头人人都否定自己，因此他也不例外地否定了自己，言下不胜唏嘘。

一个人最痛苦的莫过于否定自己，而这现象在东方社会又屡见不鲜。在尊重权威，不讲民主的风气下，强权者的言论便是真理，一般民众的舆论就是歪理，东方社会的落后，民众的逆来顺受，多少与社会缺乏民主有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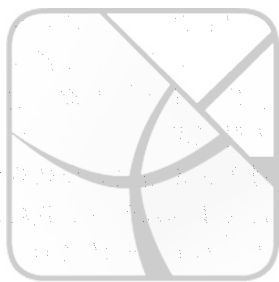
巴金身处文革浪潮汹涌澎湃时期时所遭受的折磨有多大，局外人很难想象，但作为颇有成就的作家，他竟然要否定自己，就可想象当时颠倒是非者是何等嚣张，这是中国当代史中最黑暗，最教人心伤的一页。

知识份子生活在东方社会，一要有自信心，二要藐视权威的言论。如果对什么事物有自己的独特见解，不妨直说出来，权威同意不同意，那是次要的事，时间自会证明谁是谁非。我甚至这样认为：即使在某一阶段你所发出的议论让时间证明是错误的，那也不用悲伤，后人至少可从你的错误中得到教训。

文革时期的是，已是中国今天的非，文革时期所否定的事物，已是中国今天所肯定的，东方社会的是非会因时而异，而且是南辕

北辙，实在滑稽得很。因此生活在东方社会，我是宁愿坚持己见以致犯上错误，而不肯随波逐流对事物妄下结论。巴金的唏嘘教人感慨，但他在有生之年尚能再度肯定自己，也算是不幸中之大幸。

20-01-1986



生活意趣

我们常常感叹这个岛国面积狭小，没甚风景名胜可游览。这多少有点道理，但大半原因却也由于我们不善于挖掘生活情趣造成的。

那天随着一份日文报纸而来的，有一张月份日历，因为是深秋了，日历的配景是芒草，雪白的穗状芒草花，配上叶尖呈焦黄的野草与蔚蓝的天空，这么一幅深秋图，教我在赞赏之余，还情不自禁把这帧背景剪下贴在墙壁上，日日观赏它。

我于此又深一层体会到日本人发掘生活情趣的能力之高。不管是什么原因促成日本人的这种特殊能力，日本人的善于在有限空间制造和发掘生活情趣，却是他们能鉴赏美的因素。日本的盆栽，插花艺术，或甚至造园，都是在非常局促的空间开拓生活情趣的手法。

我们往往叹息生活乏味，没地方去。消闲，多少与我们的不善于开拓生活深度有关。当然，这与我们的缺少较具特色的旅游区也有点关系。不过，最近旅游促进局却不断在为保留各民族文化特色而努力了，这是一个好趋向，今后可供我们逛逛的地方将增多了。

但我还是认为，开拓生活意趣与个人的文化修养很有关连。许多人一看到竹丛就想到笋，这就不能欣赏竹的风韵了。抛弃世俗的功利观点，在闲暇时培养一两项艺术兴趣，不只生活逍遥点，在生活里要发现美的事物也不太难了，我眼前的这帧芒草照片，就是摄影家发觉生活美的具体写照。我们与其感叹岛国缺乏吸引人的风光，何不深入生活中去开拓意趣呢？

读 书

总相信自己是书虫，但近几年来却很少完完整整读完一本专书。不是偷懒，一天之内要看的报章已够多了，有空又得看杂志，看电视新闻报告，或消闲节目，哪还有余暇看专书？

这时代的知识太多了，多到人一停止学习，很快就会成为落伍的人。这时代又要求人的知识面要广，若单单啃四书五经，那肯定要成为冬烘先生的。因此，自己是宁愿少看专门书，而不可不看报章、杂志和杂书的。

读书风气是要提倡的，但不用因此就排斥电视与电台传播知识的功能。而且，除了短小精练的散文与诗歌外，小说与戏剧一搬上电视，效果肯定比阅读原文精彩。文学书会滞销，我看多少和娱乐方式的多样化有关，不过，这是社会进步的必然现象，倒不用哀叹。

还须注意的是，八十年代与五十年代到底不同。这时代的知识分子若不多接触本身兴趣以外的知识，是很容易闹笑话的。隔行如隔山，这话没错，问题是这时代不准许这现象存在。因此，有自知之明的知识分子，不只要博览群书，还须遍阅杂书。

个人的感受是，驾驭文字能力一定得在学生时代掌握好。一离校后，除忙于谋生外，所剩下的余暇用来吸取知识都嫌不够，哪还有时间精读文章锻炼文字？

现代人首先须阅报，阅杂志，其次要看杂书，最后才可谈本身喜爱的专书，只有这样做，才不会落在时代的后头。

会馆应可出版文学杂志

新加坡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成立，对宗乡会馆今后的任务无异注入一股新生剂，不久前该会举行的《宗乡之夜》之受到观众热烈响应，便是会馆所能肩负的新任务之一。配合华人传统节日，举办文娱活动，藉此推广文化，也藉此发扬华人优良传统，这是会馆当前最迫切与最能胜任的工作。

联合总会所出版的季刊《源》，在探讨与收集各会馆的过去与今后的动向方面，是会有积极的作用的。有这么一本定期刊物，不只能使会馆与会馆之间互通声息，也能逐步整理出各会馆的沿革史与先贤人物传记。

联合总会今后能做的另一件事是推广文学活动，在众志成城与群策群力下，总会应该可以搞一本文学月刊。当前对文学活动较有直接参与的是晋江会馆与潮州八邑会馆，前者除主办文学讲座外，也为其文学股学员出版习作，后者则为年轻华文作家出版著作，此二会馆在推动文学方面的领导工作居功至伟。

总会除要带动较不活跃的会馆参与文娱活动外，也可在分工合作方面下点功夫。一些有财力物力而较缺乏搞活动的人才的会馆，不妨开放门户容纳文学团体，而总会则可作协调工作，把各会馆的文学团体联系起来，并向各有关会馆寻求资金，以出版一本文学杂志。文学固然有其局限性，但它是一切艺术之母，也比较易于流传。

影响力也较深远，是一项值得会馆长期进行的工作。

象晋江会馆所主办的文学讲座，有能力做到的会馆也不妨效法，这是传授文学知识的有效途径，不容忽视。另一方面，由于报章的文学版位非常有限，本地又缺少一份文学杂志，因此，培养年轻写作者的责任，各会馆应该欣然承担下来。

一项《华人会馆沿革史》展即将在本周末开幕，这是联合总会的另一壮举，总会的朝气蓬勃表现，教人刮目相看。我们希望总会能锦上添花，在推广文学活动方面更尽一把力。集合各会馆的财力物力，聘请一两位专职编辑，出版一本文学月刊，多刊载一些年轻人的习作，藉此鼓起文学热潮，为国家文化建设贡献力量，这也应该是会馆月月新日日新的一项工作。

12-03-1986



艺术气氛不够普及

经济不景百业衰退，许多商家都通过展览会来促销货物，连书店也不例外。在这些展览会中较教人注目的是，诸如盆栽展卖，书画与书法展卖，就不仅仅是促销货物，同时在无形中也是在提倡艺术了。由这些展览会的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情况看来，我们确实不能说一般民众不喜爱艺术，而是我们提倡得还不够。

五十年代我们的经济情况非常不好，失业问题很严重，人民都为三餐而奔波，既无闲情也无闲钱来喜爱艺术。六、七十年代，我们又致力发展工业以促进经济成长，理工科受到特别的重视，文史科相对地被忽略了，这结果是年轻一代不太重视艺术。

一批是终生为生活奔波而无闲暇培养艺术兴趣，一批是终日只看到科技问题而缺乏喜爱艺术热情，这结果便是我们的社会缺少艺术气氛。此外，绝大多数的购物中心也并不重视推广艺术活动。只是目前的经济不景，似乎已促使一些购物中心主办书画盆栽等等艺术品展卖会，这基本上虽是商家拉生意的手法，却在有意无意间在提倡艺术了，实在值得我们大力赞扬。

最近《海峡时报》曾报道大巴窰的一家咖啡座，由于经济不景的影响，而不得不改为收价较低廉的咖啡店以吸引顾客，其实这恐怕不是唯一的原因。一般上来说，新加坡的咖啡座是缺乏清静幽雅的气氛的，因此在咖啡座里也就看不到阅读的风气。不久前本报曾

报道一家本地旅馆开设了一间中国茶馆，据说气氛很幽雅，且有成套的茶具供人欣赏，这也可算是创举。茶馆或咖啡座在推广读书风气与艺术活动方面，是能扮演一定的促进作用的角色的，台湾与日本在这方面的经验很值得我们借镜。

但提倡艺术与读书风气，切切不可纯粹从功利观点来看待问题。据说一些购物中心与书画商联办展卖会时收价甚合理，这是可教人鼓掌的作法。际此经济不景，产业供过于求时期，业主若能以低价格把店屋租给书画商或茶馆咖啡座经营者，让他们能以较低收费来吸引顾客并促进艺术活动，也是件很有意义的事。

我们不否认新加坡不缺乏喜爱艺术者，但艺术风气却须普及每个角落，才是国家先进的一种好现象。艺术气氛流泛在生活中的每一个角落，这不是遥不可及的理想，而是近几年来逐渐呈现的现象，所有商家与有心者只要加把劲，更有计划地主办一些促进读书风气与艺术的活动，那这理想应该可逐步实现。

18-03-1986

经济不景气时期不可忽略文化艺术

在此举国上下注意力都贯注在经济改革与复苏的问题的时刻，任何人若谈论文化或艺术发展课题，难免会招来不合时宜的讥讽。然而，文化与艺术不只是人类生存与发展过程最重大的活动之一，也是国家繁荣兴盛的重要原动力。裕华区议员符喜泉女士在国会上力倡设立国家美术馆及文化宫与加强艺术活动，可谓空谷足音，在此时此刻，着实教人赞赏。

我们认为，经济不景并不是可忽略文化艺术发展的理由。经委会报告书的重大建议，既已大多被政府采纳，当局又在努力寻求新市场与新发展方向，另一方面又高瞻远瞩地要长期来提高国民的教育素质，我们应可对经济前景抱着乐观的看法。

比较起来，文化或艺术的创造却不是那么轻而易举就能办到的，这是一项须日积月累长期努力的工作。我们过去的教育重点放在理工科，这是为了配合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原是无可厚非的。但从这几年来的一些社会现象看来，由于过份重视理工科的结果，我们的民众似乎显得特别重视功利，社会缺乏一种艺术气息，使人际关系呈现干巴巴的特点，许多受过不少教育者也难免要沦为经济动物。

文化艺术不是穷开心的玩艺儿，它是人类继续前进与发展的精神力量。文明古国尽管由于这样或那样的原因，而在原地踏步或甚至倒退了，但这些国家的国民始终没在这文明世界上消失掉，其中

的一个原因就在于他们有丰富的文化遗产。这些文化遗产不只令他们能在贫困的物质生活下依然享有丰富的精神生活，也使他们有信心继续探讨前进的方向。

新加坡开埠百多年来，着重的是发展商业与经济，独立以来为求生存，也还是着重经济发展。但即使如此，我们也并不太缺乏历史文物与古迹，一切艺术活动也差强人意。在逐步跨进发达国家行列的过程中，我们切切不可忽略文化艺术的创造的重要性。正如经委会报告书所说的，提高教育水平是我们走进发达国家的一个条件一样，提高民众的艺术创作与鉴赏能力也是发达国家必备的要素之一。

我们建国以来相当忽略的两个领域是体育与文化艺术。前者是锻炼国民体质与巩固国家意识的要素，后者则是激发民众想象力与创造力的因素。体育学院现在总算设立了，但艺术或文化学院尚付诸阙如，这是教人遗憾的。符喜泉女士在国会上提到的，保留具历史意义建筑物，设立国家艺术馆与文化宫，改建新加坡河岸旧屋为歌剧院，艺术活动中心或音乐中心，都是值得当局仔细考虑并加以实现的计划。在经济不景时刻力陈文化艺术的重要性，或许是许多人听不进去的，但由于经济衰退而忽略了文化艺术的持续发展，却是个很大的错误。

28-03-1986

我国艺术工作者缺乏认同感

国大绘测系艺术史讲师萨巴帕第指出，我国在艺术上所面对的最大问题是，缺乏美学上的认同感。他所谓的美学认同感，关系到艺术工作者是否受到与其他专业一样的社会的尊重，艺术家是否享有一定的社会地位，以及艺术品是否反映了社会现象和人民的愿望。艺术家在商业社会不象其他专业那么受到尊重，这已不是新奇的事，但艺术家备尝冷落滋味，以致须藉自然或寻求心灵慰藉以求逃脱，致作品未能全面与及时反映现实或人民的愿望，都是我们必须关心与检讨的。

综观我国的艺术活动，无须借助文字为传达媒介的艺术如美术，舞蹈，音乐，似已有越来越受到重视与越来越普及的倾向，这应该是社会富裕民众重视精神生活的好现象。但须借助文字为媒介的文学，就有越来越受到冷落的趋势。各母语界的写作者基本上是少通声气的特点，使到以母语为写作媒介语者感到知音越来越少的落寞。另一方面，以英语为写作媒介语的人数也不见得激增现象，因而在我们的文学界就出现这么一幅惨淡景象：母语写作者在感叹知音难寻，在担忧大势已去回春乏术，而英语写作界的新苗又不见得如何繁盛，这样便出现一面在悲秋，一面在感叹青黄不接的惆怅了。

各语文写作界的隔阂，若不是寻求认同感的障碍，孤芳自赏或悲愁情怀却是艺术不能正面反映现实的主因，所谓的反映人民的愿

望就更是水中月镜中花，可望而不可即的空中楼阁了。在少有的选择下，以英文为第一语文，母语为第二语文，若是个无可奈何的抉择，我们却至少须关注到此抉择对搞文学者所起的恐惧感。此恐惧感既无法扫除，艺术品在商业社会没受到应有的重视，又给搞艺术者增多一份凄凉感。在受冷落与存有隐忧的双重压力下，艺术工作者势必以艺术作为寻求心灵解脱的工具，而不暇顾及艺术与生俱来的社会功能了。

鼓励宗乡会馆提倡华族文化，多少能对华文写作界起一点刺激，也多少能减轻后继无人的隐忧，可是萧瑟的前景与艺术品不受社会重视的冷落感，依然会使写作者的心胸无法开阔，作品无法反映当前的现实。搞艺术者也是社会的一份子，尤其是他们与生俱来的丰富情感，更使他们容易伤春悲秋，心态若因受现实冷落而出现孤寂状态，那作品就只会流于个人感情的范畴里去了。

综合地说，我们的艺术界若缺乏美学上的认同感，并不仅仅由于艺术工作者没象其他专业一样受到社会尊重，而还在于艺术工作者对母语日渐没落存有隐忧。这两层障碍若不能除去，则我国艺术上的认同感就不再能早日获得，这是个可供大家探讨的课题。

02-04-1986

培养欣赏艺术的群众

瑞典指挥家埃克里森在接受本报访问时说，一个国家的音乐教育不应只培养一批音乐人才，也要培养一群能够欣赏音乐的群众，这话足供我们深思。

我们的民众是很注重子女的教育，正课之外又有补习，补习之外又要子女学钢琴学芭蕾舞或学美术，也不管自己的子女在艺术方面是否有天份，只一味要他们学这学那，目的无非望子成龙望女成凤。

关注子女的前途，怎么说都是好事。但不管时间是否够分配，也不管子女的个性或倾向如何，只知从功利观点迫使子女学艺，就并不见得是好事了。我国学艺的学生并不少，但艺术风气却不盛，最足以说明疲劳轰炸式地迫子女学艺，并非推广艺术之道。

培养大批喜爱音乐或其他艺术的群众，才是推广艺术的正确途径。但培养能欣赏艺术的群众，却不须那么卖力与费心思。大众传播媒介中的电视与广播，若能长期地有计划向学童介绍各种艺术的特征与欣赏的方法，就多少能达到预期的目标。

在各种艺术形式中，似乎以喜爱戏剧与文学的群众较为众多。加上诸如青少年剧展，文艺营等等活动，就使此二门艺术较诸音乐、舞蹈或美术有更广大的知音。日前人协在芳林公园开始主办的跳土风舞活动，反应之热烈也足以说明只要略为策划，各种艺术都有推

广的可能。

蚬壳公司在其大厦内拨出地方，免费让画家展示作品，新加坡交响乐团在公共场所演出，也都是普及艺术的良策。

有了大批喜爱艺术的群众，要从中产生艺术家就不是太难的事。在普及音乐中发掘音乐人才，这或许是埃克里森的谈话的内涵之一吧。

04-04-1986



我国华文文坛当前面对的问题

与五、六十年代文艺蓬勃发展的情况比较，当前的文艺低潮是教人担忧的，此种现状若长久持续下去，新华文艺即使不会烟消云散，那种由于长期陷于低潮而致使新华文艺呈现一大片空白的缺憾，也足教人遗憾的了。现在就开始集思广益，共同讨论出一条继续发展新华文艺的道路，看来是刻不容缓的。

目前已结社的文学团体虽不多，也不能说太少，比较大的缺点是彼此少通声息，这就造成孤军作战，而缺乏互相劝勉并肩共进的局面。各个文学团体在平日里从事本身的活动，这不能说是坏事，至少个别团体的成员能深入探讨一些课题，或潜心钻研一些作品，对文学活动的促进与发展都有所裨益。但各个团体少接触，少共商发展文艺之道，就会使个别团体的努力与愿望无法成为事实。

由于各个团体少联系，没参与团体的个别写作者也各自为政，出现在文坛上的一个特点就是，在理论方面显现群龙无首的局面。我们并非鼓励以任何文艺理论来指导文学，而只是说一套提纲挈领的，强调当前文艺该着重于反映什么事物的指导原则，是非常有必要的。一位研究马华文学的日本学者，很惊讶于我们的华文文学近年来远离现实的作风。旁观者清，这位学者的观察是正确的。缺少有水准的书评，已使我们的写作者无法看到自己的创作局限。

无论怎么说，文学带有社会功能这特质是不分时空地点的。建

国二十多年来的社会风貌有何改变，经济不景时期民众的心态又如何，迁进组屋的民众在调整生活方面遇到什么问题，在建国初期那种风起云涌的反殖反黄热潮又是怎样的，这种种当前的或已成为历史的题材，我们的写作者好象较少触及。与电视剧相比，文学界在这方面的表现就黯然失色了。

另一个偏差是，后起的写作者处于自生自灭状态，没受到先进者的鼓励与提拔。甚至由于版位的局限，使先进者与后起之秀争夺地盘，导致后者更无从显露才华。这种局面若长期发展下去，华文文学就会出现后继无人的危机。

这一两年来个别的有识之士也搞出一两份文学杂志，水准虽不算理想，多少也能推动文学的发展。我们缺乏的是一本具国家级水平的文学月刊，来容纳较高水平的文学创作，并由此领导整个文坛。创办这样的一本刊物的最大困难还是经费问题，但缺乏这类性质的杂志，却就永远无法掀起文艺的高潮。

29-05-1986

探讨华文文学的发展途径

这十多年来教育制度已逐渐趋向统一，英文在学校中的教学时间也远远超过母语的，但事实说明，英文既不可能，也没必要取代母语而成为文化建设的媒介语，在文学领域里尤其如此。多年来母语水平的低落，并没促使本地英文文学蓬勃发展，然而，在华文文坛上呈现的萧杀景象却又教人忧心忡忡。华文文学的凋零景象，若无法以英文文学的鲜花硕果来点缀我国文坛，那我国的历史就会出现一段文学园地相当荒芜的凄凉景象。

从现在开始就检讨并寻找继续发展华文文学的途径，应是很迫切的工作。决定华文文学前途的有两大因素，一是双语政策的贯彻程度，二是处于中流砥柱的中年受华文教育者的热忱问题。双语政策基本上已解决了当年四大源流并存时，受英文源流教育者绝少兼通母语的不良现象，不过，此政策也导致华族子弟说华语现象普遍，然而阅读华文的能力大降的后果。因此，为了更进一步使双语政策收效，研究逐步提高华族子弟的阅读华文的能力，是项应长久持续下去的工作。

提高阅读华文的能力的途径有二，第一是在学校中尽可能增多华文的教学时间，并考虑只以华文教导文史及道德科。这样做，既使学生有更多时间接触华文，也有机会丰富华文词汇，从而也就能解决学生们在阅读上遇到的困难了。另一方面，由于这几年来讲华

语的普及，学生日常生活中运用的词汇也较前丰富了，在几年前规定的中小学生必学的字数，也有检讨与增多的必要。第二是，目前尚处于中年时期的文学爱好者，应该合办一份适合中学生阅读的，包括文史知识在内的综合性杂志。由于学校功课繁重，学生又倾向于偏爱阅读英文杂志或书籍，就使这方面的工作难上加难，然而，这的确是培养大批文学爱好者的唯一途径。

我们不应该把华文文学的兴衰当作只是文学爱好者或是华文报章的责任，这应该也是全体华族国民的重任。华文文学既是国家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只有把它的兴衰提高到与国家存亡荣枯息息相关的水平上，才有办法看到问题的症结所在。否则就会流于互相指责，彼此埋怨的形式上的纷争中去。全国各个既有的文学团体有必要互通声息，互相切磋，互相合作，从而拟出带动华文文学的计划来。但更重要的是长期培养大批文学爱好者以支持文学活动及创作，而这就与教育政策有莫大的关系了。

目前华文文学所具有的，较少触及现实而流于个人抒情的特质，显然也是它发展的一个障碍，但这应该是文学低潮时期特有的现象，当文学呈现蓬勃状态时，这种现象自然会消失。决定华文文学前途的是，语文政策的落实问题与华文教育者的信心问题，当前的华文文学的萧杀景象，说明此二因素尚嫌不足。解铃尚须系铃人，我们只有从这两方面着手，才能挽狂澜于既倒。

01-06-1986

执 着

我有一位很年轻，很沉默寡言的日本学生，她是我的学生中少有的、未完成大专教育的高中生。那天我批阅她的华文造句，才震惊于这位身体娇小，弱不禁风的女学生，有一颗热腾腾的心。

她学华文的目的是，协助从中国归来日本的孤儿解决语言上的问题。

她已在这儿学了一年华文，书写方面不错，会话能力不太好，这是日本学生与其他国籍最大的不同点，后者通常是会话能力不错，但书写能力差。象她这样内向的性格，要是回去日本后不再有机会运用华文，我想她的学习将的白费的。

不过她回去日本后将生活于一群说华语的日本人中，她的生活环境便能弥补她学习外国语的沉默寡言的先天弱点。因为预见到她的前景，那天看到她来办公室购买下学年的华文课本，我就觉得她的努力不会白费。

今年6月1日第11批日本孤儿已回到日本，这群在二次大战中父母双亡或流离失所的孤儿，为数甚众且又在中国生活成长，一回到日本所面对的难题确实不少，其中以语言隔阂最为严重。不少日本青年就为协助这群孤儿解决语言上的难题，而远道出国学习华文。

那天读到《朝日新闻》的森林文化赏，很为日本人那种献身于自己的信念的执着精神所感动。得奖的六名人士，大多是终身为自

己的理想而默默工作者，其中五名年龄高过70岁，最年长者的两名都已85岁，最年轻者为31岁，他自高中毕业后即决心保护蜻蜓，持续不断买荒田让蜻蜓生息。我的这位女学生，也是属于这类人，只是她献身的领域不同罢了。

16-06-1986



文坛并不太沉寂

综观当前新华文坛景况，我们可以相当乐观地说，文坛并不太沉寂，前途还相当光明。市面上有两份纯文艺季刊，此外宗乡会馆联合总会的《源》也容纳了部分文艺稿，本报的《艺苑》自今起也刊载更多文艺作品，尤其在奖励年轻作者方面，会更加以强调。《新明日报》与《晚报》每周也拨出一定版位刊载文艺作品，文艺作者的作品应该不会没有去处。

从年轻作者掌握文字的能力来看，以我手头所有的学院学生的个人集子来判断，他们驾驭文字的灵活程度，并不比六、七十年代的当时年轻作者的差。唯一的遗憾似乎是作者群没有当时的那么庞大，然而华文的普及所有华族学生，却又提供我们可以发掘更多写作人才的更广更大的基盘，因此我们也不用过分悲观。

当前较须解决的似乎是杂志的销路问题，由于学校功课过重，文科又不受重视，要争取学生阅读文艺杂志，已是非常困难的事了。然而这又是非常重要的一项工作，文艺的推广单靠栽培后进显然是不足够的，我们还须有一批热爱阅读文艺的广大读者群才行。目前的另一挑战是，随着中国的开放，文艺杂志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这本身已为本地文艺爱好者提供了多样化的选择，本地文艺杂志要在这么强烈竞争的情况下脱颖而出，实在不是轻而易举的事。

从长远来说，语文政策才是新华文学存亡荣枯的决定性因素。

不过，如何为华文创造社会功能，却也是增强华文生命力的关键所在。本地拍摄的电视连续剧既能协助推广华语与传统价值观，并使华语成为更活的语言，新华文学无疑的也必能担起协助推广华文的重任。因此争取文艺读者，也就成为我们须特别重视的一个课题。

我们很难预料，到底要到何年何日新英文学才能成为本地文学的主流。但在此时此地，很明显的事实是，新华文学在我国文坛上仍然占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凭着这点，我们便应有信心搞文艺杂志。潮州八邑会馆在经费上协助五月诗社与《热带文艺》，是值得我们赞扬的创举。

我们的隐忧不少，但其中的一项应该是故步自封。不同的社会背景，必会产生不同的文风。过于刻板的教条主义文学，在目前可能已不合潮流，因此杂志编者在选稿时或须考虑到年轻读者的品味问题。《赤道风》另辟专栏容纳年轻写作者的作品，是个可行的好办法，至少我们除可由此培养后进外，也可借此窥探年轻作者的文风与特点。

16-08-1986

思想的偏差

语音会随着时代而变，以旧字典的读音为准，而又指陈别人的读音是错误的，并不知道自己的读音已过时，这是用错了字典的缘故。有人一本通书看到老，还按通书的老法子办事，这会到处碰壁，也是理所当然的。

理论是从事物里提炼出来的，但事物本身本就错综复杂，因此在某一时期总结出来的理论，于今很可能已失去其时代意义。再加上此事物与彼事物之间也有千丝万缕的关系，就使我们更难以陈旧的理论来剖析当今的事物了。

语音要修订，理论要修订，个人的思想方式也必须时时修订，这是为了配合客观形势的变化。岿然不动的高山，浩瀚无边的大海，基本上是停滞在那儿的，我们从不同的角度，或在不同的时刻去看它们，尚且可以看出它们不同的风貌与景致。何况天天在变动的事物，天天在演进的社会，我们怎可以一成不变的理论来剖析它们呢？

搞文学创作者的思想若过于偏激，不只会使作品流于僵硬与说教，也会制限创作者的取材角度。许多文学作品在表现手法上既陈旧，在内容上又很狭隘，其实正是创作者死抱旧理论不放的结果。

科学上的定律的错误可通过试验证明出来，人的思想上的偏差可在他的行动与言论上表现出来，但后者的偏差却是见仁见智的问题，对坚持已见者来说，他的墨守成规是遵守原则，别人的改变看法却是走向堕落的开始，个人思想偏差的难以得到纠正原因在此。

18-11-1986

弘扬传统文化是会馆新生的要素

在业缘组织日益取代血缘与地缘组织的现今，宗乡会馆的生存与发展，不只是它们本身的问题，也是整个社会应关注的问题。如果居委会的其中一项任务是，把甘榜的邻里守望相助精神，从横的联系发展到组屋的竖的联系关系，那宗乡会馆的新任务便是把当年照顾同乡或宗亲的精神，发展到照顾全体国民的层面去。

在促使宗乡会馆走向新生的过程中，我们不可忽略的一点是，宗乡会馆的互助精神是有其文化背景作支柱的。因此，宗乡会馆的新生固然与它们本身的自觉性有关，但也与社会的文化风尚有关。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教育政策过分重视西方语文与知识的传授，以致忽略了东方价值观的教导，那诸如专业团体的业缘性组织，必然会以狂风扫落叶的方式取代宗乡会馆。

倘若专业团体发展为压力集团，是社会发展的一种趋势，那宗乡会馆的特色似乎是，它们在许多问题上采取与当局协商的态度的。以我们的社会结构来说，协商精神无疑的是更有利于国家政策的制定与推行。除非有人能证明，压力集团的形成是民主政治发展所不能避免的现象，否则的话，我们就可以说宗乡会馆与当局的协商精神，是政策推行的润滑剂了。

宗乡会馆，或甚至华人社团热心公益事业的精神，在原则上来说是能够继续发扬下去的。其中的关键在于，热心公益的精神不只

应受到表扬，我们且须在实际上协助它们所资助的公益事业成长起来。只要华人社团所热心支持的公益事业，在总的方面来说有利于国家社会的发展，当局都应让这些事业更自由地发展。只有这样，宗乡团体才有可能更积极地发扬其传统的热心公益的精神。

华人是个宗教意识不浓厚的民族，影响华族思想最深远的无疑是儒家思想，而宗乡会馆严格地说也是儒家思想影响下的产物。在没宗教可作为团结媒介物的情况下，宗乡会馆确是华人团结的一大因素。宗乡会馆若消失，至少在形式上来说，那是儒家思想衰微的一种征兆。

有办法把宗乡会馆的协商精神注入专业团体中去吗？这似乎无先例可循。因此，在当前的新旧事物交替时期，促使宗乡会馆扩大其时代使命，至少对国家政策的制定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然而，要使宗乡会馆生存下去，却又不能忽略支撑它们生命力的文化，因此，宗乡会馆要发扬华族文化，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它们求存的必备因素。积极协助它们推广华族文化，就是直接协助它们完成新生的使命。

22-11-1986

体会生活

日本著名诗人芭蕉当年曾背着行囊走遍日本，而写出许许多多感人肺腑的俳句。住在这小岛上，常常给刻板与公式化的生活弄得心灵枯竭，再也写不出较具性灵的作品来了。我有时就想，要是时间与金钱都允许的话，自己应该到大马去走一趟的。

但切切不可走马看花，这会一无所得。我的想法是，与认识的朋友先安排好，由南向北，每一州都小住几天，慢慢观察周遭的生活环境，即使不能因此写出一些较有生活气息的作品来，至少也能扩大自己的生活感受，为自己的思路打开更广阔的境界。

仔细想想，有时倒相当惊讶马华作家反映农村生活之作非常之少，这会不会是农村的教育不普及，而知识分子涌向大都市的后果呢？

有时谈到或看到反映日本农村生活的作品或电视，就很佩服日本作家之深入生活与发掘题材之努力。这类作品的意义倒不一定在揭露城乡生活水平之悬殊，对大自然的生动描写，也是日本文学扩大艺术生命的要径呢。

偏重反映都会的生活，以致忽略了描绘农村的图景，不只会使文学作品出现缺憾，也会令我们逐渐失去领会大自然美的能力。有写作经验的写作人，即使不想弥补上述两大缺点，为使自己的心灵不窒息，也应多到大自然中去体会体会。

24-12-1986

貽笑大方

搞文学的人感情较丰富，遇事爱从感性认识去判断是非，这很容易造成两个不良后果，一是自以为是，二是对客观事物永远缺乏深一层的了解。

许多事物在表面上看来是一个模样，深一层剖析下去，往往又有另一个境界。在收集各有关材料之前，就凭直觉下判断，并以己之非议别人之是，是感性主义者的通病。

摇笔杆者驾驭文字能力又不弱，即使是多么强词夺理，也能自圆其说，而在行文间又可把对方置于死地，这种快感常常令摇笔杆者无法看到问题的全面。

喜爱文学者的形象思维会比逻辑思维发达，但逻辑思维却是决定一篇作品生命力强弱的重要因素。因此，写作人锻炼他的分析能力，不只在提高自己的判断是非的能力，也是在提高作品素质。

中国文学史上不乏作品不错，而政治思想是落后的作家，实在是世间憾事。前车可鉴，当今的搞文学者应可避免重蹈覆辙，但也得有个先决条件，那就是凡事应先调查研究才发言，倘若囿于一见，而又只凭直觉下判断，到头来还是会貽笑大方的。

15-02-1987

有韵味的文章

很久没读到有韵味的文章，最近读了萧村的《和丰恋》，吟味再三，还是不忍放下报纸。作者老练的文字，真挚的感情，高超的写作技巧，把他在和丰的点滴生活感受巧妙地传给读者。

任何耐读的文章的作者，一定是个思想有深度，生活感受又特深的人。有些年轻文友曾听我说过别太强调文以载道的话，以为我反对文学须反映现实。我的意思是，中国文学的文以载道思想根深蒂固，任何学中国文学的人，都会有文以载道的想法，我们不用再去强调这点。

把你从生活中挖掘出来的主题藏在玫瑰花丛里，让鉴赏者在赏花之中看到花丛里藏着的真理，这效果是会更好的。把你的感情，思想、悲欢揉入文字中，象糖融入水中，而不是把主题像彩旗一样高挂起来，那是不会感人的。

缺乏四季的变化，或许会多少削弱我们的文学作品中绚丽的色彩。但萧村的那篇感人的文章，却又说明作者的文字修养、写作技巧，也能弥补单调景物的不足处。不断的进修，不断地探讨人类共同面对的难题，不断地思索，不断地在日常生活中发现诗情画意，这样或许就较能写出感人的文章来了。在《和丰恋》中，我读到老年人的苍凉感，回忆中的青年人的激情，过去生活里的诗意，还有蕴藏于文中的正气。我不能说萧村没在《和丰恋》中载道，但那道是透自一片茶叶的香，而且已融入过往生活片段的水中。

05-09-1987

历史自己写

茹志鹃在《我和柏杨的一段交往》的访谈中，说了一句相当有哲理的话，那就是“其实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写成的。”这句话与西洋人常说的那句“三十岁以后的性格须自己负责”的话实有异曲同工之妙。

任何在生活上或工作上遭受委屈或不合理压制的人，都能由这两句话得到一些慰藉，这绝不是阿Q式的精神胜利法，而是增强战胜敌人信心的因素。

一个超过三十岁，而在性格上又有缺点的成年人，任何人，包括他的父母好友妻子在内，都无法改变他的性格。他若一贯爱颠倒是非，指黑为白，任何人也无法使他觉悟。与这种人周旋，一须有耐性，二须有信心。

我一向是相信人类总是维护先进事物的，尽管人类的发展史弯曲起伏，但总的趋势是前进的，谁也无法否定。任何人的任何行为若是阻碍了人类的进步，他都会受到后人的裁判。阻碍越大，破坏越大，他在历史上的罪过也就越大，有了这种认识，我们才会在受到压制时仍然有信心看横行者的胡作非为，以及他的即将没落。

每个人的历史都是自己写成的，这是一句很含蓄，却又有哲理的话。对扬扬自得者，这句话可能没什么意义，对天下一切受害者来说，这话无异是法律上的一个判例，足以断定横行者的悲惨下场。

08-02-1989

情 怯

情僧苏曼殊落发为僧后，有一年在日本邂逅了一位少女，对方对他情有独钟，他却慧剑斩情丝，写出这么两句诗：‘赠卿一钵相思泪，恨不相逢未剃时’。绝是够绝的，但有情人却也看得出他的多情与无奈。

爱国诗人陆游老来重游沈园，睹物思情，竟也怀念起前妻而吟出‘伤心桥下春波绿，曾是惊鸿照影来’的名句。一个垂垂老矣，且胸怀大志，临终还吟出‘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的英雄，免不掉的竟也是情。

任何不是虚度光阴的人，在他记忆的匣子里，总有一些隐痛与懊恨。岁月悄悄流逝，故情逐渐沉淀，看来就将从此沉底了。偶而有人那么向你一搅动，记忆又再浮现了。这一浮现，既有美好的回忆，也有辛酸的折磨。要是按捺不住，最好往前看，做些利人利己的事。

总有那么一天，当回忆不再会惊动旁人时，我们就可以悄悄掀开回忆的匣子，鉴赏那一段已带有古色古香的记忆。

至诚的感情永远都教人感动，给予或接受都无所谓。要紧的是在有生之年，我们做了些什么？尘封的往事，在午夜人静时，就会象退潮的河床一样起伏不定，历历在目。如果这会阻碍你前进，那是你还没看透人生。

或许有人会看不起苏曼殊与陆游，我却认为他们都是至真至情者，他们只有一种病，那就是情怯。

09-02-1989

与外国作家比较

英培安最近对本地华文文坛的一些评语，恐怕会引起一些人的不快。他说许多老作家，甚至是中年作家，除了徒具虚名外，其实是早已拿不出什么象样的作品来，而他却要求自己把眼光放远，把自己和外国有成就的作家比较。他这样一比，才知道自己很差劲。

我们姑且不去探究有点小成就的作家，为何会陷于再也拿不出好作品的困境中去？但把自己与外国名作家比较，却肯定是有豪情，有进取精神的表现。

一个学者或作家，如果整天只在借攻讦别人的不是，以抬高自己的地位，那是很悲哀的。这样做，小则使自己眼光如豆，心胸狭隘，既不能容纳别人与自己不同的意见，也不能欣赏别人的新颖见解。大则使学术界与文坛充满火药味，大家日日忙于反击对方，而不专心于探讨真理与进行创作。很不幸的，在华文文教界中，这样的现象始终没消除掉。

这现象的产生，除了岛国国民心胸较狭隘的因素外，也与受华文教育者因境遇较不顺而变得愤世嫉俗有关。不管是什么因素造成此现象的产生，我们若不能铲除它，那我们的文化就永远无法蓬勃发展起来。

文教界的知名人士，若要在困境中杀出一条生路，是得把眼光放远一点，把自己的成就与外国知名人士的比较，从比较中认识自己的不足，并寻找改进之道，这才会有所作为。倘若不如此做，而只一味攻讦别人，那迟早是会沦为一名乡愿的。

26-02-1989

突破不易为

返璞归真，无论是在人生境界或艺术境界都是极难达致的。人到无求品自高，这样的境界知易行难。在朴素中见风采，这样的艺术境界也最难达到。由《梦画录》到《还乡杂记》，有些评论家说这是诗人散文家何其芳反璞归真的成就，我却不以为然。作为一个突出的散文家，何其芳感人至深的还是早期的刻意琢磨的文字，而不是晚年的作品。

我不是因此说搞艺术者无须要求突破，而只是强调突破的不易为。任何突破如果不能兼有原先的特点，那就不是真正的突破。一个写作者由模仿别人到树立了自己的风格，这已是历尽千辛万苦的过程，任何人都珍惜从此过程中得来的成就。只是风格往往是自己最方便的表现形式，久用成自然，人又有惰性，风格便易成为艺术家自我窒息的因素。因此，要求突破便是自我新生的唯一道路。

不过，突破并不是与过去决裂，突破是在带有原有特色的基础上加入新的因素的表现，这点与吸取古典文学营养以丰富现代文学表现手法有点相似。如果只一味崇拜古代诗人作家，那是不太难的，但你的文学生命就只限于绑手绑脚的模拟；然而要是全然不读古典文学，你的要求突破却又会缺乏依据。任何搞艺术的人的要求突破，他的头痛处也正在于怎样在保留自己原有的优点的同时，再融入自己的新的特色。

12-03-1989

感 悟 力

越来越能体会到文学作品的优劣，与作者对生活感悟力的强弱有关系的道理。对有一定写作经验的作者来说，妥当地处理题材，斟酌地遣词造句，有变化的起承转合，早已不是可难倒他的问题。那为什么一些拥有十多二十年写作经验的作者，还往往会写出教人不忍卒读的文章呢？

我看关键就在于他对生活缺乏深一层的感悟。所谓的感悟，并不与积极等同。他可以是李白的潇洒，杜甫的执着，或王维的逍遥，甚至是白居易晚年的闲适。总之，作者对生活的真正感悟力的强弱才是决定作品好坏的因素，作者对生活所持的态度，并不是决定他的作品成败的主因。

感悟力的获得，除作者得关心社会，观察周围的生活现象外，还得时时阅读具现代知识的书籍。拟古而不化的作者，不只作品缺乏创造性，还会陷于写作题材枯竭的困境。一味沉迷于自我塑造的意境中，对现实人生就缺少深刻的认识，这样的作者写出来的作品不只不切现实，且又会有江郎才尽之叹。

感悟力既须才学，也要分析力。个人的禀赋与才情，固然对感悟力有所影响，更重要的是个人主动的去思考周遭的一切生活现象。个性若是决定作品风格的重要因素，感悟力却是决定作品生命力的因子。拥有丰富写作经验的作者，若有无法突破自己的困恼，大半原因是感悟力没增进的结果。

26-03-1989

突破苍凉 体味生活

华文文坛要生机蓬勃，写作人必须主动突破自己规律化的生活。

随手列来，日本当代诗人约可分为超现实主义，现代主义、语言至上主义，爱国的现实主义、未来主义、象征主义、民族主义等等。各派都有其定期诗刊出版，即使是属于同人性质的诗刊，也有一定的读者群。因此日本诗歌的各派别诗人，都可埋头创作，各显才华。我们的文坛却是狭小的，没有一个流派有足够的财力人力创办刊物，那文艺副刊刊载各流派作品就不只合理，且是让各流派作者有机会互相观摩的做法。但就因为大家挤在一起亮相，偶而瞪瞪眼，骂骂架，也就在所难免。我们的文坛就象我们的社会一样，土地小，种族多，文化背景复杂，大家得互相容忍。

华文文坛近年来看不到较突出的作品，这原因众多，因素复杂。语文水准低落、有才华者向理工科发展、受华文教育者心态苍凉、写作人生活面狭窄，等等等等，都是其中的一些原因。

受华文教育的知识分子，上流社会少有人打得进去，低层民众的生活他们又缺乏亲身的感受，文教工作的社会关系较单纯，工作回家，回家工作，组屋家门户紧闭，工作刻板，生活规律化，这样的知识分子若只哀唱自身的情怀，那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不是说我们的社会不存在问题，各种各样的报告书所提示的社会问题，足教我们的写作人因毫无觉察且没在作品有所反映而汗颜。

我们能过分责怪他们吗？一方面，他们在社会上遭受某种程度的冷遇，另一方面，他们又较低层民众有安定的生活，这两种“殊遇”使他们上不了天，也下不了地，因而讴歌的对象也就只有“半天吊”的逍遥乐。

华文文坛要有蓬勃生机，看来与写作人的主动突破自己的规律化的生活息息相关。但要这样做，写作人首先得抛弃既有的逍遥乐，其次得抓紧使命感，这两点都不容易做到，我们似乎也只有期待着而已。更直接的方法是鼓励生活在较低层的有能力的写作者，把他们本身及周遭的生活现象反映出来，借此增添华文文坛的色彩。

表现技巧并非不重要，可与内容比较，后者显然更是当前华文文坛贫血的因素。阅读永远是提高写作技巧的一个途径，古典文学自然应涉猎，但外国文学显然更有可资借鉴的写作技巧在。可当前较重要的还是部分写作人应主动突破苍凉心态，并主动去体味较低层民众的生活滋味。

30-03-1989



自然美

旅居日本期间，有段时期我每周有三晚得到某大学院听课。工作之后再去听课，精神是相当疲乏的，可听那位年龄与我相仿佛的德国籍讲师的课，心情就特别愉快。

他讲课不备稿，随兴而谈，趣味盎然，学生可记可不记笔记。他边抽烟边讲课，学生也可边抽烟边听课。下课后，有时他竟然邀约学生一起去吃夜宵喝啤酒。

我听了他两年的课，学问不敢说有所长进，但他的举止言行，生活方式，对在那时已相当定型的我却甚有影响，以至于今。他给我印象最深的一句话是：人不能脱离大自然而生活。学校一放假，他一定跑去日本的名山度假。开学就大谈游山心得，并怀念起德国小镇的美丽自然风景来。

他教我们民族主义学，可他身上带着的诗人气质，却很教我心折。我从他身上看出，他的博学与机智来自泛览群书，而他的优雅举止与清秀外表，却与长期观赏大自然有关。

我由他的那一句话深思的结果是，大自然是人类取之不尽的财富，一个人若能摄取大自然的美，精神生活自会丰富，举止自然高尚。若再进一步把大自然美提炼为艺术的原料，那艺术美将更为丰厚。

当然，把大自然美融为艺术原料的手法是多种多样的，值得所有从事艺术工作者去探讨。舍此路不走，而拐进荒诞鬼怪的死胡同，那是自寻短见，香港电影就在这样一步一步走向死谷，足供我们引以为戒。

02-04-1989

文化交流也要认清方向

由于中国的开放，新中的文化交流这几年来也特别频繁，中国各地的出版社竞相出版本地写作人的各体裁文集，写作人的互相访问蔚为风气，基本上这都是新中文坛上可喜的现象。间中也许会出现这样那样的缺点，但这不应成为大家不再来往的理由。

出现偏差的其中一个最主要原因是，中国一般写作人对新华文学的历史与现状都不甚了了，缺乏了解而又要作评论，那评论流于片面肤浅，或甚至乖离事实，就都不足为怪。但问题的严重性不在于评论出偏差，而在于我们过于相信别人的评论很有权威性，这种文坛上属国与天朝观念的作祟，不只会使我们对自己失去信心，也会教我们迷失自己应走的方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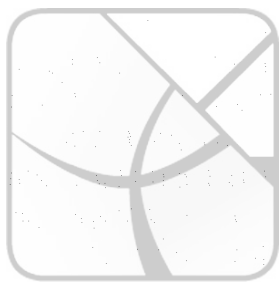
文坛属国的小民心态，使得我们一有作品就非要得到天朝高明人士的肯定，即不敢自我肯定它的文学价值。此不健康心态若不赶紧纠正过来，交流越频繁，我们的自信心就越脆弱。

纠正属国小民的不健康心理的途径有二，一是建立起我们自身的权威的评论水准，二是创造出具世界水平的作品来。这样的期望，自然不容易实现，可也不用过份自悲。我们的社会相当开放，各种各样的文学作品都有机会看到，文学理论书也不例外。只要大家努力钻研，不断进修，提高认识，练好写作技巧，兼容并纳各国文学作品的突出表现技巧，吸收各国较先进的文学理论，我们应可发挥

我们本身的长处。

交流是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来共同探讨问题而不是只低声下气听别人的高论，与别人比较，在心理上我们会矮了一截，那是有其历史根源的。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扬弃比别人矮一截的心理，这样才可闯出一条康庄大道来。否则在语文水准低落的困境下，若又陷入依附别人的死路，那新华文学就会继续萎缩下去。

05-04-1989



灵魂有污点

总认为写作者的人格与文章格调的高下息息相关。人格卑下，情操下流，喜欢搞小动作，在背后爱放暗箭的人，即使权势多大，如何呼风唤雨，由于他的所作所为，所思所想，都只是在害人利己，他根本就无余暇剖析生活，思考人生，构思作品，因此他的作品纵使在文字上还算通顺，内容也必然无足观处。阮大铖的《燕子笺》尽管文彩不错，他人格的低贱，却使其作品遭人遗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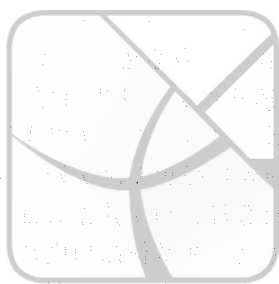
这并非因人格而废文，文学作品到底是一个人的品格与情感的总体现，文学既有美化、丰富人生的作用，也有促进人类进步的作用，品格卑鄙者的作品正好缺乏后一作用。秦桧尽管在考场上文字功夫不错，文学史上并不录其姓名，他即使有作品面世，也没人会广为宣传。岳飞与文天祥流传的作品并不多，而史上留芳名，绝大部分原因是其人格高尚，感人至深。

我甚至认为一个写作人平日的业余爱好都会影响其作品的素质，我不反对听有小调风情的流行歌曲，这至少可激起写作人的情思，但我认为一个写作人若不能同时也欣赏艺术歌曲，古典音乐，正统音乐，那他的情思就难免要停留在凡夫俗子的阶段。

杰出的作家是既拥有常人的情感，也具备爱国者高尚的情操，过分强调后者，作家势必成为圣贤，陷于述而不作的困境；过分注重前者，则又会沦为张恨水或琼瑶的下场，在大时代看不到真正的社会

面貌。但即使张恨水或琼瑶，也比人格卑下的所谓写作人强得多，理由是，局限性并不是罪过，但人格卑下却是灵魂的污点，灵魂有污点就不可做人类灵魂的工程师。

23-04-1989



文坛的不健康现象

形象思维与逻辑思维表面上看来是对立的，深究下去，我们可以说每个人都兼具此二种能力。缺乏形象思维，而只有逻辑思维的论说文，会是干巴巴的乏味文字；缺乏逻辑思维而只有形象思维的抒情文，会是滥情的低情操之作。前者可以老学究的劝世文为代表，后者则可以时下流行的言情小说为典型。

一部文学史说明，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作家，毫无例外地都是感时忧国，怀抱理想的才俊之士。他们的放浪形骸，都是在本身的理想无法实现之后，所采取的自我解脱的一种方式。他们对当时的现实事物这是了若指掌，而不是胡里胡涂的。正因为他们看到时弊所在，并曾对时弊进行过逻辑思考，而又苦于无法参与改革时弊的工作，在悲伤之余，才以形象思维来表达他们对时弊的看法，因而他们的文学作品也就特别具有时代意义与永存的价值。

因此，我们似乎可以这么断言，只描写社会现象，而没对那些现象进行过逻辑思考的作品，不管它们是诗歌、散文、小说，不管它们的写作技巧多高超，它们都经不起岁月的考验，中国文学史上的汉赋、宫体诗的命运，足以说明这道理。

任何艺术都有高低层次之分，没思想深度的画家只能沦为画匠，没高尚灵魂的音乐工作者只能是乐匠，没分析能力的写作人只能是写书匠。不过，这么说，并不是在否定艺术技巧的重要性。“二拍”

“三言”的不能广受欢迎，就在于写作技巧不够高超，这可佐证，尽管作者有多好的写作动机，一缺乏好的写作技巧，他们的作品也就会缺乏感染力。

中年以上的一些本地写作人，由于受到他们时代思潮的洗礼，一般上都较能着重分析一切社会现象，可是与此同时，也似乎较受到一些思想框框的束缚，致在有意无意之间忽略了不断提高写作技巧的重要性。年轻的一些写作人，在政治思潮呈现真空状态的情况下，又似乎较忽略了剖析现象的重要性，而偏重在技巧上求突破，这会不会是我们的文坛的不健康现象呢？

27-04-1989



提高演出水平也重要

每回观赏文娱表演，若看到绝大部分观众都是年轻人，除了感到高兴外，下意识里也有股凄凉感。岁月的更替，生活遭遇的折磨，使许多中年人都抛弃了他们年轻时的嗜好了。这原是自然而然的事，但我总会兴起与我有大致相似生活经历者都远我而去的孤单感，这种孤单感往往教我觉得在演出场所有点手足失措。

看多几次演出，我竟又发觉中年观众的减少并不一定是他们都改变了嗜好，演出水平的长久以来一直停滞不前，确实也是教欣赏力较高的中年观众却步不前的原因。

年轻观众吸引来了，中年观众掉头去了，这是非常不健康的现象，因为水准不高的演出，只能暂时获得年轻人热情的支持，待他们一成长起来，欣赏能力一提高，这些观众就又会抛弃他们一向观看的文娱形式。

最近去看艺术剧场呈献的《我们说相声》，就有类似的经验。许多年轻观众发出的笑声，听来是真诚的，可我发觉稍有年纪的观众却甚少发笑，其中原因不在于一些表演水平不高。水准太低的演出不只教人看了不感动，还会吓跑一些潜在观众，使他们误以为那种文娱形式就是那么的枯燥与无味。观看诸如广东潮剧演出的《青蛇传》，即使平日对地方戏剧多么无知的观众，也有可能成为戏迷的。提高本身所从事的文娱表演的水准，看来并不会比到处去拉观众不重要。

14-05-1989

陶醉在框框中

新陈代谢，长江后浪推前浪，这都是老生常谈的道理。可最近与一批年轻人的随意谈，却使人深深领会到在艺术范畴中，新陈代谢，后来者居上的现象尤为明显的道理。

即使年轻一辈曾都是你的学生，只要你把你对于某一门艺术的个人体会与心得传授给他们，在过一段短时期后，他们对该门艺术的认识就不会比你浅。再加上他们比你年轻了一二十岁，他们对人生有他们独特的感受，也比你对周围的事物更为敏感，很快的他们就会发觉你的作品中的弱点与不足处。尽管他们由于对该门艺术的技巧掌握得还不够熟练，因此还无法创造出特别好的作品来，但只要他们继续努力，总有一天他们一定会超越你的。

以写作来说，写作者在累积了一二十年的写作经验后，他的问题并不是怎样取材，怎样谋篇布局，而是怎样突破自己。突破的也不仅仅是自己的表现技巧，还有自己的生活范围。这都是很要命的工作，突破既不是与现在的我决裂，却又一定要有新的因子加进来，突破即不一定要你彻底抛弃当前的生活方式，却一定要你有较新的生活体验。

许多人写作数十年，还始终在原地踏步，年轻人早已抛弃了他，与他同时代的写作者也为他扼腕惋惜，他却还在那儿锲而不舍老调重弹。时代时时在变，人们的口味不时在改，搞艺术的人固然不必媚俗，但若一直陶醉在自造的框框中，那他的艺术生命虽在表面上还在持续，其实早已没了光彩。

28-05-1989

息交绝游

李敖说中年以后最该过的是息交绝游的生活，这样做才可集中时间，大量工作，而工作成绩才是检验人生的唯一标准。因为要在一些场合讲点古典文学，最近在业余之暇总翻阅古代作家的生平事迹，对李敖的这句话有了深一层的理解。

人生的境遇并非一帆风顺，古今中外都一样。苏东坡一生就在新旧党之争中浮浮沉沉，李清照的丈夫赵明诚也因党争而到处飘泊，王维、李白、杜甫的个人遭遇，多少也与当时朝廷高官的勾心斗角有关。这些诗人词人学者之所以名垂千古，就因为他们有作品留下来，而陷害他们的那批小人，至今已退为舞台之后了。他们的名字在今人的文章中被提及，除遭受写评论文章者的责骂外，就是为衬托有正义感的作家的崇高形象而出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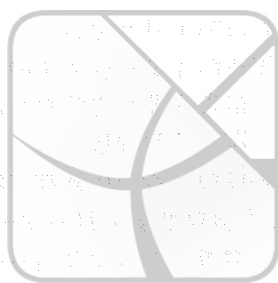
我不是引这些例子来削弱有正义感的人士的斗志，我只是深深地感受到一些人事纷争的无谓。对于有理想，寄情艺术创作的正义之士，尤其应该把人事纷争看淡。看淡人事纷争并不是摒弃是非观念，而是在坚守个人原则的同时，把个人的得失置之度外。从人类历史发展的观点来看，任何正确的事物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中都有可能被歪曲，只有后人才会还正义一个公道。然而，即使在生活遭受多么重大打击的人，只要他曾为人间留下一些东西，他就永垂不朽。工作成绩才是检验人生的唯一标准，我由古代作家的遭遇得到新的

诠释。

息交绝游或许是过于愤世嫉俗的行为，但过分介入人事纷争却肯定做不好自己份内的工作。搞艺术者应该认识到本身所从事的工作，就是检验他一生功过的标准，而对向他进行小动作的周遭小人视而不见。

息交绝游

31-05-1989



把他们动员起来

看了金狮奖小说创作比赛的作品后，很为新华文坛的藏龙卧虎而开怀，看到的小说所反映的生活面之广，真的可说已到了可让读者洞察整个社会风貌的地步。都市人的营营苟苟，商人间的勾心斗角，知识青年探索人生的努力，男女之间情欲与理智的斗争，小说中涉及的生活面之广，真是新华文坛罕见的现象。一些作者在文字上运用的不够熟练，固然是件憾事，但他们编写生动故事的潜能，却让我们看到我们其实还有许多有写作才能，而尚未崭露头角的业余作家呢。

怎样把这批有潜质的年轻人动员起来写作，这不单单是文艺编辑的责任，也是所有关心新华文学前途的人的责任。发动他们成为文艺队伍的正规军，不只是为加强文艺的阵容，更是为了丰富文艺园地的色彩。这批写作者所反映的生活面，是我们在报刊文艺版或文艺杂志上所绝少看到的。

我同意题材不分大小，都可写成作品。可是每个人的生活都有其局限性，出身文教界的写作人若要描写商场或其他领域的人物形象，那将是事倍功半的。最理想的做法是让出身各个领域的写作人描写他们周围的人物与故事，此届的金狮奖所收到的作品说明了这期望并非妄想。

我们都以为华文在没落了，如果此届金狮奖的入选作品的作者

写的故事都是他们周边的人事，那我们却可以说各个行业都有掌握了一定的华文写作能力的作者，这是华文文学发展的一个重要条件。为了丰富繁荣文艺花园，为了加重我们的历史份量，为了探索我们的前进方向，我们有必要把这批少动笔，但却有才华的写作人组织起来。

11-06-1989



殉 艺

士为知己者死，我以为是一种很美的传统。这就如纯情者的殉情，纯教徒的殉教一样可歌可泣。其伟大处在于为知己者死的人，并不是不知道这一死损失惨重，而在于他认识到损其个人利益，可为公众事业作出一定贡献。

殉艺的情操也与为知己者死一样高尚。我是一向反对单单只闭门研艺的，这样做会把你自己弄得呆头呆脑，不知人间为何物。可是整日往外跑，正业不干，只营营苟苟，到头来就会成为学艺不精，空有虚名的庸俗主义者。搞艺术的人，应该为自己营造一个小千世界，窝居其中，上穷碧落下黄泉，东西南北走一趟，把自己所从事的艺术领域探索个究竟。与此同时，他也应该不时走出小千世界，到大千世界走走看看，感受感受大千世界的纷纷扰扰。

搞艺术的人从自己营造的小千世界所得到的快感与满足感，并由此为人间提供美的精神食粮，就足可教艺术家不顾大千世界曾给他予什么打击。艺术家从小千世界的窗子看大千世界，大千世界的营营钻钻都只是过眼云烟，只有艺术家以过眼云烟的一小节为创作素材的艺术品，才是永恒的。

搞艺术者自然不是不食人间烟火，可他却不应过于耿耿于个人得失，否则身为形役，患得患失，对艺术的品味格调降低了，情操卑下了，创造出来的艺术品的境界也就不高了。搞艺术者既以艺术为知己，就应有为知己者死的殉艺精神，这点对写作人来说也一样重要。

14-06-1989

多读几年书

常常读到一些故作潇洒状的文章，很是反胃。文章风格是作者整个人格与心智的总表现，作者若是头脑思路胡里胡涂，胸无点墨的，而又要故作潇洒状，把句子弄得似通非通，那真比东施效颦还教人难受。

每个人的才情禀赋个性都不同，这种先天性的不同，是写作人文章风格形成的基本因素。不过，单单只有这些因素，并无法铸造作家的文章风格。一个作家的文章风格，还与他的家教学养，个人修持，思想认识，以及对文学的造诣息息相关。

有人饱读古今中外作品，结果只会掉书袋，成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书橱，那是才气所限，怨人不得。可是我们却不可因此否定浸淫文学作品的重要性。对悟性高的人来说，他必然会从阅读名家作品中吸收到写作、为人、处世的种种学问。没有郁达夫的才情与旧学根底，而要做风流才子状，只有教人作呕。没有鲁迅学问的精深博大，见解的深入透彻，而想模拟他写杂文，结果也只会流于漫骂。

写作人若会在作品中流露出自己的浅薄，在生活上也同样也会表现得粗俗与没深度。行为的缺乏深度，可以表现在突出自己比拥护真理更加重要这点上，也可以表现在自己对文学作品的无知识与没见解的谈吐上。

我欣赏谈笑自若，口若悬河，满腹经纶的写作人，我也喜爱学

富五车，木讷诚恳，不善言辞的作家。我最讨厌的是信口开河，不学无术，自以为是的自封是作家的作家。我在文章上看到这样的人，我在现实中遇到这样的人，我想我们若要与外国作家交流，这样的人应该先躲进小楼或图书馆多读几年书，免得给外国作家对我们产生这么一个印象：新加坡的作家真粗俗肤浅。

28-06-1989



奇特的鲜花

阅读古典文学，往往会发觉文以载道确是中国文学的传统。文学与现实紧紧挂勾，文学深入地反映生活，这怎么说都是好事。可是深一层去探究，就也会发现，若文学不能跳出文以载道的框框，中国文学就有它的很大的局限性。

中华文化渊远流长，任何人学习中华文化的任何一个学科，都有无数个案可资参考，这是它的长处。反过来看，中华文化的每个领域都受到特定的圈圈所限制，如不能跳出这些圈圈，就只能在圈圈内兜圈子。中医的陷入阴阳五行之圈，中乐的曾受到宫商角徵羽的五音的束缚，犹如中国文学受到文以载道的局限一样，都得靠我们把它们拉出圈圈外，方有可能开创出新天地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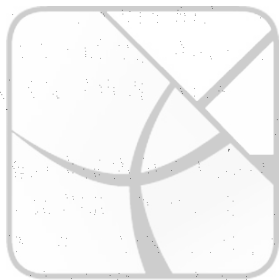
朱晖最近在指挥《黄河大合唱》演出前曾说，冼星海此曲的旋律结构有些地方不如西洋音乐的严密，因此得靠指挥的注入感情来表现作曲者的感情内涵；李欧梵近日也说，中国的现代文学的危机是作家受到感时忧国意识的左右，即可以载道思想的影响。我相信朱、李所说的话是很有见解的，他们确实看到中国音乐与文学的弱点。

要是我们泛览过中国历代的主要文学作品，我们就可以大胆地说，同样的文体，后代的一定比前代的多姿多彩，而且不少有才气的作家，竟然也敢跳出文以载道的圈圈，把文学当作抒发个人情怀

的工具。

我不知道华乐应该怎样丰富其旋律，但我认为中国的引进小提琴、钢琴，并创造《梁祝小提琴协奏曲》、《黄鹤的故事》、《海韵》等等抒情曲，是中乐发展的一大突破。我因此相信，华文文学也应该借助外国文学的养料，从文以载道圈圈中冲出去，这才有可能另辟蹊径，培养出奇特的鲜花来。

05-07-1989



文艺评论

每回收到曾见过面或非常熟络的朋友的赠书，内心总会百感交集，我是真想拨出一段时间细细阅读朋友的大作，再腾出一点时间写篇书评之类的文字的。每回都无法如愿以偿，忙是一个原因；要读的书太多了，是另外一个原因；报章的文艺版不常刊登评论文字，更是一个决定性的原因。

比起古代文人来，现代文人可说是幸运多了。古代并无所谓的报章或刊物可刊载作品，文人写了一篇作品，多寄给好友欣赏；生前能有财力自资出版作品集的，少之又少。象白居易那样悉心保存自己作品的，是例外中的例外。柳宗元全集，还是靠宋人的多方搜集，才略具全豹；李清照留给我们的词，竟然只有三、四十首；号称南宋四大家之一的尤袤，绝大部分诗作已散失；比较起来，现代文人至少还可申请基金出版选集，聊可自慰。

书出版了，销路如何，无人过问。作品素质的高低，也没人扬抑。作者感到寂寞，读者也无从知所选购新书。更糟的可能后果是，整个文坛失去理论指引。真羡慕日本有一份半周刊《读书》这样的报章，中国的《书林》也不错。总之，单单只有新书出版消息，对文学发展的促进作用还很不够，或许文艺版也应拨出一点版位来刊登评论文字。有了固定的评论专栏，相信就会有人埋头钻研文学理论与撰写文学评论，这么一来，文学的发展趋向也较有脉络可寻。

16-07-1989

征服‘自然’

一名曾在日本驻任十多年的葡萄牙大使,在其《东西文化比较》一书中,论述及东西文化之差别的基本点是,东方人看到自然山水往往与之合而为一,而西方人见到山水却想征服它们。发之为文化,便是东方文化富有浓厚人情味,而西方文化却具有科学性了。

中国文化的特点之一是注重人的问题的思索,而不语神力鬼怪,这特点发展的结果便是哲学思想发达,而科学却落后。表现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上,就是人事斗争特别复杂,而社会制度一塌糊涂。

深究下去,我想我们甚至可以说与自然合一的思想,正是东方社会人事斗争特别剧烈的根源。这种不以大自然为征服对象的思想,表现在各个领域,就会形成各领域人才着重彼此之间的斗争,而忘了把实际工作做好才是正务的现象。具体到艺术界,尤其是文学界,就会出现只准独沽一味,不许另作他想的现象。换句话说,政治上的专制作风,也泛滥到文学艺术界去了。

扩大来说,该名葡萄牙学者所说的“自然”,具体到搞政治的便是治好国家,搞艺术的便是钻研艺术,搞文学的便是多创作,舍此“自然”而去搞人事斗争,就只有走入死胡同。以华文为创作媒介语的文学工作者,若没认识到这点,就也有可能陷入人事纷争的陷阱,而不能搞好自己的创作。

19-07-1989

风格比内容重要

最近购买了一册《何其芳作品欣赏》，在读完《何其芳和他的创作》这篇可说是总结何其芳文学成就与缺点的文章后，掩卷之余，很为他后期创作的没沿着前期路线走下去，而致丧失了自我的风格而惋惜。他曾说：“只讲求艺术的完美和不讲求‘艺术’的完美，都是不行的。”，教人感慨的是，他前期的作品是只讲求艺术的完美，而后期创作却不讲求艺术的完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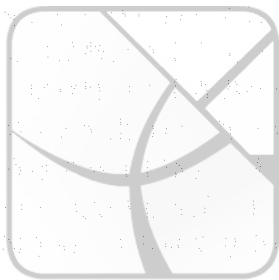
何其芳创作前后期都各有偏差，使我悟到作家一定要忠实于自己的生活经验的道理。而且，比较起来，文学的艺术性是更重要于内容的。何其芳早期的诗歌或散文，内容大多是描写他心灵所“体察”或“思索”的事物，显得轻灵，有很浓厚的冥想色彩。然而文字优美，意境深远，是别树一格的“何其芳体”。后期作品，虽然较有生活气息，但好些文章偏于说理，流于平铺直叙，全然没有韵致。

写作人自然应该主动力求在生活面上有所突破，生活面一广阔，而又有真正的感悟，再加上在表现技巧上有所创新，那他必然会在新的艺术高峰上有突出的表现。如果他没法子突破原有的生活圈子，或者偶而有机会到新的生活场所体味体味生活滋味，可是却没真正的感悟，那我认为他最好还是写他最熟悉的题材，另一方面则应在表现技巧上力求突破。

李清照尽管后期的词比起前期的在内容上有所扩大，但若与苏东坡的作品内容一比，在生活深度方面就要逊一筹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李清照的生活内容不如苏东坡的广且阔。可是李词却可与苏词并存不朽，原因在于他们各有其艺术成就与风格。

艺术性是作家一定要保留的特点，生活内容虽要力求广阔，却不可强求，若强不知以为知，在文学作品中就会出现幼稚与粗糙的毛病。

23-07-1989



可开拓的美土

我们的社会还存在着少数相当窘困的人家，但记忆里似乎从七十年代末以来，我们的华文文学在反映低层民众生活面就变得很少很少了。贫穷家庭委员会报告书与电视特制节目，相当具体让我们看到这些极个别的贫穷人家怎样在生活线上挣扎。

贫穷人家的为数不多，与都市化结果残存的自然的稀少，都一样没受到人们应有的关注，而这正好说明一般暴发户不只精神生活空虚，日日追求丰富物质享受的结果，连关怀别人的恻隐之心也消磨殆尽了。

写作人如果能从残存的自然发掘山水之美，并创造出一些感人的作品来，那新华文学就有新蹊径可走。同样的，在基本上是富裕的社会，写作人若能关注少数贫穷者的困境，并具体而生动地描绘他们的生活面貌，对新华文学的多彩性与丰富性也必然有所贡献。

生活的充裕，使能执笔为文的人较有机会远游，游记文学的兴起，是近十年新华文学的特色。一部中国文学史说明，缺乏个人体验、感受的游记，很难感人，更遑论流传下去。写作人若是游的是外国山玩的是外国水，那要写出感人的游记，就更难上加难了。

感人的文学作品一定是作家深深扎根乡土，悲天悯人地关怀人类前途，并苦苦思索人类出路的呕心沥血之作。因此同样是游记，柳宗元的永州八记，明朝公安派竟陵派的小品，肯定比《水经注》

更有文学价值，原因就在于，前者在游记中掺进更多关心时代的色彩。

贫穷人家的生活面貌，堪称为新华文学八十年代被人忽略的残存社会现象，它与残存的自然一样，都是我们可深入开拓的美土。

03-08-1989



自我形象

在流览古典文学的过程中，最感到有心得的一点是，突出的古代诗人词人作家，都有很鲜明的自我形象。李白、杜甫、王维、白居易、柳永、苏轼、李清照、陆游，无一不是如此。我由此感悟：文学作品是作家总人格的体现，而不是历史面貌的浮现。

任何作家如果不忠实于自己的才情、品格、性情、学识，不赤裸裸把自己心中所想、所思、所期待的感情，毫不掩饰地表现出来，而好高骛远，虚张声势，为宣扬某一种思想而故作先进姿态，那他的作品就会流于空泛、虚假、失真与不感人。

作家的出身、经历、学养、人生观，是影响他写作内容的决定性因素，不过，写作内容并不一定是作品能不能留传下来的要素，决定作品朽与不朽的，是作品中所流露的感情有没有代表性。

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作家，由于个人经历、学养、人生观的不同，他们的作品内容可以迥异，只要他们的感情真，能体现出人类共有的思想感情，并有鲜明的独特风格，他们的作品就有永存的价值。

我不是因此说生活在大时代的作家不可以写惊心动魄的内容的作品，而只是强调写作人应有自知之明，忠于自己的感情，写自己最有感悟，最熟悉的事物，这样才会在作品中显现鲜明的自我形象，而使自己的作品有别于别人的，并由此达到以作品感人的目的，从而使作品永远感人。

06-08-1989

宋之素下得太多了

李欧梵说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大危机是由狭义的社会性和爱国思想，以及创作上写实主义的传统造成的。我认为这样的观察是提纲挈领，发人深思的。中国现代文学所描写的内容多为悲惨的人生，这决定于中国近代史的一塌糊涂，不但不足为怪，反而是正常得很。在民族存亡生死之际，鲁迅写《阿Q正传》、《祥林嫂》，写具战斗性的杂文，是深具意义的。倒是张恨水写诸如《啼笑姻缘》的鸳鸯蝴蝶派小说，才教人感到纳罕。

我想文学须反映现实应该永远是正确的，《家》、《春》、《秋》的艺术感染力不如《红楼梦》强烈，可说是与作者才力学力有关。而生活在同一时期的作家，在其作品中所反映的生活面却也往往会有所不同，李白与王维同年生，王维也只比李白早死一年，可他们两人的诗作内容与风格却迥然不同，可见作家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可影响其取材态度及风格的形成。

中国文学的发展在历史上曾遭受到好几次劫难，先是文以载道学说的侵入，再是理学的渗透进宋诗，还有八股文臭味的掺进散文，以及清代文字狱的戕杀作家的创作力，以至于现代政治挂帅口号的抹杀文学的独立性。这些劫难使得中国文学在先天上都有这样或那样的弱点，其中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文学有改造社会的力量的说法。

文学作品不用说自有移风易俗的力量，可过分强调这点却会使

文学丧失它的艺术特点。文学家本身应该是一个艺术家。他自然应该有一定的政治理想与改革社会的热忱，不过，在其作品中他最主要的是通过形象来表达他对一切事物的看法与感受，而不是宣扬他的政治主张。白居易年轻时提倡‘文章合为时而著，诗歌合为事而作’，写了《秦中吟》、《新乐府》，那些诗歌诚然反映了中唐的现实。可是白居易的诗歌却以晚年的艺术成就最高，原因却就在于他晚年已不奉行‘诗歌合为事而作’的原则。

作家就如泡在一锅汤中的主菜，如果他是当归，那汤就带有当归味，如果是萝卜便带萝卜味，汤是作品的内容，味是作家的个性，文以载道是调味品，调味品过多会令汤失去原味。中国现代文学，尤其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文学的一个特点便是有时味之素下得太多太重了。

28-08-1989



创新途径

在古典文学的园地里漫步一圈，在惊叹园中鲜花的繁多美丽外，也迫切地感到生在现代，于吸收古典文学营养之余，我们应如何找出一条新的道路来。

散文由《尚书》《左传》开始，《史记》掀起另一高峰，而后有唐宋八大家的楷范作品出现，再演变为明清小品文，中国古典散文的路子可说已走尽了。

诗歌由诗经、楚辞、汉赋、乐府、唐诗、宋词，到明清的诗词已是余绪了。

小说由《搜神记》，唐代传奇，宋代话本，而明清四大小说，古典章回小说也已山穷水尽，而不复柳暗花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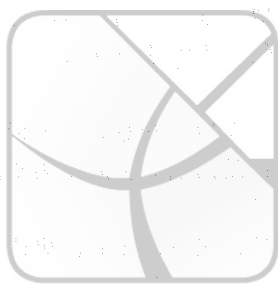
古典散文手法上的起承转合的八股，诗歌上押韵限字数的局限，古典小说的章回格局的呆板，都说明中国古典文学中的各种体裁的表现手法，已发挥到淋漓尽致的地步，后来者再也无法超越前人了。

我并不是说不要从古典文学作品中去吸取养分，而是强调今人在吸取养分之余，得加入一些新的肥料，这才有办法使华文文学获得新的生命力。

新的肥料我认为有二个途径可取得，一是在思想上突破感时忧国的文以载道框框的束缚，而代之以悲人悯人情操；二是吸收现代各国文学的新颖表现手法。古典文学犹如曾长出丰盛庄稼的土地，

养分是还有一点的，却总得加上一些新的肥料，才可栽培出更好的农作物来。我们如果在注重地方色彩的同时，也描绘人类所共同面对的问题；在吸取古典文学的高超写作技巧的同时，也引进外国作家的表现方法；我相信必能使华文文学有个新的面貌出现。

27-09-1989



《淡淡的情愫》读后感

见成君著《淡淡的情愫》

新诗发展到了今天已整整七十年了，它是不是应有一个较固定的形式，什么才是新诗的诗素，新诗应朝向哪一个方向发展？这些问题一向都有人在探讨，却总找不到答案。

从中国诗歌发展史来看，从诗经、楚辞、汉赋、古体诗，而唐诗宋词元曲，诗歌的形式没一个朝代是不变的。新诗的出现，可说是历史的必然，新诗的不可能有一个固定的形式，也是必然的趋势。只是该怎样在没固定的形式中保有诗的特质，这才是新诗能不能健康发展的关键。

成君写诗已有多多年，这是他的第二本诗集。成君的诗就如他的人一样，坦诚直率，令人一览无遗。为人率直，应是一种美德；写诗显露无遗，有时就难免教人感到乏味。白居易年轻时写的诗，用字浅白，希望老妪也能理解，结果是他年轻时写的诗，引来后人“太露太尽”的批评。还好，他中年后写的诗，内容虽然较少涉及民生艰苦，咏怀写景却大有诗味。我是较赏识白居易中晚年的诗歌的。

《白氏长庆集》若删去白居易贬江州司马后的诗作，白居易就不是中唐最有成就的诗人。“诗歌合为时而作”，这原则没人敢说不正确，但艺术并不等于现实的白描，白居易早年诗歌的一个缺点就是过于显露，缺乏耐人寻味的特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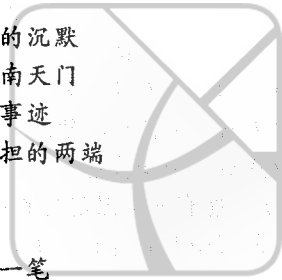
成君诗的特点便是明白如话，可缺点正是缺乏峰回路转的韵味。

但不是因此说他的诗就全然没警句，而只是说他今后或许应该更着重于意境的追寻。例如他的《送给开路人》——致《热带文艺》一诗中，便有这么的有意象的诗句：

突闻有人要集体修筑乡下的小路，
准备漫步青山，
瞻望海洋。

又如《泰山挑夫》的一段诗句，也同样可耐人寻味：

挑上泰山顶
把庙宇重修
把凉亭重建
一队又一队的沉默
从岱宗跨上南天门
宏图壮志的事迹
就延续在扁担的两端
岩上的文字
怎不把这群
记上一笔



再如《苏州》中的这些诗句，也充满诗意：

一支篙 撑着一叶轻摇
一根桨 摆着一串银花
悠悠碧波 载去满篷秧苗
闪闪银花 送来了千里鱼虾

到了黄河，成君失望了，他唱出了情真意切的诗句：

到黄河

见不到澎湃的波涛
只能捞起一手的浊黄
一尝几千年的悲壮

——《一曲情怀》

象上引的这些富有意象的诗句，在本诗集中是少了点。

一些诗作，例如《又一次献礼》、《我们的心灯》、《向菲律宾人民学习》、《卖清汤妇人的话》等，都难免有或多或少的概念化的毛病。

诗歌与其他文体一样，你要充分掌握它，就得中外古今泛览群书。成君写诗有年，已掌握了一定的写作技巧，但任何有成就的写作人，都是在不断地突破自己中显露光芒，成君自然也不例外。我们期待他今后的诗作，能在原有的基础上加进一些新的，教人另眼相看的诗素。

1989年



序何晓《市廛集》

小品文在中国文学史上也占有一席位。《世说新语》，宋人笔记，明清小品，以至五四以来的小品文，都有可耐人寻味，一读再读之作。由一粒沙里可看到世界，小品文往往也有这样的内涵。都市民众生活紧张，闲暇时间太少，长篇巨作无暇披览，小品文在茶余饭后，或坐车上班途中，都可浏览，小品文因此在都市社会就更受欢迎，报章副刊爱刊载小品文，大半原因在此。

小品文对写作者来说，也是随时随地俯拾即是的。由于篇幅短小，题材不拘，议论抒情，绘物写景，毫无拘束，写作此类文章的作者就无须深思苦虑，为文中的人物或情节煞费周章了。不过，小品文由于直抒情怀，或直书己见，作者的性情、学识、机智、思考力，也就一一在文中显露无遗。

学识或许还不是写小品文最须具备的条件，搬辞书上的学问入文，不用说是最笨拙的卖弄学问做法了，但即使作者真的对某领域的学识很丰富，只要他不懂得灵活运用其学识，他写出来的文章还是会索然寡味的。成功的小品文，除能让读者看到作者丰富的学识外，还要让读者品味到蕴藏在文中的韵味。这韵味倒不一定是自然风景描绘，而也包括作者对生活的感悟所激发出来的警句，或富有生活哲理的论说。

收在这本书中的六十篇短文，都是何晓这一两年来发表在报章

副刊上的，内容包罗万象，既有嘲讽时下风气之作，也有回忆少年情思之作；文笔亦庄亦谐，看得出作者的文字造诣功夫不弱，与此同时又具有幽默感，兼且又懂得享受生活中的小情趣。这些条件，使得不少原本很枯燥的题材，到了作者手中，就变得妙趣横生，读后不禁为之发出会心的微笑来。书中有好些篇章很可一读再读，例如《三好咖啡档》、《卖梦者》、《也谈传呼机》、《新穷人》、《争看马票报》、《光饼》、《明知山有虎》、《电视广告》、《拦途抢劫》、《胆色》、《炫耀》、《霸气与傲气》等等都是。

我一向总认为凡艺术总得与现实有点距离，才会令人再三玩味。非纯抒情的小品文的缺憾就在于过于直接反映现实，缺少逶迤曲折之美，这自然与小品文篇幅过于短小有关，但也说明此种文体有其先天性的局限。何晓已有十多年的写作经验，他应该可以尝试写些较有舒展余地的散文，或甚至小说。

我认为不同的题材，若以不同的体裁来表现，会有更理想的艺术效果。有些感触宜用诗歌来宣泄，有些感悟应以小品文来表达，有些情思最好以散文来抒发；有些题材则最理想以小小说或小说来展开。何晓今后自然应该继续写小品文，可我想在掌握了一定的写作技巧与文字功夫后，他应该有信心地以各种文体来反映生活，让读者更全面地看到他的文学才华。

1989年

不是怀旧

约略泛读战前与战后的新马华文文学作品，我们应该可以相当肯定地说，战后的文学作品的写作技巧是较为高超的。这原本就是非常正常的现象，后人总是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前进的，文学创作也不例外，写作人在吸取前人的创作经验后，写作技巧会较前人高超，自是顺理成章的。

我这么说，并不等于就断定本地的华文文学前途似锦。恰恰相反，我倒看到本地华文文学前景堪忧。

如果一切不变，我们将会面对这么一个困境：我们的文坛依然会有少数的杰出的作者，然而我们却会缺乏足以维持文学生命的读者群。然后在若干年后，当华文水准再下跌时，恐怕连会摇笔杆的人也会日渐减少，而本地华文文学就会渐渐消失。

因此，当前的写作人，尤其的年轻的作者，必须非常清醒地看到，一味只在文字上标新立异，势必加速本地华文文学的死亡。我并不是反对提高写作技巧，而是更加强调内容的重要性。

如果说任何人都无法扭转华文水平日渐低落趋势，那文艺工作者的刻意扭曲文字，企图以绚丽的文字来掩饰贫乏的内容，就会使原有的读者群因看不懂你的文章掉头而去，新的读者却也不可能被吸引过来。这是在加速窒息本地华文文学的生命。

可否探讨探讨我们的国家、民族、文化的一些问题呢？可否抒

写我们这一时代的人的失落感、沧桑感呢？能不能反映反映这些年来，随着都市化的结果，我们到底丧失了些什么东西？能不能探讨一些人类所面对的共同难题？

文学当然是语言的艺术，文字自然要求典雅、秀丽、优美。但任何有份量的作家，都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思想家。他绝不是单靠文字的华丽来赢得读者的心的，他也必须以他的作品中能震撼人心的内容来捉住读者的心。

倘若从紧扣时代脉搏这点来说，新马华文文学战前与战后到独立前的作者倒是更能体现时代精神的。我不是在怀旧，而确实感到我们的文学危机就潜在作品缺乏时代气息这点上。

14-07-91



为题材融入感情色彩

最近观赏了艺术剧场的两场演出，一场是相声《笑口常开》，另一场是大型话剧《今夜钟声响亮》，心灵颇为震荡了好一阵子。

这一两年来，多钻研了一些文史的课题，少阅读了文学作品，创作是一篇都写不出来了，然而却也因此悟出了这么一个道理：要搞创作，精神状态得处于半颓废状况才行。欣赏大自然是一要素，喝点酒以保持心情处于浪漫状态又是另一要素。一句话，得保持非常感性的生活，才有办法进行创作。创作者若专心一致于学术研究，过着异常理性的思考生活，而非感性生活，那创作源泉是会枯竭的。

保持感性生活，其实是为创作题材注入作者的感情色彩。我看艺术剧场的两场演出所反映的现实内容，就更教我深信，文学艺术的能否感人，是与其内容息息相关的。《笑口常开》所涉及的社会现象，正是当前的社会弊端，也是它们引起观众共鸣的原因。《今夜钟声响亮》牵涉到的历史场面，感人至深。此出三幕话剧在处理与解释一些历史事件所持的观点，固然有值得商榷之处，但感人之处也正在于它把历史写进剧中去。

作家在把生活素材提炼为写作题材的过程中，无可否认的是必然要经过感性震撼与理性过滤此二阶段。所有的作品都是作家痛定思痛的产物，但作家感情所受的震荡越大，作品的感人力量也就越深。素材在经过作家的理性过滤的精确程度越高，作品所蕴藏的主

题就会越深远，否则作品便会显得主题肤浅。不过，这并不会过分损害作品的感人力量；反之，如果作家对有关的题材感受不深，也就是说作家的感情波动度不大，那由此题材所构思出来的作品的感染力必然不大。因此张恨水的鸳鸯蝴蝶派小说与鲁迅的批判现实的小说一样能感人，具真情的流行歌曲与艺术歌曲同样动听，道理在此。自然，我不是由此为它们划上等号，而只是强调在文学艺术作品中，感情的色彩比理性的分析更为重要。这也就是为何主题先行的作品干巴乏味的原因所在。因此，我们可以说越具现实意义的题材，作家以它来创作出感人作品的可能性也越大，只是其中有一个不可或缺的因素，那就是作家的感受能力一定要强。而要维持这种感受力，作家有必要过着较感性的生活，得伸出感情的触须，攫取有意义的生活素材，并融入浓郁的感情色彩，才能创作出感人的作品来。

写作人不是不可以专心一致钻研一个课题，但在此期间，他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无法从事创作。理由是，创作者与研究者的精神状态与生活方式，是截然不同的。

08-09-91

别太强调散文的实用功能

作为审美客体的同一篇作品，在作为审美主体的读者的不同人眼中，可以是截然不同的艺术。原因是鉴赏本身就是另一种创作过程，审美主体的经验、审美观、艺术观，都是他判断同一件艺术品的价值高下的因素。

新马华文文学历史尚短浅，战前与战后的作品与理论文章，虽都有学人编纂出来，真正花精力去钻研并继承新马华文文学理论的人并不多。而且，如果说“五四”运动后的中国文学，曾以二三十年的时间，重复走了在欧美已发展了一两百年的自然主义、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积极浪漫主义、新现实主义的路向，新马华文文学界却又是从中国的书本或报章杂志上，再次复述与演绎了这些理论。而一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从“五四”运动的彻底打倒孔家店及一切传统文化的偏激，到文革十年文学的高度政治化，在在都说明了中国现代文学有忽略了文学独立性的偏差。新马华文文学一向来受到中国文学很大的影响，虽然无可否认的是，六、七十年代它也曾受过台湾文学的影响，但是比较起来，那是较短暂的，也不那么深刻。

再从中国古典文学的滥觞、发展、演进的历史来考察，我们几乎可以肯定地说，中国古典散文一萌芽即与历史相结合，这造成中国散文过于讲究实用功能，与诗经的有大量抒情诗，且在基本上是

以抒发情怀为主的格调不一样。由《尚书》、《左传》、诸子百家的著作，到《史记》、《汉书》，中国散文都以实用为目的。六朝的骈体文，经唐宋古文运动一扫荡，基本上已一蹶不起，再加上明朝前后七子的文必先秦、诗必盛唐的鼓动，以至横行清朝散文界二百多年，仅得雅洁二字的桐城派的称霸，中国古典散文的最大特色便是文以载道，讲求实用。

我因此认为，以华文为表情达意的本地文艺工作者，应该自觉到马华新文学与中国新文学的紧密关系，以及中国古典散文的过分讲究实用功能的偏差性，从而在文艺观方面尽量摆脱这种以实用功能来要求散文的缺点。过分要求文学所须肩负的社会功能，而忽略了文学所须具有的艺术性，其所造成的后果必然是，读者会陷入独沽一味的泥淖之中，而创作者易把文学与社会学混同起来。

中国古典与现代文学，与马华新文学一样，都具紧扣现实、反映人生的特点。但仔细考察中国与马华文学的发展特点，我们却不得不对它们所共同具有的“文以载道”的先天性特点，特别加以留意，并在取舍之间作个明智的选择，以使当代文学呈现更多姿多采的面貌。否则的话，我们就有可能留恋《尚书》的古朴，并老在原地踏步，且沾沾自喜，又从而口诛笔伐不同风格的作者与作品。

10-11-91

慎防乡愿作风流传开来

偶尔翻阅马来西亚报章的文艺副刊，发觉有一股很恶劣的作风已隐然流泛在文坛上，这恶劣作风就是对成名的作家或文学史家作冷嘲热讽的揶揄。这种近乎乡愿式的行径，对已经奄奄一息的文艺，只有更大的破坏作用，却一点也不能促进文学的繁盛。

一个人若长期蛰居于一个小地方，又不勤于阅读刊物书籍，接触新生事物，久而久之，就容易形成胸怀狭小、而又爱发议论的乡愿个性。这种乡愿个性表现在写作上，会出现两种偏差，一是危言耸听，哗众取宠，譬如几年前有某人士在新加坡大谈《红楼梦》，竟然说十二金钗的死于非命，是曹雪芹在为十二金钗所写的诗中已按下伏笔，其言论之牵强附会，比之索隐派的说《红楼梦》主题是反清复明更为离谱。另一是想借骂倒名家以抬高自己，以为走这样的捷径就可名利双收，比诸前者，这类乡愿的行径更为卑下。

新马华文文艺借用原句兄的一句话，是已到了“吊水延命”的地步了。然而环顾文坛，“隔江犹唱《后庭花》”者有之，高唱搞文艺者无须有使命感者有之，闲得发闷写肚脐给蚊子叮得发痒者有之；在这些之外，如果再加上哗众取宠与骂倒名家的乡愿的弄刀舞枪，那文艺的更进一步衰飒，却是无可避免的。

在东南亚这么一个文化落后的地方成长或生活久了，眼界变小是很自然的。如果本身再不思上进，不勤勤恳恳进修，而患上井底

之蛙的夜郎自大症，以为靠标新立异或骂倒名家便可扬名文坛，那真是新马华文文坛的悲哀。

尽管新马社会文风不盛，新马华文文艺工作者的作品收集成书出版，却须面对来自中港台以及世界各地以华文书写的文学作品的竞争。在历史无情的淘汰下，文艺工作者的作品能不能流传下来，绝对不是靠拉关系得来的所谓书评所能决定的。至于近乎下三流的乡愿的行径，就更无法使其作品流传下去了。我们须慎防乡愿作风流传开来。

08-12-91



后记

此书所收数十篇短文，是我近十年来断断续续所写的，有的发表在当年《南洋商报》的《言论》版上，有的发表在《联合晚报》的《文艺》版上，有的发表在《联合早报》的《文艺城》版与《园林》版上。特别要在此声明的一点是，当原甸兄在编《文艺》版时，由于他的约稿与刊登我的稿件，因此那一段时日也就写得较为勤快。

我一向懒于把文章收集成书。这十来年所写的数百篇短文，若一一分类成书，约有五至六册，但迄今尚未结集出版，实因提不起劲来的缘故。近两三年来，因在琼州会馆讲中华文史课，与一群志同道合学员较有往来，偶谈及此事，他们就再三鼓励我应把文章结集成书，并自愿帮忙促销，因而才着手编纂，而有此《文艺絮语集》之出版。

我想文学归根结底的目的应该是反映现实，并由此促进人类社会的进步。在此时此地，尽管有人大喊作品无须具有使命感与忧患意识，而力主文学作品可描述个人的喜怒哀乐；但我仍然相信，个人的悲欢离合，若与大众或时代思潮毫无关连，那就只能是个人的哀乐，而这样的作品在此华文处于风雨飘摇的本地的价值，也就非常之小了。

自己迷失了方向的文人的言论，有时是离谱得教人要怀疑他们当年曾经摆出的“进步”姿态，到底有多少诚意在？有一种人是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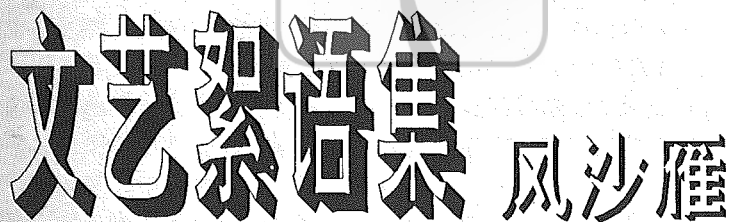
自己失意时，就希望明天地球毁灭，大家一齐消失，但当自己得意时，却又以为全人类都在享福，有谁敢再提什么文学的任务等之类的话，那就是“吃古不化”。

与此种人一比，我倒更欣赏有虔诚信仰的教徒，至少这类教徒的关怀别人的不幸的心意是真诚感人的。我认为搞文学的人，至少须拥有此类教徒的情操。

或许有人要拿晚明的性灵小品来驳斥我的说法。其实要是深入考察，晚明小品的走向描写山水之美，家居生活之闲，与山居之乐，正是对污浊政治环境的厌恶而不得不采取退离的处世态度的结果。换句话说，晚明小品也是曲折地反映了当时现实之作。

但强调写作人须具有关怀别人的胸怀，并不等于说文学作品是一套人生观的演绎。这点，我在此数十篇文章中就曾一再论及。总的一句话，文学创作是有其目的性的，说作家无须具有忧患意识与使命感的人，他本身就是在宣扬这么一种论调：文学作品可描写个人身边的琐琐碎碎的小事，而这也就是他的目的。这目的就是，要众人与他一样，把文学当作谋财致富后的消遣小品。

我并不是否定文学作品须具有一定的艺术特点与价值，我只是强调除此之外，文学作品还须具有批判现实的作用。一个杰出的作家，不是时代的旁观者，而是洞察先机的参与者，这是他的过人处，也是他的不幸处。想藉文章沽名钓誉，而又想在生活上富裕且愉快，这样的梦是不可能实现的。统观中国文学史，没有一个杰出的作家或诗人的一生是平平安安愉愉快快的，乾隆以帝王之尊创作诗歌万首，但有那一首是经得起时代的考验呢？上自屈原，中经陶渊明、李白、杜甫、苏东坡，下至袁宏道、龚自珍，有哪一位的一生不是在多方探索生命的意义中度过的呢？上苍对作家是何其不仁爱呀，但这又是谁可以改变的事实呢？正如科学家须时时刻刻在探索宇宙万物的奥妙一样，作家也须时时刻刻思索人类的问题；而思索是痛苦的，绝不是象喝茶或喝酒那样悠闲。



定 价 ☐ S\$10.00

文藝家選集



价：S\$10.00